清代社会文化丛书

史地卷

功在史册

满语满文及文献

佟永功 著

9.03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功在史册：满语满文及文献/佟永功著.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8

（清代社会文化丛书·史地卷/于金兰主编）

ISBN 7-80638-356-5

Ⅰ. 功… Ⅱ. 佟 Ⅲ. ①满语-通俗读物②满文-文献-通俗读物 Ⅳ. H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3889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政编码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字数：116千字 印张：6⅝ 插页：8

印数：1—5000册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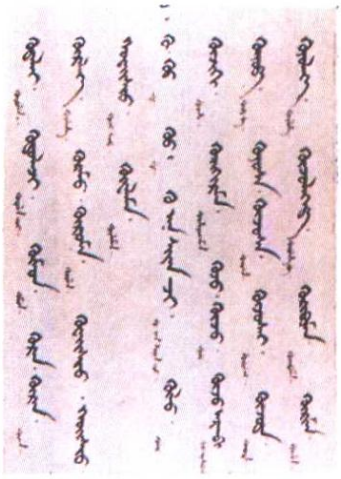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高 虹 段扬华 责任校对：侯俊华

张 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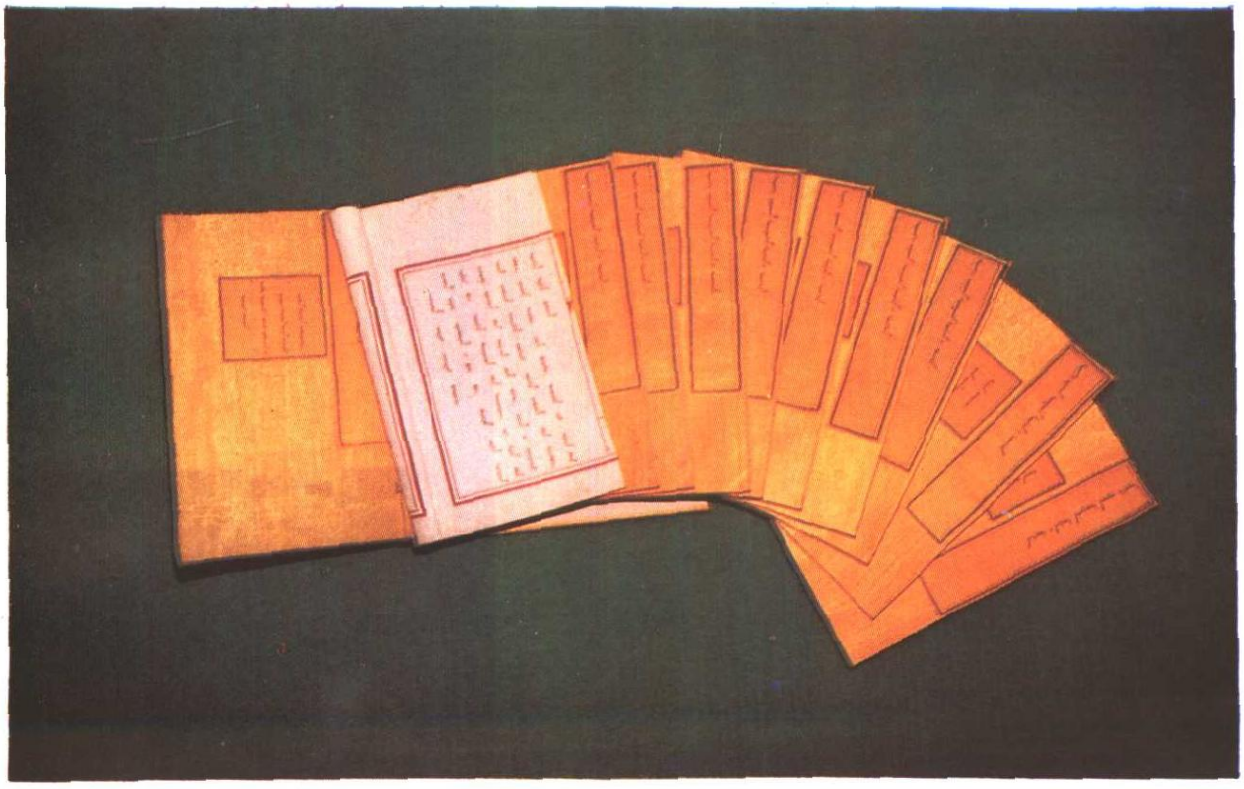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李国盛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13.50元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抄存稿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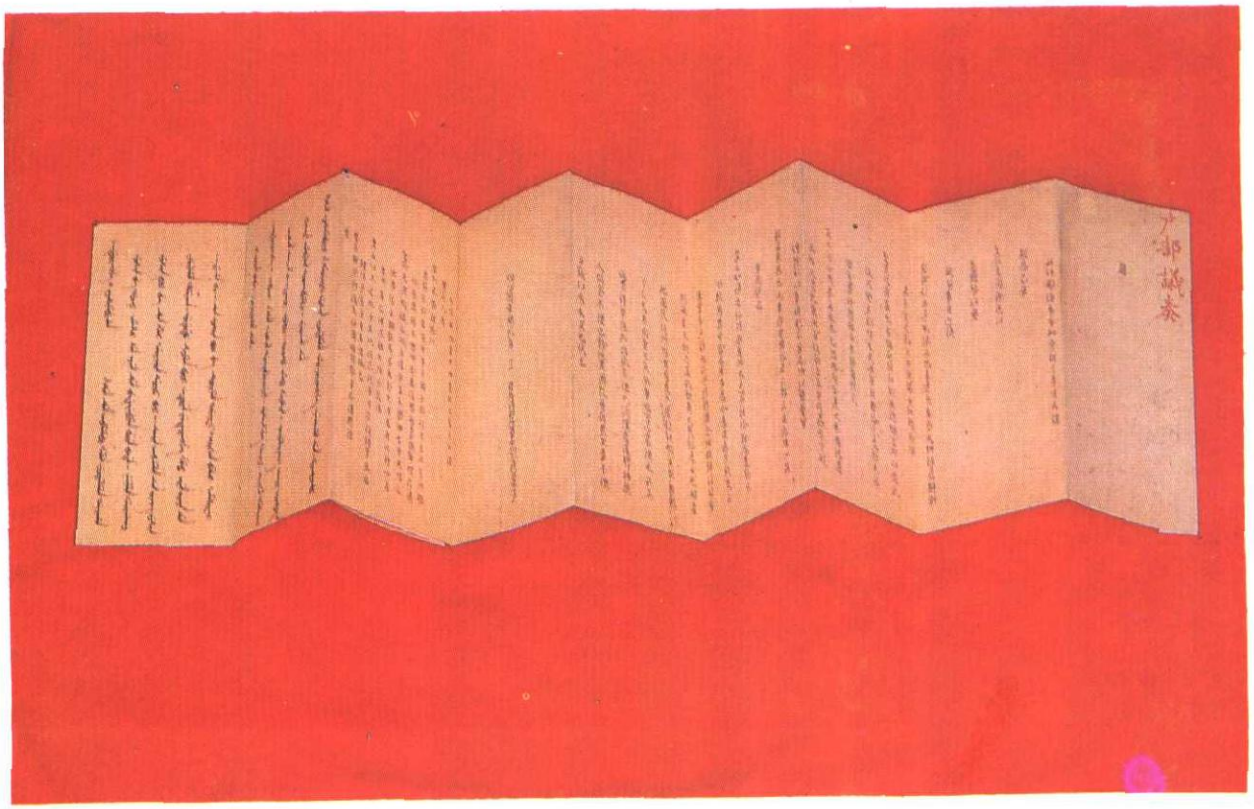


无圈点字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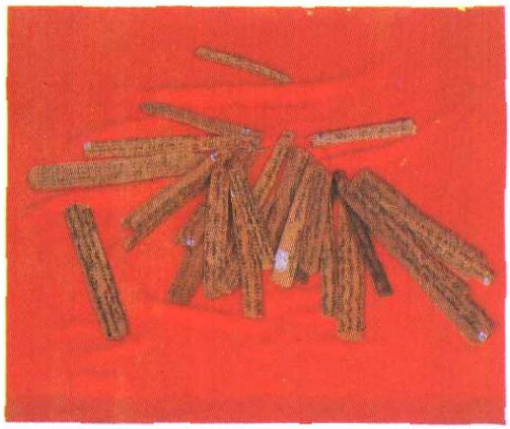


《满文老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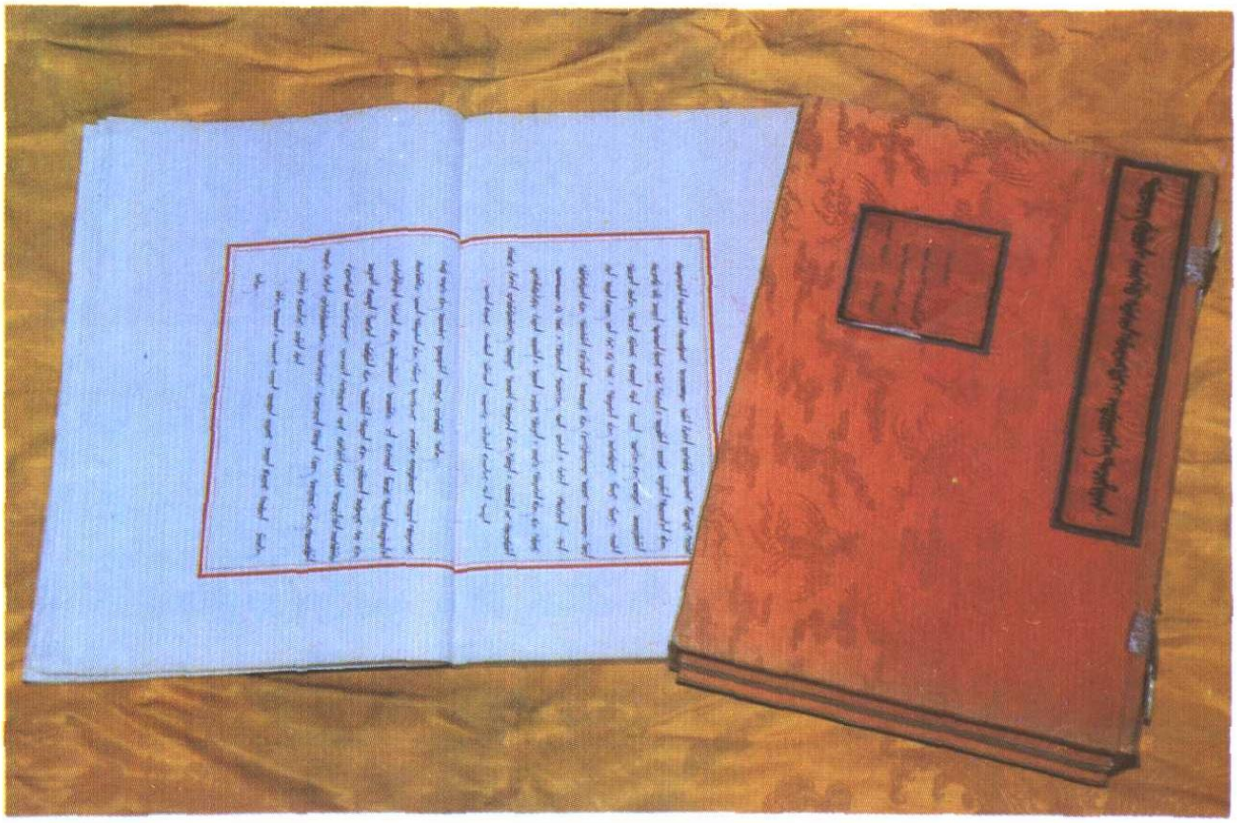
《满洲实录》



题本（满汉文合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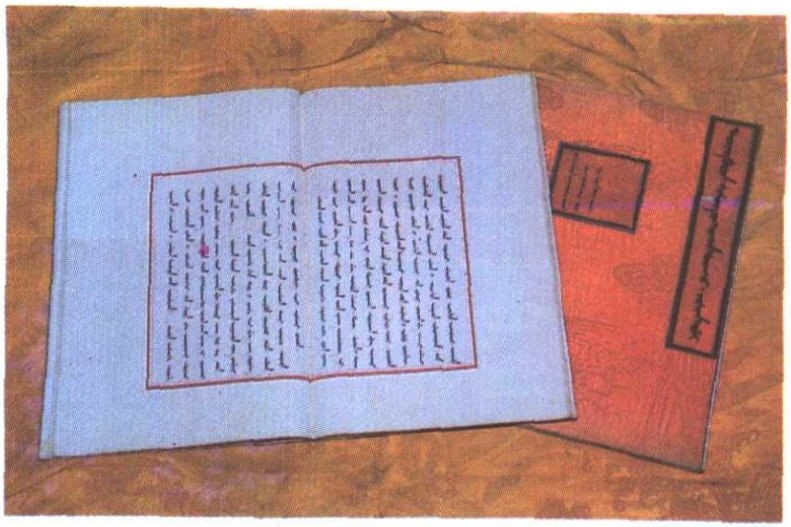


满文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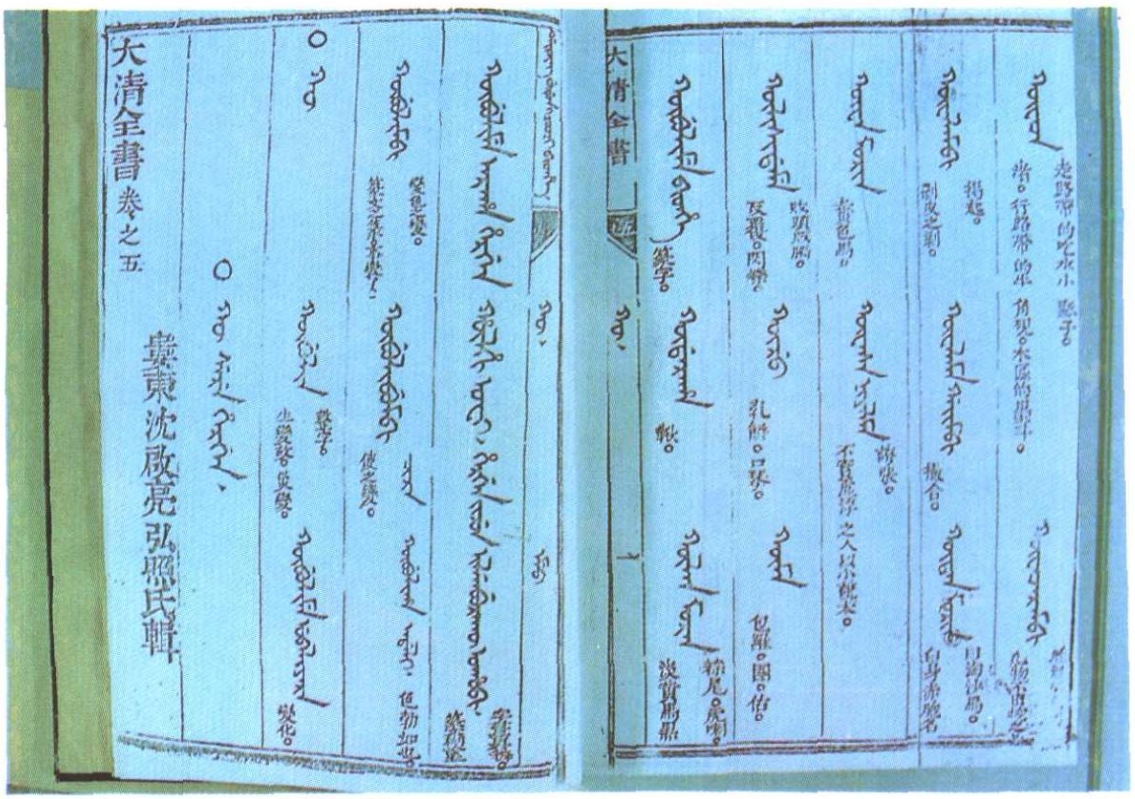
满文《圣训》

盛京内务府册档(黑图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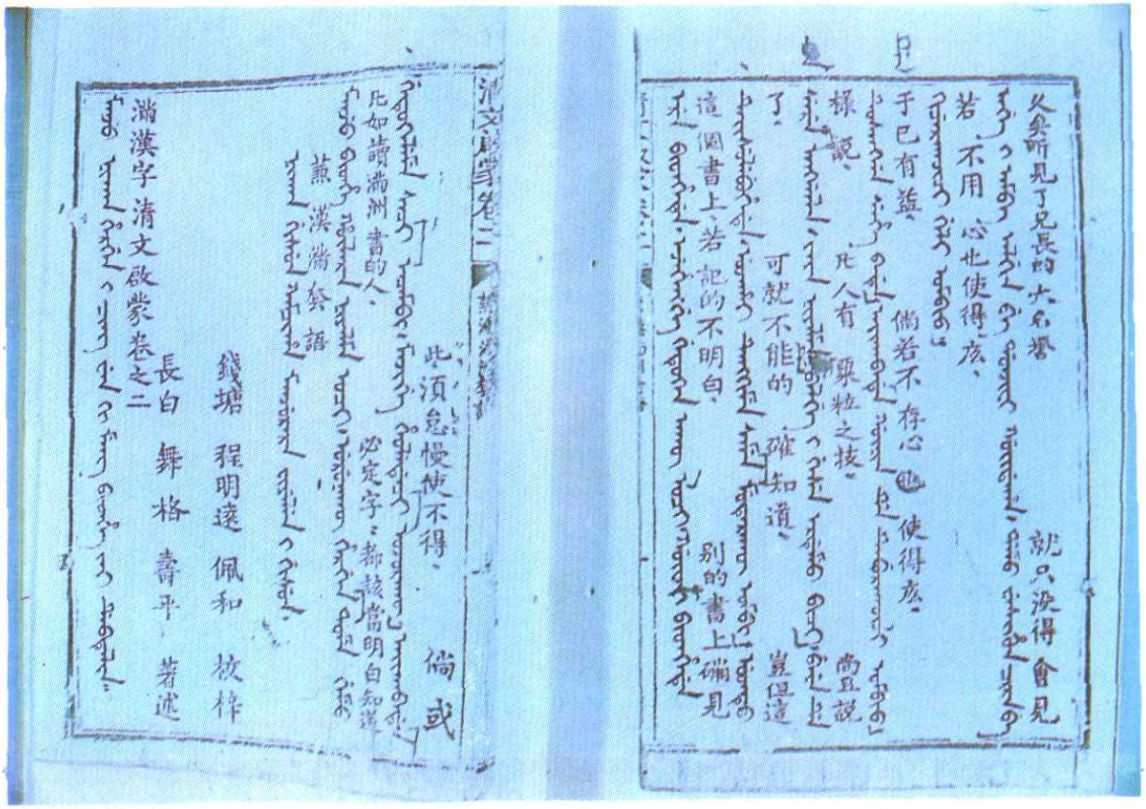


满文《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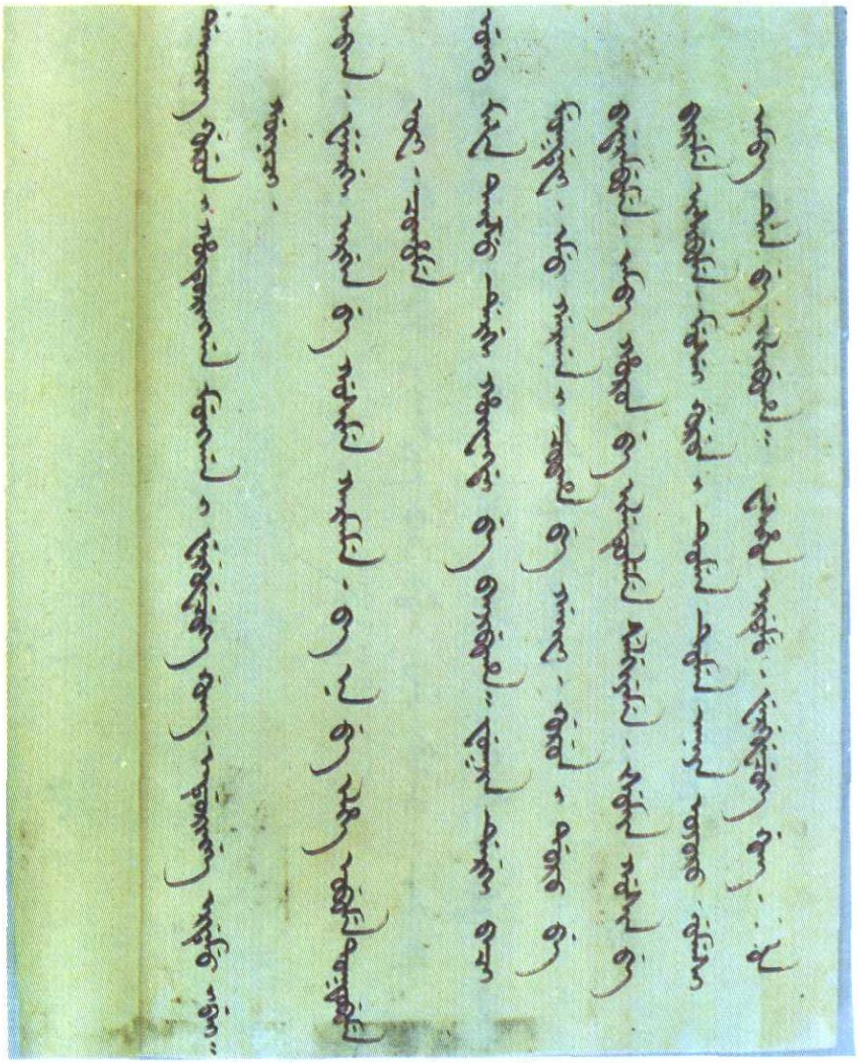
《玉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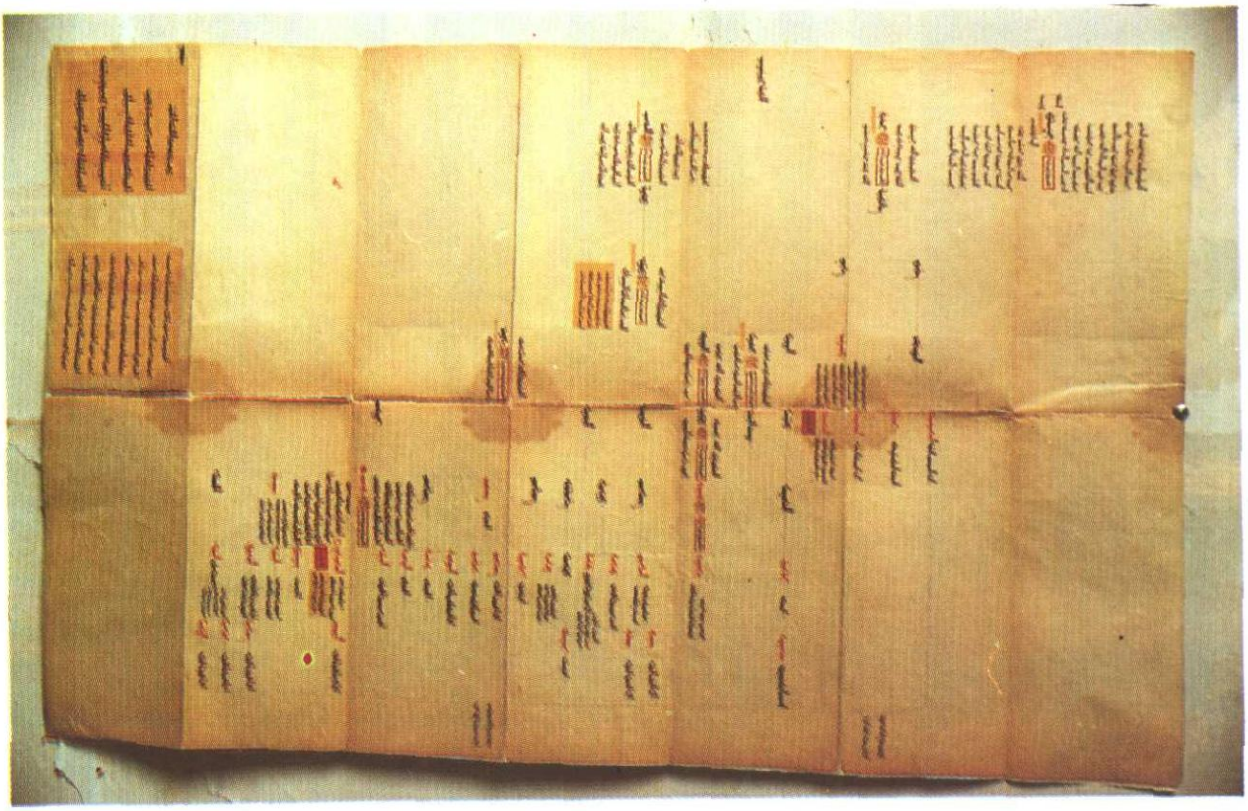
《大清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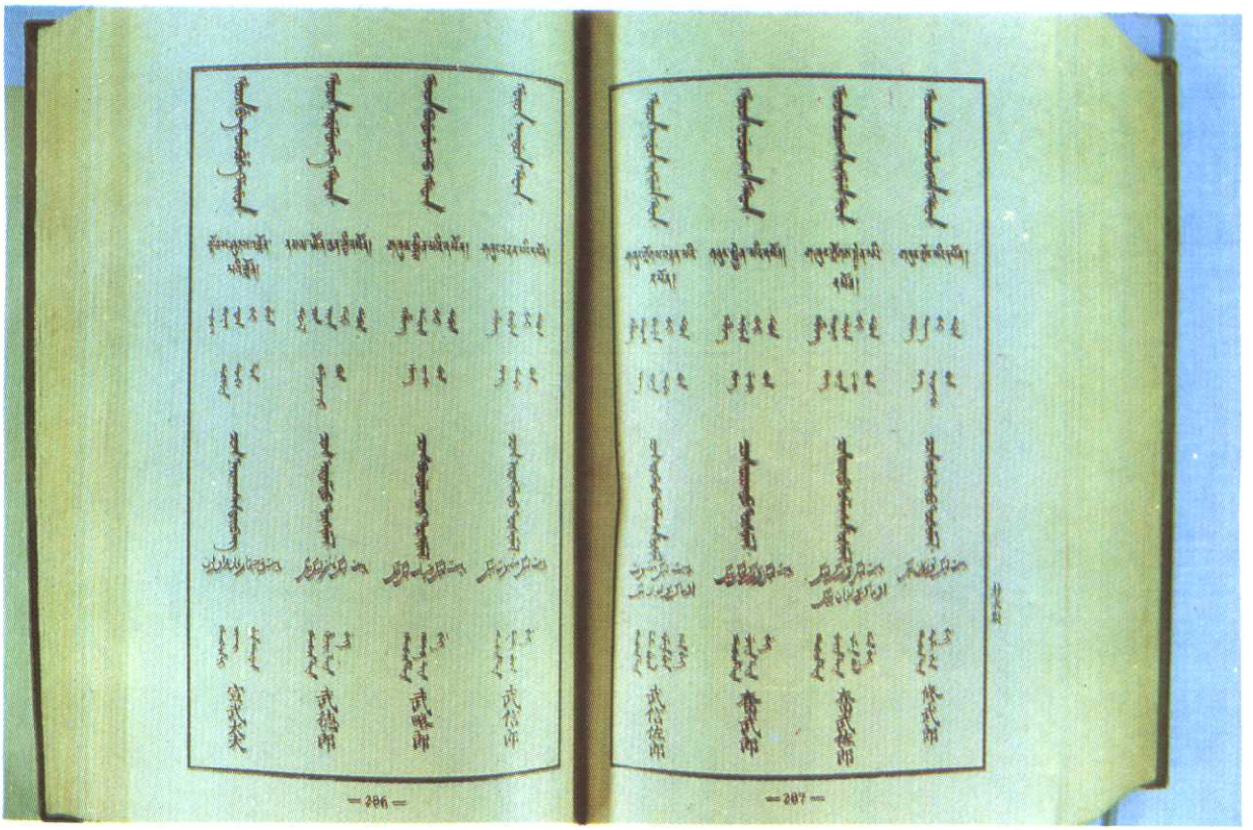
《清文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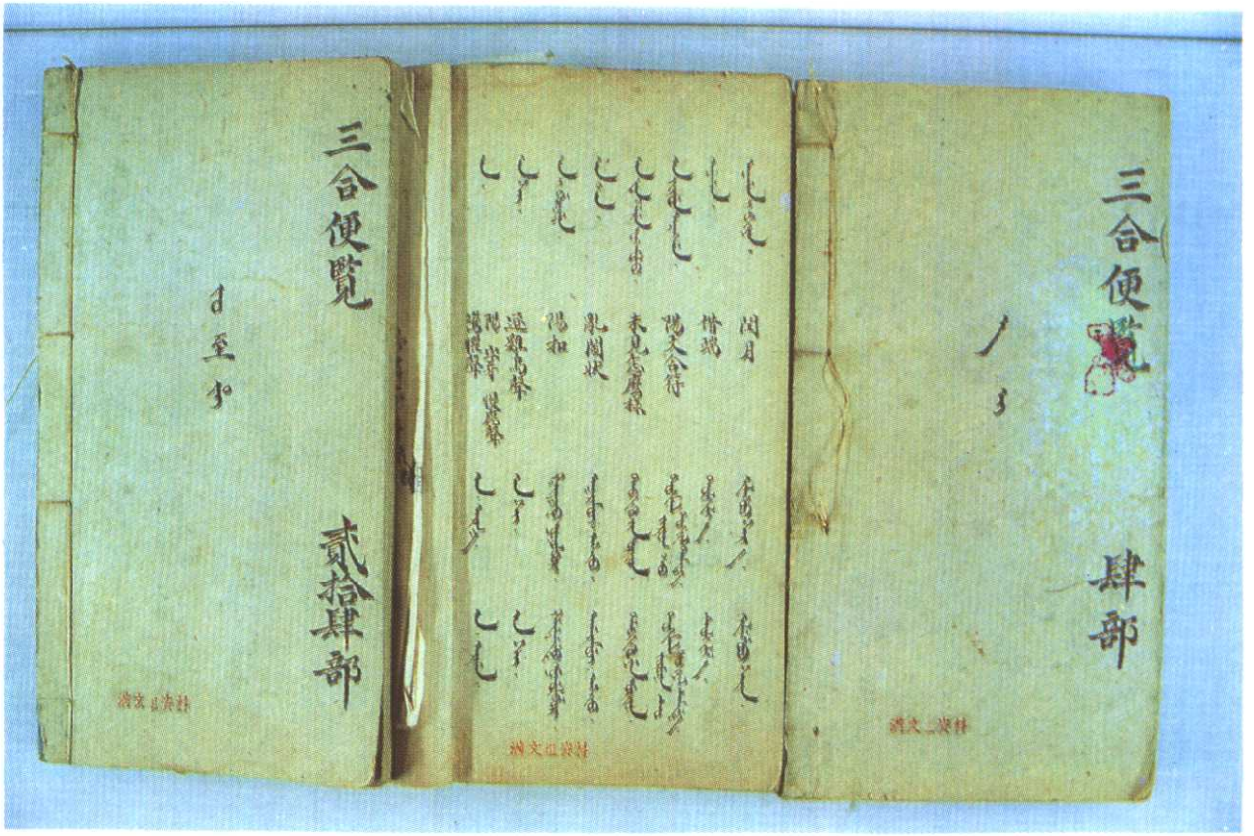
福陵神功圣德碑满文碑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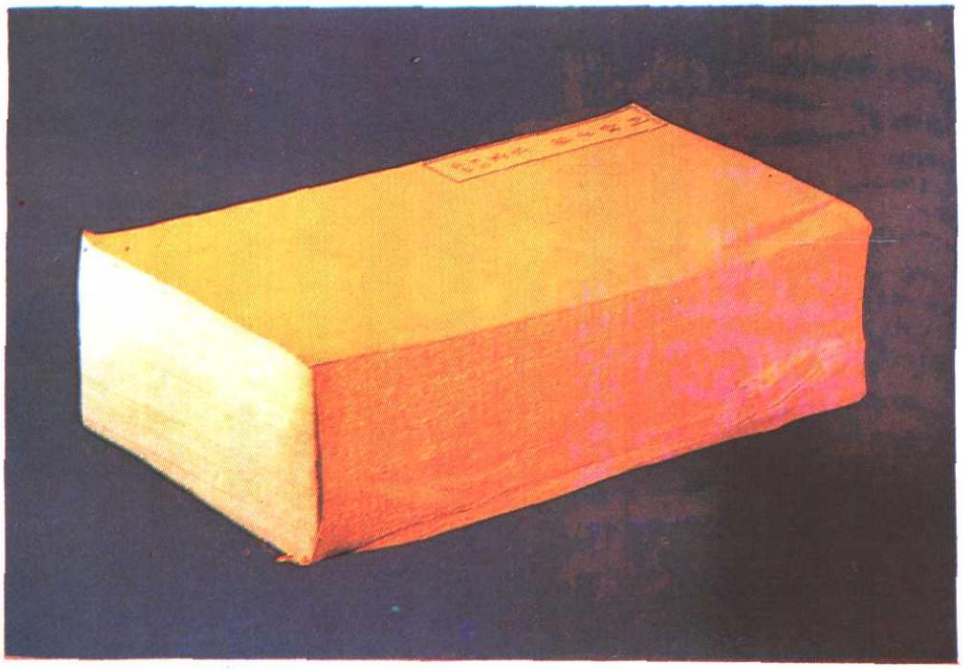
世管佐领杨善承袭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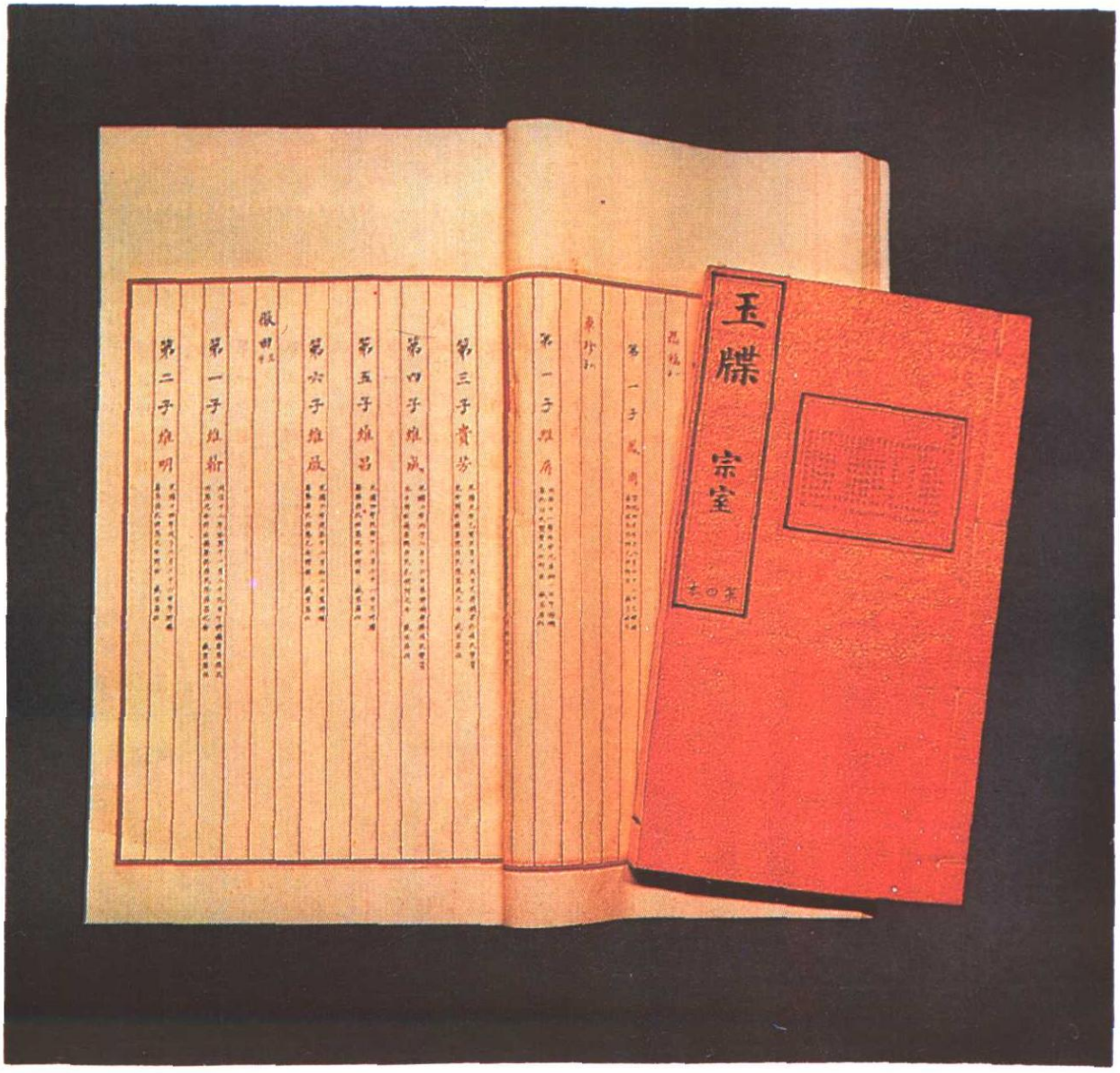
《御制五体清文鉴》北京民族出版社影印本



《三合便览》



《玉牒》



小玉牒为玉牒之稿本

清代社会文化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王充闾

主　编：于金兰

副主编：袁闾琨　张胜彬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卜景春　于金兰　朱诚如

关嘉禄　佟永功　张胜彬

修玉祥　袁闾琨　徐　彻

董守义　魏鉴勋

总　　序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最后一个王朝。如从公元1636年满族领袖皇太极在盛京（今辽宁沈阳）创立大清政权算起，中经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成为取代明朝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到公元1911年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前后共经历了267年，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长的封建王朝之一。

清代从勃兴、繁荣到衰亡的进程中，曾创造出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王朝未曾有过的辉煌业绩，无论是百年的康乾盛世，灿烂的文化成就，民族关系的处理，还是辽阔版图的奠定，都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泱泱大国。其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富有内蕴的精神资源，在国内哺育了人口众多的华夏民族，在国外，文明远播，给周围国家与人民以深远的影响。

清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历史课

题，它的优秀成就可以激励我们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它的沉痛教训，仍有宝贵的借鉴价值。

清史研究领域中，社会文化课题近年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说明研究领域迅速地扩大，适应了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

回顾清代社会，文化成就是相当可观的。许多问题值得我们从多角度、多层面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对清代社会文化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重新认识，使我们看到一大批学者，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果，居于当时的世界学术前列。这种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构成了清代社会文化的主体。虽然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殖民者的侵入，打开了封闭过久的国门，使清代社会文化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新的局面，但它根源于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沃土中的内核，仍然是启肇新时代文化的基石，两者的联系密不可分，也是割不断的。

探讨清代社会文化时，使人明显地感觉到有两大特色始终贯穿在全部内容中，这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性和两次文化大冲撞。这不同于其他封建朝代的两大特色，正是构成清代社会文化的基本线索，它的出现和发展，深刻地影响了清代社会文化的面貌。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

第一，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历史

和时代赋予它对封建文化进行总结的使命，它完成了这个重大使命。

中国封建社会文化是数千年延续发展的历史结晶。这种漫长的发展历程，使社会文化深深扎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加上历代学者的辛勤耕耘和精心浇灌，使这棵参天巨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这种长期文化创作的代代沉积，使有清一代学人有幸在高于其他朝代先哲的起点上，开创自己的文化业绩，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先哲，达到文化新的制高点。这种结果，一方面反映了它的集大成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它新的活力和创造性。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清朝统治者在前期（指鸦片战争前）所执行的文化政策，固然有其消极的方面，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符合国情，顺乎时代潮流的，加上较为稳定的社会、繁荣的经济、济济的人才，更为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致使清代的社会文化，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顶峰。

第二，有清一代两次文化大冲撞，对清代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次文化大冲撞发生在清初。公元1644年清朝定鼎北京，标志少数民族满族成了中华民族中的统治者。以满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带来的是满族文化，但它却陷入了汉民族和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由于清初

满族统治集团为取代明朝在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备，所以入主中原后，在满汉文化冲撞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采取了保持自己以“国语骑射”为特色的满族文化作为回应。同时，主动接受并大力弘扬以儒学为核心的汉族传统文化。这是一种高于满族文化的文化，从而化消了满汉文化相互接受的心理隔阂，积极地促进满汉文化的融合，其结果不仅迅速地提高了满族文化，甚至产生了质的飞跃，出现了一大批学者文人，并取得了与汉族学者文人并驾齐驱的学术地位。同时，由于满文化为汉文化注入了生机，使一度低迷、空幻的汉文化出现了复苏的局面，传统的封建文化有了新出路，再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态势。清初满汉文化的大冲撞，使清代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还应该指出，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正是清代前期政治、经济多民族性综合发展的反映。因此，文化巨人辈出、学术成果耀人眼目，在许多方面取得超越前人的文化成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中西文化大冲撞发生在清末。这次文化大冲撞较第一次满汉文化大冲撞，情况更加复杂，范围更加广泛，内容也更趋深化。这是清末社会政治、经济复杂性的直接反映，这是时代所带来的。清末国势已走上了下坡路，统治集团政治上更趋于因循保守，不思进取，在主观上无力回应来自西方文化的大冲撞。可

是西学东渐的趋势和它对封建文化的大冲撞，随着国门的打开，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了。从积极意义上说，西学唤醒了一批先觉者，哺育了一代用新思维看待事物的先行者，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其消极作用是资本主义文化中的糟粕与封建文化中的糟粕相结合，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畸形文化，严重地毒害了中国人民，阻碍中国社会文化的正常发展。这种后果并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全部消失，这也是清朝社会留下的一种祸患。

清朝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但它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研究清代社会，剖析文化课题，不仅是正确总结历史的需要，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

以出版清史学术著作蜚声中外的辽宁出版界，多年来出版了一大批清史著作，有力地推动了清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受到出版界和学术界的很高赞誉。多年来，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在大力支持清史出版工作中，做出很大成绩，继推出“清史研究丛书”、《清代全史》等清史著作后，如今又策划、主持编辑出版“清代社会文化丛书”，使辽宁清史出版扩大了范围，进入新阶段。

“清代社会文化丛书”是一部综合反映清代社会文化的大型通俗学术丛书。丛书采取分门别类、专题论述的办法，从不同角度介绍清代社会文化。首辑编辑

出版30册。以思想、文艺、科教、史地、典制、风俗等6卷来展示清代社会文化的不同侧面，使读者对清代社会文化有一个较为明确、深入的了解。

丛书的撰著者是对清代社会文化有研究、有成果的学者，他们积极支持了这项文化工作，其精神令人感动。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联合出版这套丛书，开辟了丛书合作出版的新途径。

我们应邀组织这套丛书的编写，是想为当前文化事业做一件实事，但限于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加之时间不够宽裕，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值此丛书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之际，诚恳欢迎读者和方家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促使我们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而且做得更好。

编辑委员会

1997年5月

目　　录

总序

引言 …… (1)
一　满族的由来 …… (3)
二　满语和汉语的比较 …… (10)
三　老满文的创制 …… (15)
四　老满文的改革 …… (20)
五　满文是表音文字 …… (26)
六　清代满语文的地位和作用 …… (31)
七　清代的满语文教学 …… (36)
八　满语文中的汉语借词 …… (41)
九　汉语文中的满语借词 …… (47)
十　乾隆皇帝对满语文的规范 …… (53)
十一　乾隆皇帝与满语地名 …… (58)
十二　满语文的衰落 …… (64)
十三　锡伯语文与满语文 …… (70)

十四　满文文献的分类及典藏 …… (76)
十五　《满文老档》的原本 …… (82)
十六　《满文老档》的抄本 …… (88)
十七　《满文老档》的翻译 …… (93)
十八　《满文老档》的研究 …… (98)
十九　奇特的满文木牌 …… (103)
二十　补《满文老档》之缺的
　　《天聪九年档》 …… (108)
二十一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 …… (114)
二十二　图文并茂的《满洲实录》 …… (119)
二十三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 (125)
二十四　盛京内务府满文档案 …… (130)
二十五　流散国外的《镶红旗档》 …… (136)
二十六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 …… (142)
二十七　锡伯族档案史料 …… (148)
二十八　清代的满语语法著作 …… (154)
二十九　从《御制清文鉴》到
　　《御制五体清文鉴》 …… (161)
三　十　满族神话故事《尼山萨满传》…… (168)
三十一　《尼山萨满传》满文抄本及其他 …… (178)
三十二　清代满文的译著 …… (183)
三十三　满文《玉牒》…… (189)
三十四　锡伯家庙满文碑 …… (195)

引　言

我国满族人口将近1 000万，是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就是由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统治中国长达268年。满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又善于学习和勇于进取，对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今天的满族人虽然都已改用汉语汉文了，但历史上满族人曾经使用过自己的语言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这就是满语满文。由于满族贵族是清王朝的统治者，所以满语满文受到特别的尊崇，被定为“国语”、“国书”，在清政府的公务活动和满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显赫的地位并起过重要作用。只是到了清中叶以后，由于满族生活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汉族的交往日趋密切，逐渐地放弃

了自己的语言文字，汉语汉文成了交际的工具。

有清一代，形成并保存下来大批满文公文档案、谱牒、碑刻、著述及满文译著，其数量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这些满文文献绝大多数典藏在国内各级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受到妥善的保护，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的一些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中也保存有一些满文文献，那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流散出去的。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日益发展，清代满文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瞩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代满文文献的保存、发掘和利用，是一项功在史册、利在千秋的事业。

一

满族的由来

民族是历史范畴（chóu，音愁），是历史上形成并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人们的共同体。它不是从来就有和一成不变的，而有其形成、发展、消失的过程。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满族最早的先人是先秦时期的肃慎人，汉和三国时期称作挹（yì，音亿）娄，北朝时期称作勿吉，隋唐时期称作靺（mò，音莫）鞨（hé，音何），辽、宋、金、元时期称作女真。

满族的直接先人是女真人。女真人在宋、辽时期曾经创造出辉煌的历史。12 世纪初，以完颜部为主体的女真人，在首领阿骨打的领导下，反抗辽国的统治并取得胜利，建立了金国。金国统治者先是联合北宋灭辽，继而又推翻北宋，迁都燕京（北京），控制了中国北部广大地区。迁入汉族地区的女真人，在汉族的

影响下逐渐汉化了，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留居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点。

元朝和明朝初期，女真人的主体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游一带，处在氏族社会末期，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到了明朝正统初年，即15世纪30至40年代，几经分散、聚合、迁徙，形成建州、海西、东海三大部。

建州女真，包括苏克苏护、浑河、完颜、董鄂、哲陈、鸭绿江、讷殷、珠舍里等部，分布在抚顺以东浑河流域以至长白山麓、鸭绿江边。

海西女真，包括哈达、叶赫、辉发、乌拉四部，分布在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及松花江自西向东北转折处。

东海女真，包括瓦尔喀、虎尔哈等众多部落，分布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中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明朝政府对女真人实行羁（jī，音基）縻（mí，音迷）政策，建立都指挥使司及卫、所，给女真人上层人士以都督、都指挥使、都指挥佥事等官职及印信、敕书，令其直接管理部众；在广宁、开原、抚顺等地开设马市，准许女真人入市交易，出售他们的特产，买进需要而又不能制造的物品；在军事要地派驻官军，实行打拉结合、分而治之的政策，以维持东北边疆的安宁。

由于明朝政府和女真各部首领保持统属关系，基本上处于和平相处状态，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迅速渗透到女真各部，其社会很快地向奴隶制发展。建州、海西女真各部距汉族地区较近，农业生产逐渐占居主导地位，狩猎和采集业退居次要，手工业有较大发展。各部的奴隶主贵族，利用明朝政府授给的官职不断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势力，时常入边掳掠，将抢得的汉人、朝鲜人充作奴隶。同时，女真人内部也逐渐分化，相当一部分自由民沦为奴隶。随着女真社会迅速向奴隶制转化，奴隶主贵族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激烈地进行兼并，出现了各部蜂起，互相残杀，争当雄长的混乱局面，统一已经成为女真历史发展的趋势。

努尔哈赤祖父名觉昌安、父名塔克世，属建州女真，奴隶主贵族家庭出身。觉昌安很能干，有智谋，经常率人到抚顺马市上进行交易活动，增长了见识，开扩了眼界。他的长子礼敦，勇武异常，英勇善战。一个时期，附近一些部落多归附于他们父子。后来在同其他部落的仇杀中，势力有所衰落。

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建州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明兵攻打古勒城（今辽宁省新宾县上夹河乡古楼村）主阿台。阿台之妻是觉昌安长子礼敦之女。为救孙女，觉昌安率子塔克世进入古勒城，不幸双双死于

乱军之中。明朝驻辽东总兵李成梁将努尔哈赤父祖尸体送还，又给了许多赏赐表示慰问。从此，23岁的努尔哈赤便以父祖遗甲13付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至十九年（1591年），不到10年的时间，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击败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蒙古、锡伯、卦勒察、珠舍里、讷殷九部联军3万人的进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接着努尔哈赤又灭了海西女真的哈达、辉发和乌拉三部，只剩叶赫一部受明军的保护未灭；同时，又派兵远征东海女真的瓦尔喀、虎尔哈等部，招服黑龙江中下游的使犬部、乌苏里江以东的诺罗路。在女真人交往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下令大臣额尔德尼等创制了满文。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东南八里许）建立后金政权，自称金国汗。天命四年（1619年），努尔哈赤最后灭亡了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此时，后金控制区，西至明朝辽东边墙，北达黑龙江中游，东及鸭绿江，南抵海，几乎是全部女真人的活动区域。

在后金政权内部，努尔哈赤设立职官，制定律条，审理诉讼案件，国家体制初具规模，对女真人行使有

效的行政管理。在对女真各部的征战过程中，努尔哈赤于女真人氏族社会时期“牛录”组织的基础上，首先建立四旗，继而扩至八旗，把女真人集中在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之中，由他的兄弟子侄充当各旗旗主，与之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

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建立，实际上也就是他和明朝统治者争夺天下的开始。天命三年（1618 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兴兵攻明，首取抚顺城，掠获人畜 30 万。四年，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大败分四路进剿的明军 10 万之众。从此，明朝转入战略防御，而后金则转为战略进攻。天命六年（1621 年），努尔哈赤打下辽阳，开始进入辽沈平原。十年（1625 年），再陷沈阳并迁都于此，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由辽东山区移到辽沈地区。十一年，努尔哈赤率 10 万大军进攻辽西重镇宁远，被守城明将袁崇焕大炮击伤，不久后死去，享年 68 岁。

皇太极继位后，自称天聪汗，锐意改革，励精图治。首先，加强集权，削弱能与他抗衡的三个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的权力，实现了面南独尊的目的。其次，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文馆并任命职官，完善了国家行政机关。第三，在已设的满洲八旗之外，增设了汉军和蒙古八旗组织，扩大军事队伍。第四，重视同蒙古各部的关系，对早

期归附的科尔沁蒙古联姻结亲，以武力征服察哈尔蒙古，使蒙古各部完全站到了自己一边。第五，修改其父将掠获的汉人分给八旗官兵为奴的政策，准许汉人分屯别居从事农业生产，改善了民族关系。第六，多次用兵朝鲜，结城下之盟，割断了朝鲜和明朝的关系，消除后顾之忧。第七，天聪六年（1632 年）命大臣达海改革老满文为新满文。皇太极这一系列决策及其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在 1636 年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

就在皇太极改元的前一年，即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 年 11 月 22 日），皇太极发布了一道命令："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① 这样，清太宗皇太极就在满族共同体实际已经形成的基础上，规定族名为"满洲"，今人简称为满族。

回顾上述历史，不难看出，正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在近半个世纪的奋斗中，把纷争不已的女真各部统一起来，有了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经济和文化、共同的意识。这是一个以女真人为

①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 25。

主体，包括汉人、朝鲜人、蒙古人等其他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共同体——满族。

皇太极为什么改定族名为满洲，禁止再用诸申等称呼呢？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教授作过精辟的说明，主要观点有二：

第一，诸申和女真，本来是同音异译，并无根本不同，指的是自由民的女真人。但后来女真人社会内部发生阶级分化，少数女真人上升为奴主，多数下降为农奴或奴隶。这时，诸申（女真）原来自由民的女真人的含义，已经被臣仆、奴才的意义所代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以诸申（女真）作族名，显然是不合适的了。

第二，历史上宋、辽时期的女真人曾建立金国，统治过中国北部广大地区，迫使南宋统治者偏安一隅，当时女真人和汉族的矛盾很尖锐。皇太极为避免明末汉人联想起历史上女真人南下一事而产生反感，所以改名为满洲，禁止再叫诸申（女真），甚至连国号“金”也改为“清”了[①]。

满洲族，简称满族，这是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谕定的。今天学术界和满族同胞已同意把这一天作为满族的命名日来加以纪念。

① 王钟翰：《关于满族形成的几个问题》，《清史新考》，第47页。

二

满语和汉语的比较

劳动创造了人。人在集体生产劳动中需要交流思想和感情，这使语言的产生成为必要。生产劳动改变了人的发声器官，同时使人产生了思维，这又使语言的出现成为可能。在有了必要和可能的前提下，人类的语言便应运而生了。当然，人类最初的语言是很简单的，但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渐地完善起来了。

当今世界上的语言有很多种。语言学家们在对世界上的各种语言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依据谱系分类法将大多数语言作了分类。所谓谱系分类法，就是把具有共同历史渊源的语言按系属分成语系——语族——语支三个层次，在语支层次下便是某种具体语言。

以语系来说，有汉藏、印欧、阿尔泰、闪含、芬兰乌戈尔、达罗毗荼、伊比利亚高加索、马来波利尼西亚、南亚、班图 10 个语系。

每个语系下又分为若干个语族，如阿尔泰语系下就有蒙古语族、通古斯满语族、突厥语族。

每个语族下又分为若干个语支，如通古斯满语族下就有通古斯语支、满语支。

每个语支下有一种或几种具体的语言，如满语支下就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

如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满语支；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藏缅语族——汉语支；满语和汉语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

不同语系的语言，因为历史渊源不同，差异是很大的；相反，同一语系的语言，因为历史渊源相同，差异就不大。

满语和汉语分别属于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历史渊源不同，其差异很大，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汉语大多数词是单音节词，而满语则相反，大多数词是多音节词。例如，汉语的名词“狗”，就只有一个音节；而满语的“狗”，用国际通用的罗马字转写（下同）是indahūn，是由in、da、hūn三个音节构成的。汉语的动词“读”，只有一个音节；满语的动词“读”则读作hūlambi，是由hū、lam、bi三个音节构成的。

第二，汉语的每个词都是有声调的，用声调区别

词义；满语的词则相反，没有声调，自然也就谈不上用声调区别词义了。例如，汉语的“江”，只能读作第一声（即阴平调），绝对不能读作第二声（即阳平调）、第三声（即上声调）、第四声（即去声调），否则那就不是“江”而是另外的词了；满语的“江”则读作 ula，没有声调，直读即可。

第三，汉语用词序和虚词表示语法意义，而满语用词形变化和助词表示语法意义，二者差异很大。例如，汉语的“我吃饭”这句话，只能按“我——吃——饭”这个顺序说，别人听了才会明白，若随意颠倒词序就会闹出笑话来。满语“我吃饭”这句话，按词序说通常是“我——饭——吃”。“饭”作为宾语，其后有一个宾格助词。只要有这个宾格助词在宾语“饭”的后面，即或说成“饭——我——吃”，也未尝不可，不至于发生误会。再如，汉语的“于理不合”，“于”是介词（虚词的一种），必须放在“理”的前面，听的人才能明白。在满语中，“理”后面必须用表示方向的格助词，而且“不合”还必须用动词否定式（动词形态变化之一），听的人才会明白。

第四，汉语的量词很发达，满语则相反，其量词很不发达。例如，汉语说马的数目时必须用量词“匹”，说牛的数目时必须用量词“头”或“条”，等等。满语没有相应的量词，在马、牛前加上数词即可。当

然，表示长度、重量、面积、容积等方面的基本量词，满语还是有的。

第五，汉语的某些音位，满语是没有的；同样，满语的某些音位，汉语也没有。例如，汉语“日”字的辅音，满语就没有。满语的舌尖颤音，汉语也没有。这给满汉族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造成一定的困难，但只要认真学习，勤学苦练，是会掌握的，因为人类的发音器官是相同的。

第六，汉语词形是固定不变的，而满语的词是有形态变化的，尤其是动词的形态变化十分丰富。满语动词用词尾的变化表示时、态、式的语法范畴；汉语动词没有形态变化，用与其他词相结合的方法表示时、态、式的语法范畴。例如，汉语动词加“了”、“着”、“过”表示“时”的语法范畴，加“被”、“使”、“互”等表示“态”的语法范畴，加“请”、“愿”、“令”等表示“式”的语法范畴。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这是由它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不同决定的，因而是不奇怪的。但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民族间联系的增多，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互相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交际范围的不断扩大，不同民族语言的交融将以日新月异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上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某些邻近的民族，由于社会

历史发生巨大的变迁，有的民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改用了其他民族的语言，也有的民族既使用自己的语言同时又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这是人类历史丰富多彩的折射，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值得人们去探讨。

三

老满文的创制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每个民族都是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的。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满族的先人女真人曾经有过自己的文字。12 世纪初，女真人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统一邻近各部，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金国。金国先是联合北宋灭了辽国，继之又推翻北宋，迁都北京，控制了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女真人最初没有文字，行文多用辽国的契丹字。金天辅三年（1119 年），完颜希尹奉金太祖阿骨打之命创制的文字颁行，被称为“女真大字”。天眷元年（1138 年）金熙宗完颜亶又颁行新字，被称为“女真小字”。据专家学者的研究，上述女真文字多是用汉字和契丹字的字形作基字再增减笔画而成，用以记录女真语语音。

女真文字颁行后，曾作为金国的官方文字用以撰写国书、诏令等，但由于文字本身的缺点和政治的、社会的诸多原因，未能普遍推行。南迁到汉族地区的女真人改习汉语汉文并同汉族融合了。留居在东北老家的女真人，虽然仍操女真语，但多数人并不认识女真文；相反，由于同蒙古人相邻，不少女真人学会了蒙古语蒙古文，也有些女真人在同汉人的交往中学会了汉语汉文。到明朝中期以后，“凡属书翰，用蒙古文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①。

16 世纪后期到 17 世纪初期，努尔哈赤陆续统一女真各部，满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女真各部间往日那种森严壁垒、兵戎相见的局面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经商贸易和友好往来。人们的生活安定下来，社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人们之间的交际只限于语言就显得很不够了，因为语言的交际只能面对面地进行，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仍用蒙古文传达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困难也很多，因为必须有既懂女真语又认识蒙古文的人从中译写和翻译，而这样的人并不多。人们已经明显地感到了没有文字的不便，所以创造自己的文字成了满族社会的强烈要求。再者，努尔哈赤从 23 岁以父祖遗甲 13 付起

① 福格：《听雨楼丛谈》，卷 11。

兵之日起，经十余年的英勇奋斗，已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各部，正在向建立自己的政权与明朝一争天下的方向前进。发布政令、指挥军事行动等，如果仍旧用蒙古文，不仅有诸多不便，贻误事机，更有损于自己的威名和宏图大业。这也是促使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的一个因素。一方面是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是自己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努尔哈赤作出了创制满文的决定。

二月，努尔哈赤召见当时女真人中著名的学者额尔德尼，命令他创制满文。额尔德尼，自幼聪明，通晓蒙古语文和汉语文，在跟随努尔哈赤征伐蒙古诸部的战争中，能用蒙古语文宣示意旨，招降纳附，因而得到了“巴克什”（学者或博士）的美名。但额尔德尼毕竟是个知识分子，缺乏努尔哈赤作为政治家的那种深思熟虑和宏大气魄，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创制满文，竟当面推辞说不能。努尔哈赤循循善诱地说：汉人念汉文，不认识汉文的人听了都明白；蒙古人念蒙古文，不认识蒙古文的人听了都明白；我们女真语一定要译成蒙古文才能念，不懂蒙古语的人就听不明白了。为什么说依据我们女真语创制满文就难，而学习其他文字反倒容易呢？这一段有理有据的反问，使额尔德尼无言以对，就不便再说难了。其实，努尔哈赤的这段话把为什么要创制满文的道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女真

人中多数人并不懂蒙古语文，传达努尔哈赤的指示必须先译成蒙古文再给不懂蒙古语文的女真人念，女真人是听不明白的，因此必须创制满文。额尔德尼懂蒙古语文，自然体会不到没有满文的难处。但经努尔哈赤这样一点拨，依他的聪明自然也就明白了。

但究竟怎样具体地创制满文呢？额尔德尼一时还不得要领，便请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告诉他：这不难，就用蒙古文字母拼写我们女真语的发音，连接起来成词句，表达出意思就可以了。例如，在蒙古文字母“阿”下面加上一个字母“妈”，这不就是“阿妈”（满语阿妈是父亲）了吗？在蒙古文字母“厄”下面加一个字母“脉”（mò，音莫），这不就是“厄脉”（满语厄脉是母亲）了吗[①]？就这样，额尔德尼按照努尔哈赤所指示的原则，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创制出了满文。额尔德尼初创的满文，字母写法极不统一，还有假借现象，尤其是字母又有单独、词头、词中、词尾等形式，更增加了字母辨识的难度。后人称这时的满文为老满文。

老满文的创制，我们不应当看作纯粹是努尔哈赤的个人主观意愿，而必须看到其背后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努尔哈赤在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由作者译成白话文。

创制满文这件事情上的个人作用，因为正是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发现并顺应了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作出了决定。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对额尔德尼作为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在创制满文过程中发挥的聪明与才智予以充分的肯定。历史文献中没有关于额尔德尼具体创制满文的记述，我们无法知道其详细情形，但可以肯定是很困难的。初创的满文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用一个民族的文字去完整地记录另一个民族的语言，这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对于老满文的创制，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四

老满文的改革

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创制老满文，到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下令达海改革老满文，这中间经过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间，老满文在满足满族人之间交际的需要、推动满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巩固统治地位服务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首先，分布在东北广大地区的满族人，彼此互通信息可以不用请人译读蒙古文或汉文了，直接用老满文书写信件即可。即或是文盲，不认识老满文，只要由认识老满文的人一念，也就可以听明白的。这和用蒙古文或汉文通信有很大不同。蒙古文或汉文信件，必须有认识蒙古文或汉文的人译成满语后，人们才能听明白。否则，那就如同天书一般。

其次，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发布政令、接转各地军

情通报、官员记注国政、学者翻译汉文典籍等，有了满文可用，这对政令的畅通、军事行动的胜利、先进汉文化的学习，都是非常有效的。

第三，后金政权已经建立，国家体制初具规模，对外交涉少不了公文往还，使用满文公文这是后金政权客观存在的实际体现，具有象征意义。

天命十一年（1626 年），68 岁的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继位，时年 35 岁。在其父所创基业的基础上，皇太极雄心勃勃，锐意改革，励精图治，大大超过了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他废除了四大贝勒共掌国事的旧规矩，先后罢黜了可以与他抗衡的贝勒代善、莽古尔泰、阿敏，实现面南独坐的局面；仿照明朝官制，设立文馆及六部，以满、蒙、汉人充任各级职官，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制度；将俘掳的汉人编庄，使之分屯别居，不再分给女真官兵为奴，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特别重视学习汉族的思想文化和封建统治经验，令文臣用满文翻译汉文经典，诸如《孝经》、《孟子》、《通鉴》、《三略》、《六韬》等；派军队东征西讨，控制朝鲜以消除后顾之忧，越长城横扫北京四周城镇。如果说努尔哈赤时代是创业肇基，那么皇太极时期则是励精图治、准备问鼎中原了。

皇太极对语言文字问题也是十分重视的，并把它提到了涉及民族兴衰的高度。天聪八年他曾经说过，

"朕闻国家承天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之久远，永世弗替也"①。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始终关注满语满文的使用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指示。老满文在30多年的使用过程中，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严重缺点和不足。如不设法克服这些缺点和不足，不但会影响人们日常的交际，而且对皇太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都是不利的。皇太极作为最高统治者，能够体察到老满文的缺点和不足并决定实施改革，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达海，满族人，姓觉尔察氏，9岁时即通满汉文义，成年后被努尔哈赤召到身边承办笔墨事务。凡是同明朝、蒙古、朝鲜的公文来往，全都由他起草；凡是在国内发布的文告，有同时使用汉文的，也都是由他受命承办。他还主持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等汉文典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海是一位精通满、蒙、汉文，善长公文草拟，对汉文典籍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皇太极指定他改革老满文，可谓慧眼识珠，用人得当。

今天，一般人都认为是天聪六年（1632年）由达海完成了老满文的改革，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应当说

① 《清太宗实录》，卷18。

明，人们在使用老满文的过程中早已发现了它的缺点和不足，有的人采取了一些办法试图加以克服，这在《满文老档》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来。达海是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皇太极的指示，经过认真研究和设计，才最终完成老满文的改革的。

达海对老满文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规范满文字母写法，在原有字母旁酌加圈和点，使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位。

老满文的最大缺点就是字母写法不一，一个音位用好几个字母表示，给辨识造成很大困难。皇太极指示达海说，满文十二字头，过去没有圈、点，上下字相同，年幼的人学习时，书中一般语句，看其上下文义后还能明白，如果是人名、地名，必定搞错[①]。这就是针对老满文字母写法不一而说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原字母旁酌加圈和点，这是一种方法，皇太极就是这样指示达海的。此外，还要统一字母的写法。满文字母都有单独、词头、词中、词尾四种不同存在形式，均分别予以统一成一种固定形式。这样就克服了老满文中一个字母代表几个音位或不同字母代表一个音位的混乱，形成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位的情况，使人识别起来很容易。

① 《清史稿》，卷228，《列传》，15，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257页。

第二，在音译汉语借词时，为准确地表示汉语发音，增加10个特定字母，也就是达海所说的“新补外字”。

由于满汉交流的扩大和深入，满文中出现大量汉语借词，满语的原有音位已经不够用了，用老满文拼写的汉语借词读音与汉语读音相差很大，容易发生误解。为此，达海在满文十二字头之外增设了10个特定字母，以更好地解决汉语借词问题。分析这10个特定字母的辅音，实际上只增加了三个满语中没有的辅音音位。但就是因为增加了这3个满语中没有的辅音音位，在拼写汉语借词时就能比较准确地表示汉语发音了。

第三，归纳音节连读，统一其书写形式。

老满文中已有两个音节连读现象，但书写形式比较混乱，达海予以归纳和统一。例如diyan（宫殿之殿），不能读作di—yan，而只能连读成一个音节。用这样音节连读的方法就可以更为准确拼写汉语借词了。达海把这种音节连读叫作“切音”。请注意，这绝不是汉语中的“切音”。汉语的“切音”，是用前一个汉字的辅音同后一个汉字的元音相拼。

以上是达海改革老满文的主要之点。经过达海改革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新满文或加圈点满文；此前的满文，一般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

老满文改革成新满文，在满族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如同老满文的创制在满族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样。皇太极作为决策者，其作用是不能否定的；达海作为专家学者，其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决策者和专家学者的结合，则是老满文改革成新满文的保证。

五

满文是表音文字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有的民族只有语言而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还有的民族只有语言，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却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字进行交际；也有的民族虽然有过自己的语言文字，但后来改用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人类语言文字的历史就是这样的纷繁复杂和丰富多彩，这是人的主观意志无法改变的客观历史。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人用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劳动创造了人。人在集体生产劳动中需要交流思想感情，这使语言的产生有了必要。生产劳动改变了人的身体和发声器官，并使人产生了思维，这又使语言的出现有了可能。正是具备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人类的语言便应运而生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人类的语言也日益完善，但却只能用于直接的、面对面的交际，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然这指的是历史上的情况，现代科学技术造成的先进通信设备克服语言交际的时空限制情况则另当别论。有的民族没有文字，又不知道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自己的历史只好一代一代地口头传下去，难免发生讹误而失真，甚至因为发生特殊事件而中断。有的民族分散流徙后，因为没有文字无法通信，基本上断绝了来往，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总之，由于人类活动地域的扩大和生命的延续，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交际工具——文字，便被万物之灵的人创造出来了。

人类文字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了。早期的文字都是很简单的符号，只能表达很简单的意思，只是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文字才逐渐复杂起来，可以表达人的复杂的思想。

考察人类的文字，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表意的文字，一类是表音的文字。汉文是表意文字，纳西族的东巴文也是表意文字。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都是表音文字。一个民族的文字，究竟是采用表意的符号系统还是采用表音的符号系统，这是由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符号系统本身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但符号系统之间难以比较优劣。

汉字是表意文字，从象形文字发展成六种造字方

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是一个很有特色又十分有效的符号系统。

满文则是表音文字，有元音和辅音字母，元音可以自成音节，元音也可以复合成音节，辅音和元音结合也可以成音节。某些单音节和复合音节可以成为词，再连词成句，即能表达完整的意思。满文之所以走上表音文字的道路，这是由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时的诸多历史因素决定的：

第一，努尔哈赤作为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统一了女真各部，为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从根本上说是满族共同体形成后满族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发展的客观需要，但也不能否定努尔哈赤个人的历史作用。努尔哈赤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学会了蒙古语文和汉语文，在他决定创制满文时首先想到用蒙古文字母记录满语语音，这就不足为奇了。假设他不懂蒙古语文，那满文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就很难说了，也许会借用汉字创制满文的。历史上辽王朝的契丹字、金王朝的女真大字，都同汉字有关系，这就是例证。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努尔哈赤毕竟决定依据蒙古文创制了满文，我们只能由此探索其原因。

第二，满语和蒙古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它们有共同的历史渊源，语音相近，基本词汇中的一些词相似，语法也有许多共同点。由此看来，努尔哈赤决定依据蒙古文创制满文还是顺理成章的了。满语和汉语分属于阿尔泰和汉藏两个不同的语系，从语音到词汇、语法，不同性太明显了，因而依据汉文创制满文是困难的。历史上的契丹字、女真大字之所以没有推行开，其造字法造成的难写、难认等弊病恐怕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据福格在《听雨楼丛谈》中说，当时人们的书信来往，用蒙古文的占十分之六七，用汉文的占十分之三四。这就是说，在没有创制满文之前，人们使用蒙古文进行交际的要比使用汉文进行交际的多得多。这种客观实际对努尔哈赤决定依据蒙古文创制满文肯定会有重大影响的。

正是由于以上的一些原因，努尔哈赤决定依照蒙古文创制满文，所以我们说满文走上表音文字的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满文是表音文字，而汉文是表意文字，从文字角度看，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

首先，满文书写时，每行从上至下，各行从左至右，一般情况下不能横行书写。这同汉文书写方式有明显的区别。

其次，汉文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占一个方块位置，所以人称“方块字”。满文的多数词是多音节的，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节，所以一个词写起来要长一些。

最后，汉字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等多种体式，这是历史形成的，是汉字的特色之一。满文字的体式不多，有楷书、行书、篆书三种体式。满文篆书是受汉字篆书影响出现的，形成于乾隆年间，其具体的篆写形式同汉字篆书形式差不多。

总之，满文走上表音文字的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满文的表音符号系统，在清代前期几朝皇帝的关注下，经过专家学者的努力，不断地得到完善，成为一个相当有效的系统。满文在清代前期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独特作用。

六

清代满语文的地位和作用

在清代前期，满语、满文被尊崇为“国语”、“国书”，一般称之为“清语”、“清文”。作为清朝官方使用的语言文字，满语满文曾经享有极高的地位并发挥过重要作用。

有清一代，从太祖努尔哈赤到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高宗弘历，都对满语满文及其使用予以高度重视，作出过专门指示，制定过具体政策。

太祖努尔哈赤，在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之前，根据满族社会发展和建元开国的需要，决定依照蒙古文字创制满文。关于如何依据蒙古文字创制满文，努尔哈赤对满族的大学者额尔德尼作了很具体的指示。应当说，满文的创制是满语文得以发展的奠基之举，它体现了努尔哈赤作为满族政治家的远见

卓识。

太宗皇太极继承其父的事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大展宏图，对满语文作用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他说："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他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卒致国运衰微"①。看来，皇太极把满语文的使用与否同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了。也正因为如此，皇太极在天聪六年（1632年）下令大学者达海改革老满文成为新满文。

世祖福临入主中原，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他接受御使杨四重建议，认为"满汉字法尚未见同文之盛"，应当"将满书颁行天下，使皆得习而译之"，"则满汉合一，而治效不臻上理者无有也"②。这表明，随着清王朝取得全国政权，顺治皇帝决定在全国推行满语文，实现满汉语文的"同文之盛"，以收到治理国家之效。

圣祖玄烨在位60年，征剿噶尔丹，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使全国安定下来，经济和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康熙皇帝本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文，对汉字声韵尤有研究，深悉满汉语音的差别。他特别重视

① 《清太宗实录》，卷18。

② 《清世祖实录》，卷22。

汉文典籍的翻译和满汉辞书的编纂，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御制清文鉴》、《大清全书》等辞书就是康熙朝完成的宏篇巨制。

世宗胤禛虽然在位仅仅13年，又忙于巩固帝位和整顿吏治、财政、八旗等各项大事，但仍未忽视满语文。他对满族人荒废满语文的情况深为关注，曾发布上谕说："满洲旧制，最重学习清语。近见挑选之侍卫、护军等，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甚属不合。"① 皇帝侍卫均系满族王公贵族子弟，护军多为满族八旗兵丁，这些人放弃满语反说汉话，在雍正看来，这是对"满洲旧制"的背叛，"甚属不合"。

高宗弘历处于清朝鼎盛时期，他四处出巡，文治武功颇有建树。对满语文尤为重视，下令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和编纂满汉等多种文体辞书。著名的《御制五体清文鉴》、《清文汇书》、《清文补汇》等，都是在乾隆朝完成的。乾隆皇帝的满汉语文功底很深，他反对在满语文中大量使用音译汉语借词，下令将这些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以"钦定新清语"名义陆续颁布使用，丰富了满语文词汇和构词手段，使满语文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清代前期皇帝不仅重视满语文，以"国语"、"国

① 《清世宗实录》，卷65。

书”尊崇之，而且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加以落实，以充分发挥满语文的作用。

清朝派往外国的使臣所持国书，一般都用满文书写。前期与外国签订的条约，满文本是其中主要文本之一。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有满文文本。

清代历朝皇帝的玉宝及后妃的封册，有些也是满文的。

实录、圣训、玉牒等重要文献，在纂修前就规定必须有满、蒙、汉三种文本。独特的《满洲实录》，集满、蒙、汉三种文字于一体，并附有插图。

清代沿袭明代制度，对政绩和操守优良的大臣，五品以上的赐给诰命，六品以下的赐给敕命。这些诰命和敕命，一般都是满汉文合璧的。

满族大员上给皇帝的题本、奏折、贺表等，一般必须用满文书写。皇帝朱批也用满文。

清代前期，八旗驻防衙门、管理皇室及宫廷事务的内务府等衙署及其内部机构，彼此行文时以满文居多。乾隆年间，盛京将军衙门就规定，所属各地应报事件，只准用满文；其他部院咨报的汉文事件中，如有应报盛京将军的，必须译成满文；咨行各地的汉文事件，亦应译成满文。可见，清代地方军政机关公文中也有许多是用满文书写的。

满人做官，必须能用满语奏对履历、用满文撰写

章奏。凡是不懂满语满文的官员，俱严加申斥，甚至不准任职。按清代官制，送京引见的满族官员须用满语介绍自己的履历，满语说得不好或者根本就不会说的，补缺之事必定告吹，还要受到申斥。

东北是满族老家，有许多地名是用满语起的，有的现在还通用。如黑龙江省的依兰县，本来是叫“依兰哈拉”，“依兰”是满语一、二、三的三，“哈拉”是姓氏的姓，“依兰哈拉”译成汉语就是“三姓”。后来人们嫌字多，简称“依兰”了。乾隆皇帝对满语地名很重视，除原有满语地名坚持使用外，还将一些汉语地名对译成满语。

总之，满语满文在清代具有显赫的地位，在很多事情上和很多地方都必须使用满语满文，因而满语满文也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满语满文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满文撰写公文，保证国家政令的畅通和对外交往的进行，由此为我们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文档案。

第二，用满文翻译汉文典籍，有助于满族学习汉族文化，加强了满汉文化交流。

第三，直接用满文著述和勒石刻碑，为我们留传下来一批珍贵文献资料。

满语满文虽然早已停止使用了，但它在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七

清代的满语文教学

清代前期历朝皇帝在大胆、积极学习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保持满族的民族特点和固有的传统，其目的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国语骑射”是满族民族特点和固有传统的集中体现，清代前期历朝皇帝均特别重视，每每发布上谕，要求各级官员认真贯彻执行，千方百计地使满族人不忘“国语骑射”。

这里的“国语”就是满语满文。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制满文，清太宗皇太极改革满文，清世祖福临定鼎中原后全面推行满文，满语满文取得了“国语”、“国书”的显赫地位。但无须讳言，满族毕竟是生活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的影响，可以说是无时不在、无

处不在，许多满族人自觉不自觉地学会了汉语汉文，更有一些满族文人学者以能用汉文著述为荣，满语满文的学习和使用逐渐地被忽视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清代前期历朝皇帝提出了坚持“国语”的问题。

为了坚持满语满文，清代皇帝除了屡发上谕加以强调并作出一些具体规定（诸如满族官员题奏事件及某些衙署行文必须用满文、被引见补缺的满族官员陈述履历必须用满语）外，还开办了各级各类学校，让八旗子弟及某些汉人子弟入校学习满语满文。

国子监是清代的最高学府，是为清王朝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顺治元年（1644 年），詹事府（辅导皇太子的部门）少詹事兼管国子监祭酒（国子监的常务主持官）事务的李若琳奏称，“满洲勋臣子弟，有志向学者，宜令奏送国学读书”。顺治皇帝批示说：“满洲官员子弟，有愿读清书或愿读汉书及汉官子弟有愿读清汉书者，俱送国子监。仍设满洲司业一员、助教二员，教习清书。”[①] 这样，有一批满汉官员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此外，还有各省荐举的品行学业优良的“贡生”、输银捐纳的“监生”及八旗的官学生亦进入国子监学习。在国子监里有满语文课，学习满语文的既有满族人，也有汉族人。顺治十七年（1660 年），掌翰林

① 《清世祖实录》，卷 11。

院事学士折库讷发现，国子监的学生学习数年后，还是搞不清所学的满汉文文义。查其原因，一方面是没有选到好的教师，一方面是学生耽（dān，音丹）于嬉戏荒惰，学习不专心。于是，折库讷建议，首先要选择精通满汉文义、品德纯正的人当教师；其次凡是满、蒙、汉身份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满汉语文，国子监按季度考试，礼部在年终考核，奖优罚劣。看来，国子监里教师和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水平都是不高的，逼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加强管理。

顺治元年（1644 年），京城八旗各设官学一所；二年改两旗合设官学一所，共官学四所，这就是八旗官学。八旗官学各设满、蒙、汉教习及助教，每个学校额定满、蒙、汉官学生人数。官学生学习满、蒙、汉语文和马步箭，每年春秋定期考试，学习 10 年期满后分别选用。康熙三十三年（1694 年）奏准，在盛京八旗左右两翼各设官学两所，共四所，选取俊秀幼童入学，教读满汉语文，兼习马步箭，由盛京礼部堂官考核。据上述可知，八旗官学的设立较普遍，培养对象为一般旗人子弟，教习的内容仍包括满语满文。

清代皇族子孙有宗室与觉罗之分，宗室是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直系子孙，觉罗是塔克世的旁系子孙。清代皇帝对皇族子孙的教育尤其重视，认识到这些人都是皇帝的股肱（gōng，音工）亲臣，出则受

命专征，入则赞襄（xiāng，音乡）政务，所肩负的责任重大，必须及时劝学，选官教授，使其学习诗书，通达礼义，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顺治九年（1652 年）奏准，满洲八旗各设宗学一所，共计八所，专收宗室子弟入学，教授满语文，汉语文的学习听其自便。顺治十一年（1654 年），谕令停止学习汉语文，专攻满语文。雍正二年（1724 年），改为八旗左右两翼各设宗学一所，共计两所，分别教习学生满汉语文，读书之余演习骑射。雍正七年（1729 年）又发上谕，指出宗学只教习宗室子弟，未能包括觉罗子弟，应令每旗各设觉罗学一所，共计八所，使觉罗子弟也能入学，教授其满汉语文和马步箭。宗学和觉罗学是专门为培养皇族子弟而设的学校，可以说是贵族学校，满语文和马步箭是主要教学内容，由宗人府奏派官员管理。

北京总管内务府是专门办理宫廷及皇室事务的机关，所属上三旗包衣佐领官兵及内管领下人丁都是皇帝的奴仆，地位虽然很低，但因为是伺候皇上的，故得到皇帝的格外照顾。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奏准，在景山前门左右连房设立景山官学，招收内务府上三旗佐领、内管领下闲散子弟入学学习。雍正六年（1728 年）又谕令内务府："咸安宫房屋现在空闲，着设立官学，将包衣佐领、内管领之子弟并景山官学生内拣选

颖秀者，或五六十名，或一百余名，入学肄业。”[①] 景山官学和咸安宫官学的学生，学习满语、汉语、翻译及箭术。

除上述官学外，还设有义学。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礼科给事中博尔济在题请设立官学的同时，建议设立义学，目的在于给未能进入官学的幼童以入学的机会。雍正七年（1729年），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刘汝霖奏准，汉军八旗每旗设立义学一所，教习汉军子弟学习满语文。

综上所述，清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注重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开设了国子监、八旗官学、宗学、觉罗学、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义学等各级各类学校，招收皇族子弟、八旗官兵子弟、包衣人丁的子弟入学，教授满汉语文和马步箭，应当说这是很有远见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满族人和汉族人长期杂居共处，逐渐放弃了满语文和马步箭，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清代统治阶级坚持“国语骑射”，在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面前是注定要失败的。从满族自身发展的角度看，“国语骑射”的破产并未使满族群众失去什么，恰恰相反，他们得到的是进步。

① 《清世宗实录》，卷75。

八

满语文中的汉语借词

研究清代满文文献，特别是清代满文档案，就会发现一种十分特殊的语言现象，即满语文中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大量汉语借词。既然文献上都是如此，在满族人之间日常口语交际中使用汉语借词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满语中使用的汉语借词，最多也是最常见的是音译汉语借词，包括完全音译和音译加满语注释的汉语借词。所谓音译汉语借词，就是把汉语原词的语音和意义一同借用或者在音译基础上再附加满文词的注释。

满语文中这类汉语借词，主要是衙署名称、职官名称、常用量词、常用普通名词，以至于某些动词。

例如：顺治皇帝改原设总管内务府为十三衙门的司礼监、尚膳监、尚方监等，康熙皇帝继位后恢复总

管内务府的广储司、会计司、掌仪司等，以及光禄寺、太常寺一类衙署名称；皇帝、皇后和将军、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府尹、提督、总兵、知县、书办等大小文武职官名称；斤、分、厘、毫，丈、尺、寸，顷、亩和间（房屋几间之间）等常用量词；牢、寺、庙、当铺、铺子、码头、船、楼、耳房、师傅、太监、举人、监生、贡生、童生、老爷、和尚、丫头、小子、木匠、泥水匠、皮匠、厨子、裁缝、水手、把式、鸟枪、方天戟、合子、匣子、瓢、抹布、火盆、椅子、椽子、瓦、蔴刀、接梨、红肖梨、砂糖、腊肉、戥子、天平、砝码、俸禄、钱粮、盘缠、绫子、彭缎、棉绸、痨病、敕命、诰命、硝、黄丹、关防、执照等大量常用普通名词。

上述汉语借词中，大多数是完全音译的，少数是满语音译再附加满文词注释的。例如："接梨"，"接"是满语音译，后面加上满文的"梨"作为注释。

满语文中除音译汉语借词外，还有一类是半音译半意译的汉语借词。例如："俸银"，"俸"是满语音译，"银"则是满语意译。其他诸如恩诏、本银、台丁、茶叶、人参局子（机构名称）、九卿等。

满语文中第三类汉语借词是意译汉语借词，就是吸收汉语词的意义用满文构词材料和构词方法构成的词。这一类意译汉语借词，在乾隆朝通过"钦定新清

语”大量增加，即将原来的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例如：吏部、先农坛、实录、圣训、上谕、甘结、保结、义学、斩决、凌迟等等。

尤其有趣的是，满语文中还有一些音译的汉语动词。例如：当差之当、讲经之讲、典当之典、批阅之批、封赠之封、夹刑之夹、裱糊之糊、刷印之刷和工程预算的料估等。这类汉语借词的构词方法是，音译汉语动词再附加上满语动词的词尾形式。

以上是关于满语文中汉语借词的简要介绍。下面再谈一谈满语文中汉语借词的特点。

首先要说的是，满语和汉语毕竟是两个不同语系的语言，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词被音译借到满语中时必然要受到满语语音等方面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例如：汉语中“椅子”一类词，借到满语文中时，发音为“椅色”，而不是“椅子”，即“子”的音变成了“色”的音。类似的词有戥子、骡子、厨子等等。“木匠”一类词，借到满语文中，发音为“木占”，而不是“木匠”，即“匠”音变成了“占”音。“当铺”一类词，借到满语文中，发音为“当铺哩”，而不是“当铺”，即在“当铺”后增加音节“哩”。

其次特别要指出的还有一点，即建州女真世居辽东，音译汉语借词时不自觉地受到了汉语辽东地方话

的某种语音影响。例如：泥水匠的“泥”，汉语辽东地方话发音为“迷”，借到满语里时，“泥水匠”的发音实际是“迷水占”。还有鸟枪的“鸟”，汉语辽东地方话发音为“秒”，借到满语里时，“鸟枪”的发音实际是“秒枪”。

此外，汉语辽东地方话中独具特色的一些词，也被音译借到满语中。例如：花子，即乞丐；光棍，指逞强立棍的无赖之徒，并非无妻之人。

大量汉语名词及某些动词被音译借到满语之中，也必然给满语文的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比较明显的是影响到满语的语音系统，使之增加新的语音成分及语音规律。例如：天聪六年（1632年）达海改革老满文时新增加的10个“特定字母”，就是为准确音译汉语借词的音而制定的。经过分析，实际上在满语中新添了三个满语中没有的音位。

为什么满语文中会有大量汉语借词，尤其是音译汉语借词呢？应当如何评价这样的语言现象？

对这样的语言现象，应当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大量汉语借词进入满语文，首先大大地丰富了满语词汇，有些汉语借词还成了满语文基本词汇的组成部分，促进了满语文的发展；其次是满足了满族人交际的需要，有利于满族人接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领域里的新事物，推动了满族社会的迅速

发展。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语言现象，应当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它。

首先，这同满族人，包括满族共同体形成前的女真人，彼此日益密切的联系分不开。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同汉族人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在广宁、开原、抚顺、宽甸的马市上彼此进行交易，许多女真人学会了汉语文。努尔哈赤及其父祖就经常出入马市，十分熟悉汉语文。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满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一些汉人加入进来，成为满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不少汉人被掠到满族贵族和官兵家中充当奴仆，学会了满语。在如此密切的关系中，大量汉语词被借到满语文中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其次，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清军大举入关，打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并迁都于此，满族成了中国的统治民族，满族贵族成为全国统治者。此后，满族人是以小集中大分散的状态处于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同汉人的接触更为密切、范围更加扩大，远远超过了辽东时期。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和思想给满族以巨大影响，所以出现大量汉语借词。如果说在辽东时期还主要表现在口语中，那么入关后在公文中也是如此了。

第三，满族是一个乐于学习、勇于进取的民族，不

排斥和拒绝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领域里的一切，大胆地借鉴。尤其是在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建国创业时期，更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满语中出现大量汉语借词是必然的。

总之，满文的创制和改革以及满语文中大量使用汉语借词，这都是满族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满族的进步，是人的主观愿望无法改变的。

九

汉语文中的满语借词

汉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汉语文作为汉文化的载体，伴随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变迁，它也不断借鉴、吸纳少数民族和域外民族语言文字的精华，逐渐丰富和完善自己。汉语文中就有不少满语成分，这是满汉两个民族长期密切交往的结果。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形成的满族共同体，是以女真人为主体，包括有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在内的多种民族成分。

满族从开始形成的时候起，便同汉族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天命十年（1625 年）努尔哈赤力排众议迁都沈阳，满族乃从辽东山区进入了辽沈平原，同汉族的联系就更为密切了。满族中从上层人士到普通百姓，都有一些人懂汉语、识汉文，可以用汉语文和汉人进行交际。

这个时期，满汉人赖以交际的汉语实际上是辽东地方话，其通行区域以沈阳为中心包括抚顺、新宾、本溪、海城、新民等地。

顺治元年，清兵入关，打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城并西进南下，夺取了全国政权。顺治皇帝又迁都北京，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满族官兵除一部分被派驻全国要冲地方外，大部分集中居住在京畿（jī，音基）地区，满汉两族人民开始了新的交往。

这个时期，满族人用汉语辽东地方话同京畿地区的汉人进行交际，而京畿地区汉人使用的汉语亦属北方方言，同辽东地方话差不多。汉语辽东地方话与京畿地方话相结合，成为满汉人进行交际的工具。

由于满汉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密切，语言文字上也必然互相影响，除满语文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外，汉语文中同样也吸收不少满语词。

因为汉语辽东地方话和京畿地方话是满汉人民进行交际的主要工具，所以二者中满语借词最多、最有趣，也最值得探讨。据笔者了解，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为了说明方便，以下满语词用罗马字转写，汉语词用拼音方案转写。

第一，爵秩名称。本来是满语爵秩名称，在公文、封谥、碑刻中一直音译成汉文使用（有的已意译成汉

文），遂进入汉语词汇。例如：贝勒、贝子、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等，均属此类。贝勒，满文作 beile。崇德元年（1636 年）仿明制定爵秩，贝勒成为宗室封爵之一，前面冠以多罗二字，为宗室封爵的第三等。此前，努尔哈赤曾称作“淑勒贝勒”（sure beile），义为聪睿贝勒。其子侄亦称贝勒，是满族亲贵的尊称。贝子，满文作 beise。最早，贝子一词为贝勒的复数形式，即众贝勒。崇德元年定爵秩，贝子成为宗室封爵之一，其前冠以固山二字，为宗室封爵的第四等。精奇尼哈番，满文作 jingkini hafan，系头品世职，汉译为子爵。阿思哈尼哈番，满文作 ashan i hafan，系二品世职，汉译为男爵。

第二，职官名称。本来是满语，在公文中经常出现，久而久之亦进入汉语词汇。例如：笔帖式、拜唐阿、阿哥、格格、包衣、苏拉、布特哈等。笔帖式，满文作 bithesi。清代内外衙署中专司文书档案之员，有有品级和无品级之分。拜唐阿，满文作 baitangga。清代衙署内无品级听差之人和随营听用的匠人等，均直呼为拜唐阿，汉译为执事人。阿哥，满文作 age。清代，只有皇族子弟才能称阿哥。格格，满文作 gege。清代，除公主之外的贵族之女才能称格格。包衣，满文作 booi 或 booi niyalma 或 booi aha，泛指为皇室、贵族及官兵服役的奴仆。苏拉，满文作 sula，泛指满族人中无差使

的闲散之人，汉译就是闲散。布特哈，满文作 butha。butha，义为渔猎。清代设布特哈总管衙门，专司采集、渔猎，供皇室之用。其所属之人丁称 butha niyalma，简称布特哈。

第三，地名。本来是满语地名，经过变化，但仍沿用至今。因用汉字译写，往往使不懂满语的人感到无法理解。例如：依兰、聂尔库、阿伙洛等。依兰，满文本作 ilan hala，意思是三姓。后来满文简略成 ilan，汉字译写作依兰，即今黑龙江省的依兰县。聂尔库，满文作 niyelku，义为碾子。此地在今辽宁省新宾县，估计此地因有大碾子而得名。阿伙洛，满文作 aha holo，aha 是奴仆，holo 是山沟、山谷。后省称阿伙洛，今在辽宁省新宾县。

第四，一般名词。这些名词都是满语词音译，主要是在辽东地方话和京畿地方话中使用，久而久之成了汉语词汇中的词。例如：萨其玛、温普、噶拉哈、哈拉巴等等。萨其玛，满文作 sacima，是满族的一种糕点，又名糖缠。温普，满文作 umpu，即山里红或山楂及其制品，京畿地方话中常见。噶拉哈，满文作 gacuha，猪或羊的背式骨，学名“髌骨”，满族人的一种玩具，辽东地方话中常有此称呼。哈拉巴，满文作 halba，即猪或牛的肩胛骨，乞丐用以互相敲打唱和招徕观众或向商店老板索要钱物。

第五，某些形容词。这些词本是满语，音译后借到汉语中，成为汉语词了，以致人们并不知道它本是满语词。例如：邋遢（lā tā），满文作 lata，原义为迟钝的，借到汉语中后词义稍有转移，变成不干净的意思了。拉利（lá li），满文作 lali，义为爽快、利落，京畿地方话常用，如说“他办事真拉利”。

第六，某些副词。这些副词和上面所说的形容词一样，被借到汉语中而成为汉语词了。例如：挺、敞开等。挺，义为很，挺好即很好。“挺”字来源于满语的 ten，稍有音变。敞开，满文作 cangkai，只管、尽管的意思。

第七，某些动词。满语动词借到汉语中时，一般只用词干，去掉词缀，发音和声调有所变化。例如：辽东地方话中的 hēnde，即斥责、数落，系由满语动词 hendumbi 演化而来。hendumbi 一词的含义是说、谈。再如：京畿地方话中的 fānzhe，意思是因生气而数落个没完没了，系由满语动词 facambi 而来。

总之，汉语文中也有满语借词，就如同满语文中有汉语借词一样。汉语文中的满语借词，集中体现在辽东地方话和京畿地方话中，这是因为满族曾经在这两个地区集中居住较长时间，同汉族人关系密切的缘故。辽东地方话和京畿地方话中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满语借词，充分说明了满汉两族人民之间悠久的历史联

系，是割不断、分不开的。满语文因为有了汉语借词而得到丰富和发展，同样，汉语文也因为有了满语借词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十

乾隆皇帝对满语文的规范

清代的乾隆皇帝，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都可以说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精通满、蒙、汉等多种语文，特别关注满语文及其发展，对满语文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及时地作出指示，为满语文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关注语文并就一系列问题作出指示的皇帝，还是不多见的。

第一，下令将满语文中大量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

清初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满族贵族刚刚入关并开始统治全国，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了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和制度，反映在满语文中就是大量音译汉语借词的使用。这一点，在现存的清初顺、康、雍三朝公文档案中可以得到证明。

乾隆皇帝对此十分不满，尖锐地指出："近见清语中杂以汉语，语熟成风，乃将可以译成清语者仍用汉语，而书于章奏者往往有之。朕随所见即为改正，复派大臣详查更正。"[①] 所谓"清语中杂以汉语"，就是指满语文中使用音译汉语借词。音译汉语借词，就是将汉语词直接用满文拼写出来或直接用满语说出来。所谓"语熟成风"，就是说使用音译汉语借词非常之多，已经到了"成风"的地步，甚至在给皇帝的奏章中也是这样。乾隆皇帝对此很不满意，一方面在奏章中见到了即予改正，一方面派大臣调查研究设法纠正。如何纠正？总的原则是"可以译成清语者"一律译成清语，也就是说用意译汉语借词取代音译汉语借词。为此，乾隆皇帝还举了一些例子作示范。比如，"宗人府"这个衙门，过去一直用满语音译，今后必须意译为"管理宗室之衙门"。北京各部院衙门的内部机构，有的叫"某某省清吏司"，今后只准省名仍用音译，"清吏司"必须改为意译。

根据乾隆皇帝的这一指示，大学士讷亲等先后调查研究了数以百计的衙署、职官、殿阁、楼台、地方、汉文典籍等名称并改音译为意译，报经乾隆皇帝审阅批准。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第308册，第11—25页。

第二，指出意译汉语借词中的问题并予以纠正。

乾隆皇帝凭据其扎实的满汉语文功底和广博的文化历史知识，指出了一系列意译汉语借词的毛病并予以纠正，从而使意译汉语借词更为精确。例如，“陋规”一词，在清代官场中是一个常用词，其含义是指公务活动中不合理或不合法却人人习以为常的收授银两的某些规矩。最初意译为 ehe doro，即“恶道”。乾隆皇帝指出意译得不准确，命大臣阿兰泰查奏。五十四年（1789 年）阿兰泰奏称：“遵旨查得，‘陋规’一词，在成语中为‘恶道’，实与圣上洞查之汉字意思不符。今臣等酌定为 dubike hacin i menggun 即‘敛取项目之银。”[①] 前后两个意译相比，后一个意译更贴切一些。类似的例子还有，限于篇幅，不一一赘述了。

第三，注意到有声调的汉语词在音译成满语时出现的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也就是说词有不同的声调并据以区别词意。如“金”和“锦”，前者是阴平，后者是上声，词意根本不同。满语是无声调的语言，在将汉语人名或地名等某些名词音译成满语文时，就发生了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仍以“金”、“锦”二词为例，在汉语中他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连一个小学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第 339 册，第 2 页。

生都能说清楚，不仅写法不同，其声调也不同。但音译到满语文中就发生了问题，“金州”和“锦州”音译到满语文中从读音到字形完全一样，你无法分清是“金州”还是“锦州”，只得从其他方面去分析和估计可能是哪里。乾隆皇帝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提出按“金”、“锦”意译“金州”和“锦州”，以示区别。这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它表明乾隆皇帝实际上注意到了有声调语言的词在音译成无声调语言的词时必然发生的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谕令刊刻《对音字式》以规范满语词音译成汉语词时的用字。

实际社会生活中有时也需要将满语文中的词音译成汉语文，比如满语文中的人名、地名等。满语文词音译成汉语文时有一个用字问题，即汉语文中同音字不少，究竟用哪一个，需要规范。如若不然，不同人音译成不同的汉字，同一个人不同时候音译成不同的汉字，势必造成混乱和错误。对此，乾隆皇帝指出：“从前，凡人、地之满洲、蒙古名写成汉字时，每每不同，特刊刻《对音字式》一书……”[①] 这里有两种情况需分别予以说明。第一种情况，满语文的某些词，很

① 《黑图档》，第 341 册，第 31—32 页。

容易在汉语文中找到相当的字代替其音，只是需要统一，用其中的一个汉字即可。在涉及人名、地名时，这样要求是绝对必要的。第二种情况，满语中的某些音位，汉语中没有，满语的拼音规则和汉语的拼音规则又有所不同，因而在将满语文中的某些音节音译成汉语文时尤其需要硬性的加以规定，以防止发生混乱。如满语中的舌尖颤音，汉语中就没有这个音位，《对音字式》中规定只能用汉字“尔”代替。舌边音，满汉语均有这个音位，《对音字式》规定只能用汉字“勒”对应。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将满语中的舌尖颤音用汉字“勒”对译，而将满语中舌边音用汉字“尔”对译。乾隆皇帝未能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说明为什么满汉对译人、地名时会“每每不同”，但他发现了这是个问题并用《对音字式》加以规范，对克服满汉对译中出现的这方面的混乱是有益的。

乾隆朝，由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皇帝本人的重视、干预，对满语文实行大规模的规范，主要是将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进一步丰富了满语文的构词手段和词汇，使满语文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皇帝对满语文发展的重大贡献。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像乾隆皇帝这样关注本民族语文并为其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帝王是绝无仅有的。

十一

乾隆皇帝与满语地名

乾隆皇帝精通满、蒙、汉三种语文，还对藏、维语文有所了解。他一生离京出巡多次，到过全国许多地方，历览山川名胜。对地名的翻译和释义等问题，他很重视，发布过一些上谕，有独到的见解。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第一，关于汉语地名译成满语问题。

由于清代官文书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要用满文书写的，于是就出现了汉语地名如何准确翻译成满文的问题。乾隆四十六年(1777 年)，他在一件上谕中说："补写各处城池清字名称时，应当有所区别。如盛京所属金、锦二州，金、锦二字迥然不同，而补写清字时竟成一体，概作 gin jeo，毫无区别。"①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第 113—5789 卷。

乾隆皇帝能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应当说是很不简单的，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对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其实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就很容易说明白这个问题。满语是无声调语言，不用声调区别词义，而汉语是有声调语言，用声调区别词义。在汉语中，“金”、“锦”二字，声母和韵母完全相同，只是声调不同，所以字形和字义就全然不同。但是，要把“金州”和“锦州”两个地名音译成满语，则均作 gin jeo，单看字面是无法区别出是“金州”还是“锦州”的。类似的情况很多，比如“山西”和“陕西”等。

怎么解决这类问题呢?乾隆提出改音译为意译，即取“金”、“锦”二字之义，将“金州”译作 aisin jeo，aisin 是黄金的意思，将“锦州”译作 junggin jeo，junggin 是锦缎中的锦。乾隆皇帝的这个主张，也不失为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办法。但这个方法还是有局限性的，不一定普遍适用。比如“山西”和“陕西”，这个办法就不适用，后来在清代公文中约定俗成为 sansi（山西）和 šansi（陕西）。

就在这件上谕中，乾隆皇帝下令军机大臣：“山海关外所有城池府州县，凡无清字名称者，均查取其地方之意义加以翻译，经朕钦定后晓谕各地，遇有清字折奏事件一体使用之。”此件上谕附录有满汉文对译的地名，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新译满语地名”，一类

是所谓“旧有满语地名”。

第二，关于满语、蒙古语地名翻译成汉语问题。

满语和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满语和汉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满语无声调，汉语有声调，前面已经说过了，兹不赘述；另一个方面是音位有所不同，满语中的某些音位是汉语中没有的，汉语中的某些音位又是满语中没有的。这样一来，在把满语（包括蒙古语）地名音译成汉语时必然会遇到发音的困难，因而也就出现了是否准确的问题。

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发布上谕，对此作了具体指示：“向来内外各衙门题奏事件，凡遇满洲、蒙古人地名应译对汉字者，往往任意书写，并不合清文、蒙古文本音，因而舛（chuǎn，音喘）误鄙俚之字不一而足，甚至以字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zhì，音至），尤属可笑。”“着交军机大臣，依国书十二字头酌定对音，兼写清汉字样，即行刊刻成简明篇目，颁行中外大小衙门。嗣后遇有满洲、蒙古人地名对音，俱查照译写，俾（bǐ，音比）各所遵守。”[①] 这显然是强调满语、蒙古语地名音译成汉语时必须规范化，不能任由个人随心所欲地使用汉字。

① 《盛京内务府档》，第 113—260 卷。

从实践上看，这是完全必要的。例如，满语有舌尖颤音 r，汉语没有这个音。满语地名 sarhū hoton，按照规定只能对译成萨尔浒城，不能对译成萨勒浒城。如果单从语音角度讲，汉语既然没有舌尖颤音 r，对译成“尔”或“勒”都是可以的，但这容易造成误会，毕竟萨尔浒城只有一处。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颁行的《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对规范满语地名的汉语音译具有重要作用。

另外，乾隆皇帝还规定，用汉字译写满语、蒙古语地名时不准用略称。他在上谕中说，内外各衙门题奏事件，遇有地名时，只图省事，常常把地名略称一个字，其谬不可枚举。如热河只称为“热”，多伦诺尔只称为“诺”。在正式文件中，作这样的硬性规定，应当说是有道理的和必要的。

第三，关于满语地名释义问题。东北地区有很多地名是满语的，但因为用汉字译写，历时既久，发生变化，为后人的解读造成许多困难。有的人望文生义，无根据地臆断猜想，胡乱地加以解释，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也给地名工作造成混乱。乾隆皇帝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出了具体的示范。

今辽宁省的抚顺市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为防止元朝残余势力的袭击，于洪武十七年（1384 年）修建了抚顺城。努尔哈赤在天命元

年（1616 年）建立后金政权前后，就给抚顺取了另一个名字——抚西。这一点，在《满文老档》等文献中都可以查到。甚至明抚顺所游击李永芳投降后金，娶阿巴泰之女，号为“抚西额驸”。抚顺为什么被后金叫作“抚西”？“抚西”的含义是什么？有的人认为是满族人误将“顺”译成了“西”。今天还有的人解释为抚顺马市上的东西便宜，所以被满族人称作抚西。

其实，上述的释义都不正确，还是乾隆皇帝作出了正确的解释。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八月，乾隆皇帝东巡经过抚顺时发了一道上谕，说抚顺之地清字写作抚西，原来并不是写错了对音，大概是明朝取抚绥使我们女真人顺从之义而名之为抚顺，我们就取令明朝人剃发之义而名之为抚西。看来，抚顺和抚西之称是各取其义，不是没有道理的。嗣后，关外这一类地名，不必照汉字对音译写，仍旧依照清语书写。据此上谕所说，我们知道满语动词 fusimbi 是剃发的意思，其命令式是 fusi，即令人剃发，汉语对音就是“抚西”。由此可知，是满族上层把抚顺称作抚西的，“抚西”既不是写错了对音，也不是这里的东西便宜，而是当时满族上层针对“抚顺”而起的名，既然你要“抚顺”我，我就要令你“剃发”，使你归服我。无疑，乾隆皇帝的这个释义是正确的、权威的。

当然，这里也应当说明，乾隆皇帝硬说明初设抚

顺城是针对其祖先的，这是强词夺理，歪曲历史事实。近年抚顺市的曹德全同志在《抚顺辨义》一文中作了颇有见地的阐述，明洪武皇帝筑城防范的是元朝残余蒙古势力，并非女真人。如果说明朝意在“抚顺”的话，那也不是要“抚顺”女真人。乾隆皇帝如果不是无知的话，那就是有意歪曲史实，然后借题发挥，这显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他对“抚西”的释义。

地名，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客观存在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阶级社会里，有些地名被打上了阶级的和民族歧视的烙印，这并不奇怪。乾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对地名给予很大的关注并回答和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十二

满语文的衰落

尽管清代前期历朝皇帝，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十分强调“国语”、“国书”，要求包括满族官吏在内的所有满族人都必须学习和使用满语文，同时相应地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但满族人还是逐渐地改习汉语文而放弃了满语文，满语文无可挽回地衰落了。

满语文的衰落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不是突发的剧变。据考察，乾隆朝可以说是转折时期。此前，满语文呈向上发展趋势，到乾隆朝达到发展的高峰；之后，满语文便走上了下坡路，日趋衰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不再作为交际的工具被使用。

保存下来的清代满文公文档案，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是官方文书，足以代表满语文的写作水平。本文主要依据这些公文档案来探讨满语文的衰落。

首先，我们从总体上来看看满文的使用情况。翻阅盛京内务府同北京总管内务府的来往公文，可以明显地看到，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几乎全部是用满文书写的，乾隆、嘉庆两朝的是满汉文参半，道光朝以后的则以汉文者居多，直至全部用汉文书写。由此可以肯定，清代前期满文的使用还是相当普遍的，后期情况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汉文取代了满文。

其次，让我们再看看满文的使用水平情况。阅读满文档案文件，可以明显地看到，清代后期满文档案文件中满文的书写及用词造句等方面的错误屡见不鲜，与乾隆朝以前的满文档案文件相比，真令人有隔世之感。例如，错字比较多，缺点少圈的有，笔画错误的也有，令人难以辨识。满文动词的形态变化是特别丰富的，不同的词尾表示不同的语法意义，均有严格的使用规则，但文件中实际使用时与规则相悖（bèi，音背）的情况比较多见，令人难以理解句意。满文的格助词不少，各有不同的用法，文件中使用不当的实例相当多。在遣词造句方面，清代后期的满文档案文件明显地不如乾隆朝以前的通顺易懂。究其原因，正如乾隆皇帝所指出的，“拘泥汉文字义，牵缀为文，于国语神理全未体会”[①]。其实这就是用汉文套满文，或

① 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第69页。

者说是按汉语句法写满文。这样写出来的满文语句，不合乎满文的“神理”，必然令人难以理解。更有甚者，一些满族官员满文水平太低，已经不能用满文给皇帝写题本或奏折，皇帝不得不“俱准其用汉字缮写，庶声叙较可明晰，不致牵混”①。无疑，这也是满语文衰落的表现。

第三，还有一些违背满文书写规则硬性学习汉文的怪现象出现，更令人觉得不伦不类。稍懂满文的人都知道，满文的书写规则是，每行自上而下竖写，各行从左至右移写。旧时汉文，每行自上而下竖写，各行从右至左移写。在清代后期的公文抄存簿中，竟有硬性学习汉文者，满文文件各行也从右至左移写。此外，众所周知，汉人有姓又有名，汉族大臣在题本或奏折的开头首先必须写明职务和姓名，当抄录留存时往往只写职务和姓，名略而不具。满族人一般只写名，不写姓，如“双成”，这就是名，不是姓“双”名“成”。在抄存满族官员的题本或奏折时，竟然也在职务后取其名中的一个字当作姓，不写名中的其他字。这种置满文书写规则于不顾，硬性学习汉文的现象，除了说明满文在衰落还能说明什么呢？

第四，在满语口语方面，衰落的情况是更为突出

① 《清高宗实录》，卷 1477。

的。满族入关之初，居住虽然是相对集中的，但从整体上看，毕竟是生活在汉族这个汪洋大海之中。除满族人之间的交际用满语外，同汉人的交际是必须用汉语的，因此很多满族人学会了汉语乃至汉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人之间的交际也逐渐由汉语取代了满语。

早在雍正朝，为皇帝挑选的侍卫、护军中许多人就都说不好满语了，平时尽用汉语互相开玩笑。这是雍正皇帝发现并在上谕中指出的，显然是真实的。在清代，只有满族贵族子弟才能当上侍卫，护军也都是从八旗兵丁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人都说不好满语，满语的衰落也就显而易见了。

如果说雍正朝说不好满语的人还不是很多，问题尚不严重，那么再让我们看乾隆朝的情况。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皇帝在一道上谕中说，理藩院侍班官内有千人，不仅满语生疏，甚至有根本就不会说的。这些人都是满族，办理的又都是满文文件，如果满语满文一点都不明白，怎么处理公务呢？据此推断，理藩院内不会说满语的人肯定还有不少。显然这是衙门里的低级官员的情况，再让我们看看高级官员如何。乾隆三十年（1765 年），驻伊犁大臣伊勒图奉召回京晋见，乾隆皇帝发现他的满语比以前生疏，便推断驻伊犁大员肯定都讲汉语，不以满语为重。于是责成伊犁

将军明瑞务必禁用汉语，演习清语，如果再发现由伊犁来的大臣满语生疏，便唯明瑞是问。由此看来，满族大员的满语水平也是越来越不行了。至于普通满族老百姓，据乾隆皇帝的说法，清朝定鼎一百多年以来，八旗满洲、蒙古子弟，因其父祖生活在京城，不仅蒙古语不能兼通，就是满语也日渐遗忘了。总之，从满族普通老百姓到中下级官吏再到高级官员，都逐渐地改习汉语汉文了，满语满文的水平日益下降。因为满语满文水平不符合要求而丢官的事不少，如咸丰初年户部侍郎麟魁，就是因为不熟悉满语不得不退出清朝的中枢机关——军机处。

满语文的衰落，这是清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清代统治者尊崇“国语”、“国书”，令满族人认真学习和使用，又开设学校让满族子弟自幼学习，并作出许多具体规定，但终究没有阻止满语文走上衰落的道路。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满族人同广大的汉族人杂居共处，接受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日深，汉语文逐渐取代满语文成为满汉人之间乃至满人之间唯一的交际工具。这是清代统治者始料不及的，也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文这方面，满族人充分地表现了积极、主动、进取的精神，一部分人在此基础上钻研汉学并用汉语文著述，创作出一批旷世之作，极大

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也就在这学习使用汉语文并用汉语文进行研究和著述的过程中，满族自身也得到了空前的进步和发展。历史表明，满汉族人民早已牢固地凝聚在一起了，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们分开的。

十三

锡伯语文与满语文

如果要问锡伯语文与满语文是什么关系？可以这样回答：锡伯语文是满语文的继承和发展。

锡伯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现今保存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沈阳太平寺锡伯家庙碑的碑文记载，早在顺治朝以前，锡伯族就已定居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附近绰尔河流域。当时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

据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锡伯族档案史料，清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将科尔沁蒙古编旗时，隶属于科尔沁蒙古的锡伯族人也一同被编旗，接受清朝皇帝的统辖。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科尔沁蒙古王公应清朝皇帝的要求，将所属锡伯族人“献出”。清政府即将这 1 万余名可披甲当差的锡伯族人编成 74 个佐领，调拨至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处驻防。从

此，锡伯族人不再隶属于科尔沁蒙古，而由清政府直接管辖了。

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99年至1701年）间，清政府又将驻齐齐哈尔和伯都讷的部分锡伯官兵调到盛京各地，补充这些地方驻防八旗官兵的缺额，另将驻吉林乌拉的部分锡伯官兵调去京城。这样一来，锡伯族人先是离开原驻地分散至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继而又移驻盛京各地和京城，并被编入满洲八旗，原集中居住的状况被打破，同满族的关系更为密切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锡伯族人逐渐地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改习满语满文，而且学习得很好。乾隆皇帝在四十三年东巡盛京时，曾驾临北塔法轮寺，为了“法轮演国语”[①]，下令将北塔法轮寺改为满洲喇嘛寺，挑选满洲喇嘛念诵满文经卷。盛京将军弘晌办理此事时，发现满族人不愿意当喇嘛，只好在锡伯族人中选得年龄在18岁至28岁之间会满语满文的人30名充当喇嘛。由此可见，当时锡伯族人的满语文水平是相当高的，甚至超过了满族人。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政府为加强西北边防，抽调盛京各地锡伯官兵一千余名，编成一个营，令

① 赵志强：《北塔法轮寺与蒙古族满族锡伯族关系述论》，《满族研究》，1991年，第3期。

其携带家眷西迁新疆伊犁地区驻防。这部分锡伯族人历尽千难万险，行程1万余里，走了一年多，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由于这部分锡伯族人居住比较集中，当时公文往来用的全是满文，加之当局严格限制他们和其他民族的往来，这就在客观上为保持锡伯族已经习用的满语文创造了条件。相反，留在盛京和北京等地的锡伯族，和满族一样逐渐地改习汉语文了。

通过以上的介绍，锡伯族是怎样改习满语文以及西迁新疆的锡伯族是怎样坚持使用满语文的，就十分清楚了。

但是，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新疆的锡伯族，在驻边守卡和保家卫国的同时，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得到发展。同其他民族的交往，虽然受到限制，但也日渐频繁，互相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锡伯族使用的满语文获得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

新疆的锡伯族，除使用满语文外，一般还都懂汉语文，有的人还会讲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其他民族语，所以被称为“翻译民族”，这也为锡伯族使用的满语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们知道，语言文字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词汇上。词

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当然，词汇中的基本词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也并非绝对不变。词汇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为新词的出现、旧词的消失、词义的转移和外来词的借入。

新疆锡伯族使用的满语词汇的发展变化也遵循着这条规律。从词汇中消失的词，如 booi da（管领）、bithesi（笔帖式）、bukdari（奏折）、karu temgetu（回投）等。新产生的词，如 dashalan（革命）、holboro jafan kooli（婚姻法）、helmefin（电影）、tuwai sejen（火车）等。词义转移，如 dergi，原指东，转为指西；wargi，原指西，转为指东。从汉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借入的词，如 tolaji（拖拉机），借自汉语；gobi（戈壁），借自蒙古语；kᶜantuman（坎土曼），借自维吾尔语，等等。

新疆锡伯族使用满语文至今，经过规范，把原有的第六个元音去掉，只保留前五个元音，表明语音方面也有所变化。

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在语言中是比较稳固的部分，但也并非绝对不变。

满语名词、代词、动名词等词类，均有格的语法范畴，而且丰富多彩。新疆锡伯族在长期使用中又有所发展，增加一个格助词 mak，表示“共同”和“使用”的语法意义，这是满语格助词中所没有的。

满语动词有式的语法范畴多种，新疆锡伯族在长期使用中也有所发展，能更准确地表达各种语法意义。

综上所述，西迁到新疆的锡伯族长期使用满语文作为交际的工具，在语言实践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词汇到语音、语法，不断地规范或约定俗成，使满语文向前发展了。1947 年，伊宁“锡（伯）索（伦）文化协会”的有识之士，在锡伯族学者萨拉春的倡议下，对满文字母实行改革，规定了 5 个元音字母、24 个辅音字母、10 个拼写外来语的特定字母。同时对个别字母的写法作了修改，加以规范。此外，还规定了 12 种标点符号及其用法。这次文字改革标志着现代锡伯语文的形成。此前，新疆锡伯族一直把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称为满语满文。经过改革的满语满文，从满语满文脱胎而来，满足了处于新的历史时代的新疆锡伯族人民群众交际的需要，成为一种新的民族语文——锡伯语文。

今天，生活在新疆的锡伯族，对小学生普遍用锡伯语教学，有锡伯文课本；在行政工作、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锡伯语文受到尊重并得以使用；锡伯文的《察布查尔报》，创刊于 1946 年，几经变迁，坚持出版至今；1955 年和 1956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各自设立了锡伯文编辑室和编译室，开始出版锡伯文图书，满足了锡伯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

锡伯语文是对满语文的继承和发展，这是锡伯族对满族文化的一大贡献，更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

十四

满文文献的分类及典藏

由于清代皇帝十分强调“国语”、“国书”并大力推行，所以有清一代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满文文献，即或不说是浩如烟海，亦可称为汗牛充栋。

现存的满文文献，按其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作四类，即档案类、著译类、谱牒类、碑刻类。

档案类，指的是清代各级国家机关及官员用满文书写的公文和公文汇抄档册以及图籍等。

由于清代的文书档案制度比较健全，执行得较为严格，加之距今不算太久，所以保存下来的满文档案就相当多。例如，清代重臣大吏的满文题本和奏折，经皇帝朱批后，一般要发还给本人阅看，到年底再统一上缴封存，这就保证了题本和奏折不至于散失。再如，所有的题本和奏折，在文书处理过程中都要由相关部门抄录成册，以备日后需要时查阅。这样一来，除公

文原件外又形成了公文的抄存档册。抄存公文的制度，各机关都要执行，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大量的抄存公文的档册。还有，清代国家机关一般都设有承办公文和档案的部门，称为档案房，用以保证公文的运行和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清代满文档案和汉文档案一样，又分为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三种。上行文有题、奏、表、笺、呈、禀等，平行文有咨、移等，下行文有制、诏、诰、敕、札等。上行文中的题、奏、表、笺，是专门给皇帝的；呈，是下级机关给上级机关的；禀，是平民百姓给官府的。平行文中的咨、移等，是平级机关之间行文时使用的；下行文的制、诏、诰、敕，是皇帝给臣民的；札，是上级机关给下级机关的。

清代满文档案，在国内，主要保存在中央和省（区）、市、县各级档案馆里。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保存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的专门档案馆，其满文档案数量最多，约有140余万件。因为是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其内容涉及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价值尤为珍贵。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西藏等省（区）省级综合性档案馆里，也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这些档案是由地方国家机关形成，因而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地方性，其中以有关边疆、民族方面的内容为最重

要。

除档案馆外，在一些较大的图书馆里也保存有满文档案。如大连图书馆就藏有清代北京总管内务府满文题本数百件。

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也保存一批清代满文档案，其中包括著名的《满文老档》原本，即《旧满洲档》。这批档案是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由南京运去台湾的。

在国外的个别图书馆、档案馆里还保存一些清代满文档案。日本的东洋文库就存有清代镶红旗都统衙门的档案——《镶红旗档》，据说是日本人从中国书摊上买去的。另外，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的档案，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时，曾被沙皇俄国掠走，后于1956年由苏联政府交还我国，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据了解，我国保存有清代满文档案的档案馆，对这部分档案都很重视，尽量改善保管条件，以延长其寿命。有的馆将原件进行缩微拍照，以胶片提供利用，保护原件。已经破损的档案，加以托裱修复，防止其继续损坏。

著译类，指用满文撰写的论著和用满文翻译的汉文典籍。

用满文撰写的论著，留传下来的不多，因而越发显得珍贵。曾涛的《随军纪行》以日记形式用满文写成，记述了作者亲身参加平定“三藩”的经历。原有四卷，今仅存第四卷，现藏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松筠用满文辑录的《百二老人语录》，记录了120位老人的语录，反映了满族的兴起及各朝政事。

满族统治者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实际需要出发，早在入关前就开始翻译汉文典籍。已经译成满文的汉文典籍有：明《刑部会典》、《通鉴辑览》、《三国志》、《春秋》、《万宝全书》、《三略》、《六韬》、《素书》、《孟子》、《水浒》、《金瓶梅》、《西厢记》等等。

这些满文著译，现今多保存在中央和省（市、区）的图书馆里，其中经北京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藏量为最多。

早在30年代，李德启、于道泉先生就将当时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满文图书编目，名为《满文图书联合目录》。197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又编成了《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收入814种。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还出版了《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收入满文文献1 122种。后两个目录扩大了收入范围，更便于人们利用。

谱牒类，指用满文编写的家谱及世系图谱，包括皇帝家谱——玉牒。

满族学习汉族，注意纂修家谱。同时，满族社会的一些制度也决定了必须纂修家谱。例如，世管佐领是世代承袭的，为了说明承袭关系，必须纂修家谱。满族人的家谱中有一些就是用满文书写的，有的全部用满文书写，有的早期用满文书写而后期又用汉文书写。

满族人家谱中最典型、最庞大、最精美的则是皇帝的家谱——玉牒。清代玉牒用满、汉两种文字分别缮写，但其形式和内容完全相同。玉牒分册，册的大小不一，大者需数人共抬才能搬动。玉牒每修数部（每部包括满、蒙、汉多种文本），正本存北京景山内的寿皇殿，另抄一部送到盛京宫殿内的敬典阁存放，宗人府保留副本。现今，北京的玉牒正副本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盛京的玉牒（仅有满、汉两种文本）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

一般满族人的家谱，有的早已散失，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四旧”毁掉，现存的已经不多了。

碑刻类，指的是满文碑刻，包括墓葬碑刻、封诰碑刻、军功碑刻、寺庙碑刻、宫殿碑刻等。

一般碑刻都是满汉文合璧的，还有满、蒙、汉、藏多种文字合璧的，纯满文碑刻较少。

满文碑刻，由于多种原因，损失的很多，所幸的是尚有碑文拓片可看，不过也有无拓片可看的，实在令人扼腕。

据197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和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合编的《北京满文石刻拓片目录》，计有642种。这当然不是现存满文石刻的全部。

沈阳太平寺锡伯族家庙碑，是只用满文刻的，现存沈阳故宫博物院。经专家学者研究，对今人了解锡伯族原居住地及迁徙情况颇有帮助。

总之，我国现存满文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满文文献，绝大多数已被收藏在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中，受到较为妥善的保护。对于清史、满族史及满语文等学科的科学研究，这些满文文献无疑是极珍贵的资料。

十五

《满文老档》的原本

以往有人把所有满文档案一概称之为“满文老档”，这是不正确的。其实，《满文老档》是专指记录清入关前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清崇德元年（1636年）间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重大活动的编年体史书，有原本、重抄草本和正本几种本子。

《满文老档》这一名称，是本世纪30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提出的，已被多数专家、学者承认和接受。

下面就《满文老档》原本的形成、保存、发现、公布及价值等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

《满文老档》原本是清入关前形成的。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继位，于1636年改元崇德，建国号大清。皇太极于天聪三年（1629年）设置文馆，命库尔缠等

人记注国政。《满文老档》原本就是库尔缠等人记录和整理出来的档册。因为此本首页残缺，故实际所记有可能早于明万历三十五年。

《满文老档》原本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所用纸张，既有明朝辽东地方政权机关的废旧公文，又有自朝鲜输入的高丽纸，这是因为当时纸张十分缺乏的缘故。由于纸张大小不一，形成的档册也大小各异、厚薄不同，很不整齐。

第二，所用文字，既有努尔哈赤时期创制的无圈点老满文，也有皇太极时期改革后加圈点新满文，还有蒙古文和个别的汉字。从语言角度看，句子比较短，语法不规范，夹杂一些口语。因此，今人阅读起来比较困难，就是乾隆时也是如此。

第三，因为有多人参与记录和整理，档册上的字体不同，而且记事有重复、时间有颠倒。

第四，因为有整理过程，所以档册上有许多删改痕迹，或圈画，或涂抹，或增添，或改写，或加注，混乱得很。

《满文老档》原本，在清入关前是保存在盛京的，清入关后才送至北京。何时送至北京，现在尚未查到有关记载，但可以肯定是在乾隆六年（1741 年）以前，因为这一年在北京内阁大库中查到了该原本并加以装裱。

《满文老档》原本的发现并披露于世，已经是民国年间的事了。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当时民国政府优待逊帝溥仪，准其继续住在宫中。这时，《满文老档》原本仍存宫中的内阁大库。1924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决定驱逐溥仪出宫，第二年便成立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其图书馆内设立文献部，负责宫中各处档案的收集和整理。1927 年，文献部改称掌故部。1929 年，根据“故宫博物院组织法”，掌故部改为文献馆并脱离图书馆而独立。文献馆自 1931 年 1 月开始清理清代内阁大库的档案，陆续发现《满文老档》原本 37 册，到 1935 年又发现 3 册（这 3 册未经托裱，可能是乾隆六年就未曾查到因而未托裱），共计 40 册。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关内形势紧张。北京故宫博物院决定把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满文老档》原本和抄本，于 1932 年 2 至 5 月间转移到上海。这就是当时的所谓“南迁”。1935 年 5 月间曾将《满文老档》原本和抄本运回北平（当时北京称北平），打算进行整理，但 1936 年 2 月又将《满文老档》原本运回上海。此后，由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大片中国领土被侵占，包括《满文老档》原本在内的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便开始了漫长的漂泊转移，直至抗

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又全部运回南京。但蒋介石国民党拒绝签订和平协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解放战争。约在1948年12月至1949年2月间，《满文老档》原本随同一部分珍贵文物被运去台湾。1969年，台湾故宫博物院以《旧满洲档》为题名，将《满文老档》原本影印出版发行。

《满文老档》原本，虽然在乾隆四十年和四十三年分别用老满文和新满文重抄，抄本和原本基本相同，并无重大差异，但原本仍有其特殊的价值。

首先，只有原本才能展示出《满文老档》的原始面貌，使我们得以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了这个原本，恐怕《满文老档》的原始面貌就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而永远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了。

其次，原本的特点本身也说明一些历史事实，值得加以探析。例如，《满文老档》原本的用纸，既有明朝辽东地方军政机关的废旧公文，亦有朝鲜的高丽纸，这说明当时后金政权十分缺乏纸张。《满文老档》中就有关于从朝鲜输入纸张的记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下辽阳，就从明朝辽东军政机关中得到大量废旧公文。这些废旧公文成为后金政权的重要物资储备，除作为编修《满文老档》原本的用纸外，还有一部分经剪裁后填充到“信牌”的外套内。1949年春，新中国的文物工作者从沈阳故宫

内保存的“信牌”外套中发现并取出了这部分明代公文，经修裱整理成为珍贵的明代档案。这真是历史的奇迹！努尔哈赤有意地破坏了明代档案，却又无意地为我们保存下来一批明代档案，这大概是努尔哈赤始料不及的。

第三，《满文老档》原本上的修改之处不少，这就为我们进行探析提供了可能。原来是怎么写的，后来又是怎么改的，经过分析，一定会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此外，我们还可以用原本与乾隆四十年的抄本进行比勘，看看有什么不同，再分析为什么会有不同，这同样也是有益的。试想，如果没有这原本而只有抄本，虽然可以基本相信抄本并肯定其价值，但终究会因为无法同原本进行比勘而感到莫大的遗憾。

总之，《满文老档》原本能保存下来，无疑是一件幸事！对这原本的价值，我们应给以充分的肯定。当然，我们肯定原本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否定抄本的价值。应当在充分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一部《满文老档》原本，有清一代一直密藏在宫中，不为外人所知，清亡后被发现并公之于众，引起国内外清史和满族史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从本世纪30年代到如今，一直有人在研究它。我国故宫博物

院文献馆时期的前辈学者李德启、张玉全等先生都作了开拓性的工作。60年代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先生又进一步加以翻译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十六

《满文老档》的抄本

乾隆六年(1741年),皇帝下令大学士鄂尔泰和徐元梦依据《满文老档》原本编辑《无圈点字书》。所谓《无圈点字书》,就是把《满文老档》原本中的无圈点老满文字一个个地拣出来,然后再注上相应的新满文字,可以说是一部新老满文对照字典。乾隆皇帝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就是因为老满文字母写法不规范,又可以互相假借,即或当时满文水平很高的人阅读《满文老档》原本都感到十分困难。编辑这部《无圈点字书》,一方面可以帮助人阅读《满文老档》原本,另一方面能使人知道老满文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鄂尔泰和徐元梦在编辑《无圈点字书》的过程中,发现《满文老档》原本纸张因年久而损坏严重,遂向乾隆皇帝作了报告。经批准,将《满文老档》原本逐页托裱装订,大大地延长了它的寿命,以至于我们今

天还能见到它。但要不要重抄，鄂尔泰和徐元梦并未提及，乾隆皇帝也没有什么说法。

34年后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大学士舒赫德给皇帝上了一件奏折，内称："本年二月十二日奏明，将内阁大库恭藏无圈点老档三十七本交国史馆纂修等官加增圈点，照紧赶办，陆续进呈……查老档原页共计三千余篇，今分页缮录并另行音写一份，篇页浩繁，未免稽延时日，虽老档卷页前经托裱，究属年久糟旧，恐日后摸擦，所关甚巨，必须迅速赶办，敬谨尊藏，以昭慎重。"① 同年十一月初三日，舒赫德又奏称："臣等敬谨办理太祖高皇帝天命六年九月、十月册档，音写一本并照写原档一本，恭呈御览。"②从舒赫德这两件奏折看，乾隆四十年重抄《满文老档》原本，肯定是奉了皇帝谕旨或奏请皇帝批准的，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满文老档》的重视。又，此次重抄有"照写"和"音写"之别；"照写"即照原本抄写，"音写"即用新满文转写，前者形成老满文本，后者形成新满文本。这就是《满文老档》乾隆四十年抄本。

查阅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四十年《满文老档》抄本，又有草本和正本两种。草本用的是无

①② 关孝廉、张凤良：《关于〈满文老档〉》，《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格宣纸，草写，册衣、函套敷以黄纸，显然是为重抄正本作准备的本子。因为《满文老档》原本涂抹、勾画、增添、删改之处甚多，而且所记各条排列也较混乱，不便直接重抄，更何况还要用新满文转写，故先准备出草本是完全必要的。草本有新满文本和老满文本两部，各 26 函 180 册。正本用的是泾（jīng，音经）县榜纸，画朱丝栏，精写，册衣、函套敷以黄绫，是依据草本再抄而成。正本亦有新满文本和老满文本两部，各 26 函 180 册。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内阁满本堂《堂谕档》记载，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奉阿（桂）、于（敏中）中堂谕，现在遵旨再办老档一份恭送盛京”。由此可见，乾隆四十年开始重抄《满文老档》的正草本完成后，四十三年皇帝又下令再抄正本送盛京收藏。为什么要这样作呢？清入关统治中国后，便把盛京定为陪都，予以特殊的对待，在这里设立盛京内务府与北京总管内务府遥相呼应，又设有除吏部而外的户、礼、兵、刑、工五部承办相应事务。因此，在乾隆皇帝看来，有必要再抄正本送盛京恭贮，以表示对陪都的尊崇。此正本于乾隆四十五年初送到盛京，存入崇谟阁，同历朝实录、圣训放在一起，也是新满文本和老满文本两部各 26 函 180 册。

盛京的《满文老档》抄本，同北京的《满文老

档》抄本相比较，大同小异。大同，即函数、册数、格式、字体和内容诸方面完全一样。小异，首先是型制有所差别，北京抄本略大，盛京抄本略小，所以有人称北京抄本为“大黄绫”，盛京抄本为“小黄绫”。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者是当时疏忽，未量准型制尺寸，致令有了出入；或者是有意所为，用这样的方式区别京城和陪都在地位上的不同。小异的另一点是，北京抄本（指正本）有签注，盛京抄本则没有。所谓“签注”，是《满文老档》中某些词语的简要注释，用满文写在一条黄绫上，再将此黄绫条贴在被注释的词语所在那一页的天头处。此“签注”很有意义，对准确理解《满文老档》文义颇有帮助，所以有没有签注是不同的。至于盛京抄本上为何没有签注，未见到清朝的官方说明。

北京的《满文老档》抄本（包括草本和正本），清代保存在内阁大库，现在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盛京《满文老档》抄本，清代一直保存在盛京宫殿内崇谟阁，今藏辽宁省档案馆。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人内藤虎次郎以外务省特派员的身份，到我国东北进行所谓清代古迹“调查”。他曾进入崇谟阁并看到《满文老档》抄本，回国后在刊物上作了报道。1912 年，他再次来到沈阳，进入崇谟阁将《满文老档》抄本等拍照，回国后冲洗成照片并装订成册，供

研究人员使用。这是《满文老档》最早被披露于世。

总之，《满文老档》抄本，有草本和正本两种；草本有新满文本和老满文本各一部，每部26函180册；正本有京城本和盛京本，计新满文本两部、老满文本两部，每部26函180册。若从新老满文本角度看，则有新满文本三部，每部26函180册；老满文本三部，每部26函180册。

有人曾经把《满文老档》原本和抄本进行比勘，发现二者差别不大。当然，作为抄本，只能按照原本上改定后的文字抄录，自然反映不出原本上修改的情况，这是正常的。原本上有涂抹、勾画、增添、删改的痕迹，这正是其价值之所在，有人对此进行专门的分析和研究也是有必要的，但不可据此就否定抄本的价值。

十七

《满文老档》的翻译

自从本世纪初《满文老档》被披露于世以来，国内外的一批专家、学者便开始了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清前史和满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最早翻译《满文老档》的当属金梁（息侯）。金梁是满洲旗人、清末进士，曾任奉天旗务处总办兼管盛京内务府办事处事务，具有从事翻译《满文老档》工作十分有利的条件。

金梁本人并不懂满文。据他在《满洲老档秘录》[①]自序中说，是他在沈阳召集“满汉文学士十余人”进行翻译的。所依据的是沈阳故宫崇谟阁藏乾隆四十三

① 《满洲老档秘录》，上、下二册，除金氏自序外尚有徐世昌、林纾、赵尔巽所作的跋，版本未明。

年《满文老档》抄本。经推算，全部翻译工作大约是在1916年至1918年间进行的。其译稿直到1929年才得以付印出版，取名《满洲老档秘录》。据金梁在自序中说，付印出版的译稿仅占全部译稿的二十分之一左右。金梁的《满文老档》译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竟流落到沈阳书摊上，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张溥泉先生购得，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周刊》曾在1933年5月至1935年6月连载过金梁的《满文老档》译稿摘录，题名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

金梁组织人翻译《满文老档》，可以说是开创了《满文老档》翻译之先河，使人得以知道这部深藏宫中百余年秘籍的主要内容，实在是功不可没。但也正如一些专家、学者尖锐指出的，金梁组织“满汉文学士”翻译的《满文老档》译稿存在严重的缺点。当时曾参加汉译工作的赵景祺先生就说：“息侯译老档，固实有其事，但未身临其役，仅请少通满文者数辈信手翻译，遇有与开国方略、东华录诸书类似者，则依诸书少变其文辞以为译稿。盖译者本未彻底了解老档，不过敷衍涂附而已。”[①] 由此可知，金梁《满文老档》译

① 金毓黻：《满文老档考》，《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委会汇刊》，1947年，第1期。

稿的可信程度是该打折扣的了。究其原因，主要是金梁不懂满文，从事实际翻译的人只不过稍通满文，这如何能保证译稿的质量呢？此外，翻译人员缺乏认真负责的思想和作风，不求甚解，在翻译中遇到难点时就借助于汉文文献，“少变其文辞以为译稿”，抹煞了《满文老档》和其他汉文文献对某些史实记载的不同，这正是读者所不能原谅的。

70年代初，台湾的广录和李学智两位先生，把《满文老档》原本中的“荒字档”和“昃(zè，音则，去声)字档”汉译完毕，以《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为题，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之后，张葳先生又汉译了《满文老档》原本中的“天字档”、“岁字档”、“闰字档”、“阳字档”、“秋字档”，以《旧满洲档译注》太宗朝(一)为题刊行。台湾学者汉译《满文老档》，依据的是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满文老档》原本，而不是乾隆年间的《满文老档》抄本，这正是其突出的特点和珍贵之处。可惜的是广录、李学智和张葳先生们都没全部译完并出版全译本。又据吴扎拉·奇车山先生撰文指出，广录和李学智先生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二册)》的汉译文中也有一些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原因是对满文词句的

理解不准确①。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单位的满文专业工作者组成译注小组，对《满文老档》进行汉译。所依据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乾隆四十年重抄新老满文正本，同时参考了台湾刊行的《满文老档》原本——《旧满洲档》。译注小组人员经过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努力做到：第一，译文要准确完整，通顺易懂；第二，译文应体现历史文件的时代语言特点和风格，以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第三，吸取前人的教训，纠正已往译文中出现的错误和不妥之处，保证译文的质量。经过十余人和十余年的努力，199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上下两册的汉译本，取名为《满文老档》。这是我国正式出版的惟一一部完整的《满文老档》汉译本。但令人遗憾的是，译本中没有《满文老档》原文影印或罗马字转写，给读者核对译文造成不便。

本世纪初，内藤虎次郎把盛京崇谟阁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满文老档》抄本拍成照片带回日本后，就有人试图进行翻译。语言学家藤冈胜二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初步完成了《满文老档》的日译，1939年由

① 吴扎拉·奇车山：《〈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二册)〉汉译文的勘正》，《满族研究》，1985年，创刊号。

岩波书店出版了他的手稿影印本。由于是手稿，涂改之处很多，阅读时颇为困难。此外，还有些人也着手进行翻译，但均未能全部译完并出版译本。到六十年代，由神田信夫教授等组成的“满文老档研究会”，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于1963年出齐了全七册的《满文老档》日译本。之后，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三人又日译并出版了《旧满洲档·天聪九年》。这天聪九年档册，是193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内阁大库中新发现的三册旧档中的一册，补充了《满文老档》的短缺。天聪九年(1635年)，是皇太极改元崇德、建立大清国的前一年，档册所记史料价值很高。上述神田信夫等人的全七册《满文老档》日译本和天聪九年档日译本，均有满文的罗马字转写、满日文对译和日文意译，并附有索引。在外国，将《满文老档》全部译完并出版的只此一份。

一部《满文老档》，原本秘藏在清宫中，一经披露于世，便立即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瞩目，有几代人进行翻译并出版了汉、日文译本，这本身就说明它在清前史和满族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满文老档》各种译本的出版，反过来又为清前史和满族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大大地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展开。

十八

《满文老档》的研究

《满文老档》作为用满文记录清王朝崛起于我国东北辽东地区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形成的时间最早，基本上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比后来形成的“清实录”等文献更原始，因而价值也就更珍贵。这也正是国内外专家、学者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地研究它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果从天命元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算起，到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死为止，时间不过短短的30来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竟仅以数万之众，从狭小的苏子河谷冲杀出来，迅速占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为挥师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迹。抛开当时明王朝方面的形势不谈，仅就后金和大清而言，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制定和执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民族、宗教一系列政策和策略，以及他们为创业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均值得深入探讨研究。要作此种探讨研究，《满文老档》则是首先必须查阅的第一手资料。如果说过去对《满文老档》这个史料宝库的发掘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那么应当承认在深度和广度上还是有限的。相信今后随着《满文老档》信息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必将推动清王朝开国史的研究，从而提供历史上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

《满文老档》的原本是用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以及二者之间过渡型满文写成的。其抄本也有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两种文本。这为研究满文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资料。满文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创制出来，天聪六年（1632年）实行改革，顺治初年普遍推行，前后只有四十几年，这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是罕见的。满文的这种快速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由满族社会迅猛发展决定的，但也是和努尔哈赤、皇太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重视满文的使用和规范分不开的。研究满文的发展规律，不仅对解读《满文老档》是必要的，而且能使人们从文字的独特角度看到满族社会的发展，满族同汉族、蒙古族等其他民族的关系，从而为我们今天的民族及民族语言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自从本世纪初《满文老档》被披露于世以来，引

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瞩目，从不同角度对它展开研究，出现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满文老档》热。可以说《满文老档》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性的热门学科。《满文老档》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国人应当也可能在对它的研究方面取得更新、更高的成就。

回顾数十年来对《满文老档》的研究，大体包括版本和典藏、内容和史实、满文的发展、同“清实录”的比较、翻译与注释等方面。

在版本和典藏的研究方面，我国的李德启、张玉全、谢国桢、金毓黻等前辈作了开拓性的工作。李德启、张玉全二位先生，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工作人员，是他们从清代内阁大库中清理出《满文老档》并予以报道的。谢国桢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对《满文老档》十分关注，作过多次追踪报道。金毓黻先生写过专文，依据有关《满文老档》发掘情况的报道，进行综合分析和论证。在日本，内藤虎次郎（京都大学教授）乘日俄战争中日本胜利的余威，以外务省特派员的身份深入盛京宫殿内的崇谟阁进行所谓“调查”，发现《满文老档》并作了报道。辛亥革命后，他又到崇谟阁将《满文老档》拍成照片带回日本，作为研究资料提供利用。此外，今西春秋、鸳渊一等人也对《满文老档》作过探查和报道。神田信夫教授综合《满文老档》的典藏、发掘和研究以及翻译的全面情况，

写过专文加以述评。近年我国的历史档案工作者，依据清代档案中的记载，对《满文老档》的典藏和版本作了进一步的揭示。

关于《满文老档》的内容和史实的研究，我国的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郑天挺及莫东寅、李燕光、周远廉等先生，依据《满文老档》中的有关记载，对清入关前的满族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等问题发表过专论。周远廉先生尤其充分发掘《满文老档》，把它的记载同“清实录”等文献进行比较，指明“清实录”记载的许多不明、不确之处，澄清了历史真相，通过专著《清朝开国史研究》对满族社会发展的历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日本的鸳渊一依据《满文老档》的记载，早在30年代就论述了舒尔哈赤（努尔哈赤之弟）、褚英（努尔哈赤长子）之死。

在关于满文的发展问题上，我国的李德启、张玉全等老先生曾发表文章，将《满文老档》中的无圈点老满文字和加圈点的新满文字加以比较，指出其间的关系，作了开拓性的研究。近年我国的满语文研究，可谓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特点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用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理论作指导，论述了满文的创制、改革、推行及其历史作用。

在把《满文老档》同“清实录”等文献作对比研

究方面，我国的李德启先生最早作了尝试。他就“满洲”的称号、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年号问题，依据《满文老档》中的记载，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明确提出，应当把《满文老档》和“清实录”互相对校。日本人三田村泰助就把《满文老档》同《清太祖实录》作了对校。

在翻译和注释方面，目前国内外均有了完整的译注本，这是几十年来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国对《满文老档》的研究，从历史发展情况看，早期侧重于版本、典藏的探寻和报道以及新老满文的比较研究，内容和史实以及译注等研究处于发端时期。当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先生有志于这项工作，但是还有其他大量的清代档案整理工作要作，因而精力有限，许多想法只好放弃了。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和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迫使《满文老档》的研究停顿下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又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研究工作无法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50 和 60 年代，我国政府注意培养满文专业人才。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满文老档》的研究工作才出现了全新的局面。

十九

奇特的满文木牌

1934 年 11 月，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工作人员在清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了满文木牌 26 支。当时这 26 支木牌用高丽纸包着，上面有用满文写的说明：baturi jiyūn wang ni cang ping jeo de cooha genefi suk'ai gajiha bithe，译成汉文是“苏开前往武英郡王在昌平州军中带来之文书”。这是罕见的、奇特的以木片为载体的清代满文档案，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文献馆工作人员李德启先生，受文献馆馆长沈兼士先生之托，对这 26 支满文木牌作了考释和汉译，以《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为题，于 1935 年 5 月出版了专著，向外界进行报道，引起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据李德启先生介绍说，这 26 支木牌有成捆的 4 捆和散开的 5 支；4 捆中有 2 捆各 4 支，1 捆 5 支，1 捆

8支。其中，1捆4支是石廷柱旗的，1捆4支是噶布什贤超哈（即前锋兵）的，1捆5支是白奇超哈（即步兵）的，1捆8支是满洲、蒙古旗的，零散5支可能是武英郡王行营的。依据这些木牌的记事，可知是崇德元年（1636年）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越长城在北京周围作战中形成的，有的是各部送至阿济格军营中，有的是阿济格送至各部。

木牌的长短、宽窄各不相同，最长的33厘米，最短的16.7厘米；最宽的4.7厘米，最窄的1.8厘米。木牌用白木削制而成，不加涂饰，其下方有一小孔，可用绳或皮条穿孔而拴系之。

木牌上用刀刻有满文字句，或一行，或二行，或三、四行。主要内容是此次阿济格率军征明作战过程中军情、战况及战果的通报，记载十分简略，大概是用刀在短而窄的木片上刻字费时费力的缘故。

木牌上的满文，既有无圈点老满文，又有加圈点新满文，还有介于新老满文之间的过渡型满文，辨识起来比较困难。

查《清史稿》，有这样的记载：阿济格“崇德元年，进武英郡王。偕饶余贝勒阿巴泰及扬古利伐明，自雕鹗堡入长安岭，薄延庆。越保定至安州，克昌平、定兴、安肃、宝坻、东安、雄、顺义、容城、文安诸县，

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余万。”[①] 木牌所记，和《清史稿》这段记载基本相符，但要比《清史稿》详细、具体、生动。

这奇特的26支满文木牌能给我们一些什么启示呢？

有的人会问，阿济格率军进掠北京附近广大地区，为什么用木牌而不用纸写公文通报和记录军情战况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首先，这和满族的传统习俗有关。康熙前期曾经到过东北的杨宾，在他写的《柳边纪略》一书中说：“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用皮条挂壁若档故也。”[②] 根据杨宾说的这个情况，崇德元年阿济格军中使用木牌传递军情也就不奇怪了。现在沈阳故宫博物院还保存着清入关前使用的“信牌”，是官员外出必须持有的凭证，也是用木头削制而成的，分前后两片，后片中部刻有槽，上写满文字，两片合成一个整体。这恐怕也是“边外文字多书于木”的旁证。木牌有孔，当木牌多的时候，就用皮条穿起来挂在墙上，称之为档子，满

① 《清史稿》，卷217，列传4。

② 杨宾：《柳边纪略》，卷3，第9页，《辽海丛书》辽沈书社影印本，第254页。

文作 dangse。于是有人认为，今天人们常说的“档案”一词，实际上来源于满语“档子”。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满文木牌也就是原始的档案。其次，清人关前用木牌记事传递，恐怕和当时缺乏纸张不无关系。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缺乏纸张，这是确实的，有事实可以作证。例如《满文老档》中有记载，每年都由朝鲜输入大量纸张。更无可辩驳的是，《满文老档》原本中就使用了明代辽东军政机关的废旧公文。总之，一方面是民族的传统习俗，一方面当时纸张的缺乏，致使阿济格军中仍使用了木牌。

木牌上的满文，既有无圈点老满文字，又有加圈点新满文字，还有新老满文之间的过渡型满文字，这为研究满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努尔哈赤创制的无圈点老满文，经过 30 余年的使用，人们发现了它的不完善之处，终于在天聪六年（1632 年）完成了改革，推行加圈点的新满文。崇德元年（1636 年），新满文正在推行之中，人们需要有一个熟悉和掌握的过程。木牌上的满文正体现了老满文向新满文过渡的历史特点。木牌上仍不时出现老满文字母，也就是没有按照改革的要求增加圈或点；有的字母虽然按照要求增加了圈或点，但仍保留着老满文字母的一些笔画，致使字母既像新满文又似老满文，不伦不类；为准确拼写汉语借词而制定的 10 个特定字母，木牌上并未正确

使用，在拼写汉语人名、地名、职官名时随意书写，而且前后不一。这些情况是老满文向新满文过渡中不可避免的，就如同汉字简化过程中仍有人时常写些繁体字或不规范的简化字一样。满文木牌为研究满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清入关前曾经使用过的满文木牌，能够保存下来26支，使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真面目，这实在是一件幸事！这26支满文木牌，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宝贵的文物价值。

李德启先生将26支满文木牌按阿济格略明的时间顺序排列编号，逐一转写成罗马字并加汉字对译，然后意译成汉文，凡需要注释之处均加以注释，书前附有26支木牌的影印（分正面和背面），使读者可以参看木牌阅读译文，可谓精详周到。李德启先生是我国老一代档案工作者，为发掘清代档案文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和研究中又作了开拓性的工作，为而后我国满文档案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一书，是他诸多研究成果之一。

二十

补《满文老档》之缺的《天聪九年档》

天聪九年(1635年),是清太宗皇太极继承其父太祖努尔哈赤遗业,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勤于治理后金国的第九个年头,也是他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的前一年。《天聪九年档》是当时官方的原始记录,文字朴实无华,内容翔实具体,比较接近史实。顺治朝纂修的《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后经康熙、雍正、乾隆朝多次修订,天聪九年部分为统治者的意志所左右,不少重要史实或避而不载,难寻端倪;或删详就略,难窥全貌;或故意篡改,所记不确;或辞藻巧饰,溢美失真。因此,相比之下,比较质实的《天聪九年档》的史料价值就更高了。

《天聪九年档》本应是《满文老档》的一部分,但竟阴差阳错地脱离了《满文老档》。《天聪九年档》的

发现，自是《满文老档》的补充。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这里简要地加以介绍。

乾隆六年（1741年），从内阁大库中发现《满文老档》原本37册，当时作了两项工作：一是依据它编辑《无圈点字书》，也就是新老满文对照字典；二是将这37册破损严重的原本逐页托裱，以期永久保存。

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奉旨依照《满文老档》原本重抄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草本、正本各一份，存北京宫中；四十三年又奉旨重抄无圈点老满文和加圈点新满文正本一份，送盛京宫殿保存。

上述《满文老档》原本和抄本，均缺天聪七、八、九3年部分。其原因，可能是乾隆六年未能在内阁大库中发现的缘故。

清朝灭亡后，193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清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先后发现乾隆四十年重抄的《满文老档》草本和正本及乾隆六年托裱过的《满文老档》原本37册。1935年，在内阁大库残乱档案中竟奇迹般地发现满文档册3册，一册是天命九年（1624年）的，一册是天聪六年（1632年）的，一册是天聪九年（1635年）的，均未经托裱，其字体和记事同乾隆六年已托裱的37册十分相近，估计是乾隆六年未曾发现的。1969年台湾故宫博物院把《满文老档》原本37册和后发现的3册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名为《旧满

洲档》。《旧满洲档》补充了以往《满文老档》原本和抄本的不足。

以上是《满文老档》原本37册及后发现3册的简要情况。下面介绍一下《天聪九年档》的翻译情况。

日本的神田信夫等人，在1963年出版了全七册的日译本《满文老档》之后，又于1972年至1975年译完并出版了《天聪九年档》(依据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旧满洲档》)。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嘉录和辽宁省档案馆佟永功等人，依据日本东洋文库丛刊第十八《旧满洲档·天聪九年》(即神田信夫等人的日译本)的罗马字标音，还原成满文并进行汉译，198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汉译本。该译本附有《天聪九年档》同《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对比。

《天聪九年档》的发现、影印公布和汉译本的出版，为清朝开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是值得称道的。

《天聪九年档》和《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相比较，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呢？下面择其主要之点举例说明之。

第一，《天档》(以下《天聪九年档》简称《天档》)中有记载，而《文录》(以下《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简称《文录》)却未予收录，其原因是出于政治需要，以维护皇太极的权威。

例如，四月二十日，皇太极携诸福晋（即后妃）前往张古特地方围猎。围猎时皇太极坐骑陷入泥沼，皇太极两度落马。这是不吉利、不光彩的事，《天档》中有记载，而《文录》中只字不提。

再如，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最早投降后金的汉官，皇太极对这些人很重视，优礼有加。天聪九年正月、八月、十月分别设宴款待或施恩赏赐，《天档》中有详细记载，而《文录》中却未予收入，显然是与“三藩”叛乱有关。

第二，《天档》中有详细记载，《文录》中从略，以对统治阶级内部的丑闻加以隐讳。

例如，天聪九年七月二十日，郭勒图色臣携察哈尔汗之大福晋娘娘太后至（此系多尔衮等率军打败察哈尔蒙古之后），皇太极屡次派人到大贝勒代善处命其娶之。大贝勒代善称，此人虽是察哈汗的大福晋，颇有名气和地位，但无财帛牲畜，拒绝娶之，表示愿娶察哈汗的另一个福晋苏泰太后。皇太极指出，因济尔哈朗之福晋亡故，经诸贝勒议定，拟将苏泰太后许给济尔哈朗。既已言定，怎好更改。皇太极坚持代善娶娘娘太后，代善就是不从。这时，阿巴泰、德格类、阿济格等兄弟激烈起来，对皇太极说，大贝勒代善因为娘娘太后穷，不愿娶她，你为何还是好言相劝呢？我们如果早知道此事，一定出面干涉了。这样一大段详

细生动的记述，充分暴露出后金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文录》竟简单地记为，阿巴泰等劝皇太极娶娘娘太后，皇太极说已娶一福晋，再纳一福晋于理不合，坚决拒绝了。这样一来，既隐讳了代善的丑行，又赞扬了皇太极，真是极尽笔墨之能事！

又如，天聪九年十月，皇太极发兵往征黑龙江一带的瓦尔喀部，《天档》记为：皇太极对承政车尔格等下令说，出师诸臣，征途遥远，恐其行军中难耐，准其于所俘妇女中各取一人，但不得选貌美者淫之。车尔格等向出师诸臣传达说，你们如果不体会皇上的爱意，自己不选丑陋之妇，不把貌美者献给皇上，暗中把貌美者私留下来，当心你们回来后我们仔细访察。如果自取丑陋者，则罢了；如果献上丑陋者，自己留下貌美的，一定严惩。对这一大段记述，《文录》只记作：此次出师，诸将离家远征，许于俘获妇女内各量取一口，不得概行淫乱。显然这是美化了皇太极。

第三，《天档》的记述比较质实，而《文录》却转加溢美。

《天档》记载，天聪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以金银纸锞1万、纸钱10万并杀牛、羊祭奠太祖努尔哈赤。《文录》却改作：除夕，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到太祖陵致祭，令大贝勒代善跪于太祖神位前奠酒。如此，便抬高了皇太极的地位。

又，《天档》记载皇太极设宴款待来归的察哈尔蒙古部众时，借题发挥，说察哈尔倾覆，诸臣来归，早在他的意料之中。察哈尔大臣德森金旺不以为然，回答说：你这样说，我就无法应对了。《文录》却把德森金旺的话改为：圣谕及此，洵如神之鉴也。几个字的改动，溢美皇太极到了极点。

根据上面所述，可以肯定，《天聪九年档》要比《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更接近史实，因而史料价值就更高。

总之，早在清人关前形成的《天聪九年档》，有清一代被尘封在内阁大库中，直至清亡后才被发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它补充了《满文老档》的不足，而且比后来纂修的《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更质实、更有价值。

二十一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

清入关前的历史，一般清史著作即或有所叙述，也都比较简略，因此，人们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

其实，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父子，素怀雄心壮志，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奋发图强，英勇奋斗，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走出一条胜利的道路，为顺治皇帝入主中原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表，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

以往人们之所以对这段历史讲得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历史资料的缺乏。明朝官方和私家对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活动以及满族社会的实际状况，虽然有所记述，但均较零散和简略，而且由于固有的偏见和不够深入，记述的真实性令人怀疑。

自从本世纪初所谓“大内档案”被发现以来，情

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一大批清代文书档案，包括入关前的满文档案，陆续公布于世。作为清入关前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满文老档》的发现，引起国内外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追踪调查，著文介绍，翻译研究，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热”。但令人遗憾的是，《满文老档》的记载只到崇德元年便停止了，而且还缺天聪七、八、九年的记载（后来又发现了天聪九年的档册）。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清入关前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并于1986年出版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分上、中、下三册，其中的上册天聪朝和崇德朝尤其引人注意。

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继位，改号天聪。天聪三年（1629年），设立文馆（相当于皇帝的秘书班子）。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文馆及之后分设的内国史院，掌记注皇帝起居、编立史册、纂修实录诸事。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国史院满文档案”，顾名思义，就是由早期的文馆和之后的内国史院形成的。

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一书的“编辑说明”介绍，“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现存47册，其中天聪朝18册，崇德朝29册。这些档册均是用无格宣纸写成，各册长短不齐，厚薄各异，宽窄不尽相同。档

册上的文字是新老满文交替阶段的满文。从上述特点看，和《满文老档》原本差不多。由于年代久远，朝代更替，社会变迁，保管不善等多种原因，天聪六年（1632 年）和崇德六年（1641 年）的档册已散失无存，实在可惜。

“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记载，开始于天聪元年（1627 年），止于崇德八年（1643 年），即入关的前一年。著名的《满文老档》的记载，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止于崇德元年（1636 年），中间尚缺天聪七、八、九年部分（后来又发现了天聪九年部分）。二者一对照，显然“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可以补充《满文老档》缺载的天聪七年至八年和崇德二年至八年部分。应当说这是“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最值得重视、也最珍贵之处。

《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的“编辑说明”称，“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是将各种原始档案摘抄汇总，然后按年、月、日顺序记事成册的。如果这个看法成立，那么“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就是经过加工的第二手材料了，无疑要比原始档案降低了价值。

笔者把《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的天聪九年部分，同属于《满文老档》的《天聪九年档》作了一番对比，发现二者颇多不同。以一月份的记载为例，前者只有 18 条，而后者共有 45 条；再看四月份

的记载，前者只有16条，而后者共有86条。单就记载的条数而言，《天聪九年档》要比“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多得多，也就是说《天聪九年档》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再进一步比较，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以天聪九年四月份的记载为例，“内国史院满文档案”所记16条，除关于盛京城墙内侧墙面砌砖石工竣一条外，其余15条在《天聪九年档》中全有记载，而且文字基本相同。但是，《天聪九年档》的另外71条，在“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中却没有记载，而这71条中的一些内容还是很重要的。例如，这一年皇太极外出西巡，名义上是围猎，实际上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探查明朝在十三山、喀拉城等地的军事设防情况；另一个是会见蒙古各部王公，接受他们的贡品，同时宴请和赏赐他们，用以巩固和他们的结盟。似此重要内容，不知“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为何没有记载。根据上列两相比较的具体结果，实事求是地说，“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在价值上要比《天聪九年档》等逊色得多了。但是，《满文老档》只记载到崇德元年（1636年），二年至八年的历史无记载，从这一点上说，“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尽管记载简略，仍可补《满文老档》之不足。

又据《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一书的“编辑说明”称，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天聪朝和崇德朝部分，有修改痕迹，经与《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比勘，竟

完全相同。因此，译编时是按照档册修改前原有满文翻译的，目的在于恢复档册原记载的面目。这样考虑是正确的。不然，按照改定的文字翻译，就等于按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满文本翻译，用处就不大了，因为《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汉文本也是有的。

总之，《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天聪朝和崇德朝部分的出版，为研究清入关前的历史提供了新史料，特别是补充了《满文老档》的缺载，应当感谢译编者。但是，也正如译编者所说明的，它是将各种原始档案摘抄编辑而成的，已经筛选了一次，是第二手史料了。经过笔者与《天聪九年档》的比勘，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其史料价值相对地说要差一些，这也是应当指出的。

二十二

图文并茂的《满洲实录》

清代历朝“实录”中，惟有《满洲实录》集满、蒙、汉三种文字于一体，并附有插图82幅，可以说是图文并茂，独具特色。

《满洲实录》绘写本应有三部，其中两部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依据底本绘写的，另一部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依据底本绘写的。这三部《满洲实录》，在清代分别收藏在北京宫中的上书房、盛京宫殿内的崇谟阁、热河承德的避暑山庄。但如今只剩下北京宫中上书房的一部，现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他两部下落不明。

盛京宫殿内崇谟阁收藏的一部《满洲实录》绘写本，民国年间尚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辽宁省通志馆经省政府批准，曾将崇谟阁内全部清实录借出观览，深为这套精美巨制惊叹不已。由于经费有限，只

将其中的《满洲实录》摘取汉文部分和插图影印出版，计2函8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不久成立伪满洲国，扶植清逊帝溥仪当了傀儡皇帝。伪满洲国曾把全部清实录拿到日本影印，其中就包括《满洲实录》。但之后这部《满洲实录》便下落不明。

关于乾隆年间《满洲实录》绘写本所依据的底本等问题，多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陆续发表了许多意见，看法不尽相同。近年中央民族大学的达力扎布先生发表一篇论文，题目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①]，就《满洲实录》底本的形成过程发表了意见。笔者同意他的看法。

天聪六年（1632年）十一月，书房秀才杨方兴奏请皇太极纂修太祖努尔哈赤实录，而且不能只有满文本，还要有汉文本，以便让满汉后世之人皆知太祖创业的艰难。其实这并不是杨方兴的发明，中国封建社会历代都有纂修实录的传统。皇太极接受了杨方兴的这个建议，于天聪七年十月下令文馆诸大臣，将太祖努尔哈赤行政用兵之道逐一写出，载之于册。这样，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纂修工作便开始了。画工张俭、张应魁于天聪九年（1635年）完成的《太祖实录图》，实

① 载王钟翰先生主编的《满学朝鲜学论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出版。

际上就是为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准备的插图。崇德元年(1636年)，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完成，定名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太后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实录》。这部实录不仅有满文、汉文，而且又增加了蒙文，集三种文字于一体，同时将画工张俭、张应魁画的插图安排到其中。当文馆的大臣刚林等人把这部实录呈送给皇太极审阅时，皇太极十分高兴，厚赏了纂修各官和画工。这部实录就是乾隆四十四年绘写《满洲实录》时所依据的底本。遗憾的是，这个底本也许就在绘写完后销毁了。

崇德元年修成的《太祖太后实录》，在顺治朝重写，作了修改，并按照《太宗文皇帝实录》的体例，分写成满、蒙、汉三种文本，去掉了插图，改称为《太祖武皇帝实录》；到乾隆初年，大加修改，仍保留满、蒙、汉三种文本，没有插图，定名为《太祖高皇帝实录》。

乾隆后期依据《太祖太后实录》绘写的本子，因其集满、蒙、汉三种文字于一体，且有插图，不同于《太祖武皇帝实录》和《太祖高皇帝实录》，故定名为《满洲实录》。

《满洲实录》从神话传说三仙女浴于布勒瑚里泊，三妹佛库伦吞下神鹊所遗朱果，感而成孕并生布库里雍顺之事记起，直至太祖努尔哈赤逝世为止，文字质朴。乾隆朝重新绘写时改动不大，基本保持了底本的

原貌。

《满洲实录》独具特色，首先在于它有插图82幅。这些插图，从绘画角度看，明显具有中国画的传统和风格，写意性很强，或浓墨重笔，或轻描淡写，形象生动，充分展现了文字所叙述的场景，对读者了解文字内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早有修实录的传统，但像《满洲实录》这样有插图的，则绝无仅有。这说明满族早期不拘传统、勇于创新的民族精神风貌。

《满洲实录》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集满、蒙、汉三种文字于一体，每页分上中下三部分行文，上部是满文，中部是汉文，下部是蒙文。这是由满族共同体内有满、蒙、汉三种人和后金国内有满、蒙、汉三个民族的社会现实决定的。但具体建议是由书房秀才杨方兴提出的，他对皇太极说：皇上既然是满汉人的共同主子，所办的事怎么可以只让满人知道而不让汉人知道呢？因此他建议皇太极挑选有真才实学的人，把满文翻译成汉文，使满汉文并用，以便满汉人共知先帝创业之艰难。皇太极接受了杨方兴的建议，《满洲实录》不仅有满、汉文，还增加了蒙文。由此可见清朝开国君主察纳雅言、虚怀若谷的广阔胸襟。

《满洲实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即它的记载更接近史实。《满洲实录》底本已经无存，今仅存乾隆

朝的绘写本一部。因底本集满、蒙、汉三种文字于一体，且有插图，体例业经固定，故重新绘写时只能照录底本，不可能作大段修改。底本形成于崇德元年，距太祖时期较近，故所记贴近史实。让我们举例加以说明。

《满洲实录》关于太祖死后大妃生殉（xùn，音训）一事是这样记载的：太祖努尔哈赤皇后原来是叶赫国国主杨机努贝勒之女，她死后又立乌拉国满泰贝勒之女为皇后。这个皇后颇有姿色，但心中总是怀有嫉妒，常使努尔哈赤不高兴。她虽然会耍手腕，却总是被努尔哈赤识破。努尔哈赤担心留下她会给国家带来祸乱，所以预先对诸王说过，我死后一定叫她殉葬。努尔哈赤死时，诸王就把这个遗言对皇后说了。皇后开始时吱吱唔唔，拒不服从。诸王对她说，先帝有此成命，你纵然想不服从，也是不行的。就这样，皇后才穿上礼服，把所有珠宝首饰全都戴上，悲哀地对诸王说，我从12岁起就伺奉先帝，穿得好，吃得好，已经有26年了，实在不忍心离开，愿意随他到九泉之下。我的两个小儿子，一个是多尔衮，一个是多铎，相信你们会好好抚养的。诸王哭着对她说，两个小弟弟，我们如果不加恩抚养就是有背于父亲啊！哪有不加恩抚养的道理呢？这样，皇后在十二日辰时自尽，时年37岁，同皇帝盛殓在一起，巳时离开皇宫，安置在沈阳

城内西北角。

乾隆初年修订的《太祖高皇帝实录》，对这段记载进行大删改，记述为：当孝慈皇后死了以后，就立乌拉国贝勒满泰之女为大妃。十二日辰时，大妃以身殉葬，时年37岁。于是将先帝和大妃一同盛殓，巳时用龙车拉出皇宫，安置在沈阳城内西北角。

把上面两个记载相比较，很显然，《满洲实录》的记载是更贴近史实的，而《太祖高皇帝实录》出于政治需要，掩盖了许多重要史实。由此可以认定，《满洲实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总之，《满洲实录》在清代历朝实录中，是独具特色的一部实录，有多方面的研究和利用价值。

二十三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参观北京故宫，可能会有细心的人注意到，在乾清门外西墙下有一排不起眼的房子，这便是清代威震朝野的军机处。乾清门内是乾清宫，清代皇帝多在此办理朝政。军机处近在咫尺，承命办事极为方便。

军机处的全称是“办理军机事务处”。雍正八年(1792年)，清政府忙于在西北边疆地区平定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军情机要来往频繁，若通过内阁办理，不仅因为内阁远在紫禁城太和门外，影响公文传递速度，而且公文传递过程中人多手杂，极易泄漏机密，于是雍正皇帝便决定设军机房于乾清门外，后来改称为军机处。

开始时，军机处是为处理西北军务而设的临时机构，惟因它办事迅捷、机密、有效，深得皇帝倚重，遂改为常设机构，一直到清朝灭亡。

军机处内有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级官员。军机大臣无定员，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选。军机章京，初由军机大臣传取，后改由军机大臣考取；嘉庆朝规定满汉章京分为两班，每班8名，以一人为领班。

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参与机要事务，奉命传宣皇帝旨意。军机章京受军机大臣指派，承办军机处具体事务。军机处实际上是发布政令的中枢，比具有国家机关首脑地位的内阁更有权威。

军机处承办的公文中，以大臣的奏折居多。奏折是重臣大吏向皇帝报告请示的主要文书。经过皇帝用红笔批阅过的奏折叫作朱批奏折。

清代定满语为“国语”、满文为“国书”，要求满、蒙族大臣必须用满文撰写公文，不能擅自使用汉文。因此，奏折中有相当数量的满文奏折，皇帝一般也用满文批示，于是形成满文朱批奏折。

军机处在办理朱批奏折时，按照规定照抄一份留存备查，称之为录副奏折。用满文写的，则称之为满文录副奏折。这是清代的文书制度。

军机处的录副奏折，包括满文录副奏折，是这样保存的：每日若干件为一束，半个月15束为一包，两包合于一处为一个月的，称之为“月折包”。包内折件的排列，不是按具奏时间，而是以朱批时间为序。

自雍正朝起，中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各朝，一直到宣统朝止，录副奏折共约80万件，其中满文录副奏折约18万件，多系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的。

满文录副奏折是军机处录副奏折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文录副奏折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它是给皇帝的请示报告，是关系军国大政的事情；其次因为它是满蒙大员的奏折，有清一代，边疆大吏、朝中重臣多为满蒙族人，都是皇帝的亲信，所奏之事自然非同寻常；第三是为了保密才用满文书写的，奏折内容具有机密性。

总观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内容全面，包括内政、军务、财政、司法、农业、畜牧、矿产、交通、工程、文教、天文、地理、民族、宗教、中外关系等方面。在清代，皇帝独揽国家大权，凡属重大事情必须“钦定”。所谓“重大事情”，实际上是无所不包的，有些确系重大事情，有些则是例行公事，上奏到皇帝面前后，军机处即奉命办理传宣谕旨事宜。

第二，时间跨度大，自雍正朝至道光朝，历经百余年，清代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特别是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在满文录副奏折中都有反映。

清代自嘉庆朝以后便由盛转衰了，满文逐渐被汉文所取代，满文录副奏折也就越来越少了。

第三，诸多方面中每一个方面的内容也是较为全面、系统、完整的。例如内政方面，其内容就包括历朝皇帝的登极、大婚、巡幸、行围、丧葬，后妃的挑选、册封、丧葬，京城和外省文武职主要官员的升迁调补、军政京察、奖赏抚邮、纠参处分、休致斥革、请假销假等。再如重大事件，包括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主要人物、有关衙署和官员的处置情形、皇帝关于事件处理的谕旨、事件的处理结果等。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的价值是十分珍贵的。首先，它为研究清代历史，特别是清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提供翔实的原始资料。比如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自康熙朝起，中经雍正朝，直到乾隆时才最后解决，前后 100 多年。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有详细、具体的记载。其次，它在今天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活动的斗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有关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制度，就是乾隆朝确定下来的，所用金瓶是清政府制发的，经金瓶掣签确定的转世灵童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此办法一直沿袭到今天。这是我们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

结的罪恶活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有力武器。第三，有关各地雨雪灾害、河流水患、地震破坏的记载，对今天我国防灾减灾、水利等项工程的建设，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清代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是极珍贵的历史档案史料，亟待深入开发，以便为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据了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在加快整理步伐，对文件进行著录，已经完成雍正七年至乾隆五十年的，全部工作可望在近年完成。之后，还将把全部文件著录条目输入计算机，以提高检索速度。同时还将编制各种专题目录出版发行。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消息。

二十四

盛京内务府满文档案

在“朕即国家”的封建社会里，皇帝的家务也是设立专门国家机关进行管理的。清代，为管理皇帝家务，在北京设有总管内务府，在盛京设有盛京内务府。

1644年清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后，视以盛京为中心的东北地区为其发祥之地，定盛京为陪都，予以特殊对待。最初派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司镇守之职。顺治三年（1646年），改盛京总管为盛京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年），又改盛京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此后，盛京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便是将军了，直到清末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三省改制。此外，又陆续设立户、礼、兵、刑、工五部，用以隆重陪都盛京。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曾在盛京居住20余年，修建起具有相当规模的宫殿，置办了包括粮庄、盐

庄、棉庄、靛庄、围场、牧厂等在内的大量皇室产业，有一大批官兵和人丁为其从事管理和经营。

顺治皇帝入关时，大部分皇室人丁“从龙”入关迁到了北京，盛京地区只留下少数穷困老弱人丁驻守。顺治三年（1646年），在盛京始设镶黄、正黄旗两个包衣佐领，八年增设正白旗一个包衣佐领，始成上三旗包衣佐领管理盛京地区皇室及宫廷事务的体制。

乾隆十七年（1752年），随着盛京地区皇室及宫廷事务的扩大，在上三旗包衣佐领体制的基础上，正式设立了盛京内务府，由盛京将军兼任总管大臣，其下陆续设立广储司、会计司、都虞司、掌仪司、营造司、庆丰司、内管领处、档案房等职能机构，分管各项事务。

盛京内务府在办理各项事务的过程中，必然同北京总管内务府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钦天监等京城衙署发生联系，同时也和盛京将军衙门、奉天府尹衙门、盛京五部以及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等衙署发生联系。这样一来，公文往还不断，形成大量文书档案。顺治、康熙、雍正朝的文书档案，几乎全部是满文的；乾隆、嘉庆、道光朝的文书档案，满汉文兼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朝的文书档案，则全部是汉文的了。

清代文书档案制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十分重

视录副存查，也就是将公文原件送有关机构抄录成册以备查阅。因此，盛京内务府文书档案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稿档”，即由公文原件形成的档案；另一种是所谓“册档”，即按年度将京来、京行、部来、部行、存查的文件分别抄录而成的档册。现有稿档4.5万余卷、册档1 100余册。

经过比较和研究，上述稿档和册档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第一，稿档从乾隆朝起，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朝，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止，其中咸、同、光三朝的稿档因八国联军入侵而损失很多；册档从康熙朝起，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朝，到咸丰朝止。二者在时间上可以互相补充，全部盛京内务府档案可以说是从康熙朝起直到民国十三年止。第二，册档虽系抄录稿档而成，但册档中的文件数要比稿档的文件数多，也就是说现存的稿档文件要少，二者约成2∶1的比例。第三，册档文件大多是清前期的，以康、雍、乾三朝的居多，而且大部分是满文的。总的看，册档的价值较高。

盛京内务府档案，包括册档和稿档，在清代是保存在盛京内务府档案房的，清末被集中到盛京宫殿内的西七间楼。民国年间仍存此处，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伪满洲国时期，这批档案被奉天图书馆接收。该馆曾对这批档案进行过整理，特别是对稿档用了较大

力量进行整理，编制成案卷级分类目录。

盛京内务府档案的内容十分丰富，在许多方面均有研究和利用价值。

有关盛京粮庄的史料就很有研究价值。盛京内务府档案中这方面的史料，量大、系统、翔实，从康熙朝一直沿续到民国年间。辽宁省档案馆已将这方面的史料译编出版，定名为《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全书共82万字，分上下两册。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教授曾精辟地指出："以往世之治清代经济史的研究工作者，每每注意到了满族在进入辽沈和入主中原后之大量吸收在全国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汉族封建经济的先进性，但忽略了满族经济本身从奴隶制、农奴制向地主所有制过渡的落后性。换言之，人们看到了满族经济溶化于清代全国封建经济整体中所起的加强封建经济的后劲作用和振兴作用，而看不见满族经济在全国汪洋大海般的汉族封建经济中由落后变先进的缓慢性和长期性。"① 盛京内务府档案中关于盛京粮庄的史料，有力地证实了"满族经济本身从奴隶制、农奴制向地主所有制过渡的落后性"，亦即"满族经济在全国汪洋大海般的汉族经济中由落后变先进的缓慢性和长期性"。清代乃至民国年间，盛京地区经济发展缓

① 王钟翰：《清代满洲土地制度研究》序，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

慢，和以盛京粮庄为代表的落后的农奴制经济的存在是有直接关系的，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和总结。

盛京宫殿是我国现存的两座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古代皇宫建筑群之一，具有满族早期建筑的鲜明特点。但是，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原因，盛京宫殿小修不断，乾隆朝又大规模地改建和扩建，到清末和民国时期盛京宫殿损毁亦相当严重，有些建筑早已无存。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沈阳故宫建筑的发展历史是应当研究清楚的。为了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教育，适当恢复沈阳故宫的某些建筑，也是完全必要的。要作到这一切，离开盛京内务府档案是绝对不行的。当然，也不是说仅凭盛京内务府档案就能解决一切问题。80年代初，沈阳故宫博物院决定恢复盛京宫殿的后苑，在辽宁省档案馆查阅了盛京内务府档案，找到了基本依据。

盛京宫殿不仅以它富有满族早期建筑的特点和完好的状况而闻名于世，更以其丰富的宫廷藏品而蜚声海内外。盛京内务府档案中有关于从北京往盛京宫殿运送文献典籍、圣容玉宝、字画墨刻、玉瓷器皿、珠宝古玩、御用物件等的详细记载，可谓笔笔有踪。特别是乾隆朝，在扩建完盛京宫殿后，大量往这里运送藏品，有一次运送瓷器竟达10万件之多。宫殿内的崇谟阁、敬典阁、文溯阁主要收藏文献典籍，诸如实录、

圣训、满文老档、玉牒、四库全书等。其他藏品分存于飞龙阁、翔凤阁、凤凰楼等处。令人痛心的是，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盛京宫殿内的藏品遭到了野蛮的破坏和劫掠，损失惨重。这种情况，在现存的民国时期档案中也有些零星记载。

总之，盛京内务府档案，特别是清朝前期的盛京内务府满文档案，对考察盛京地区皇室产业的发展和败落、盛京宫殿建筑的演变、盛京宫殿藏品的来龙去脉，进而研究清王朝的兴衰，都是难得的宝贵史料。

二十五

流散国外的《镶红旗档》

《镶红旗档》是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档案的简称。该档共有2 000余件，形成于雍正元年（1723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间，原来收藏在北京镶红旗都统衙门内，清末民初流失。据日本有关人士说，1936年日本学者在上海书肆上发现后出资购得并带回日本，现存东洋文库。

1972年，日本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将该档雍正朝部分（53件满文，1件汉文）用罗马字转写并译成日文出版。1983年，又将乾隆三年至二十九年（1738年至1764年）部分（121件满文）用罗马字转写并译成日文出版。上述《镶红旗档》日译本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清史学者的注意。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嘉录，将日译本中的罗马字还原成满文后进行汉译，经辽宁省档案馆佟

永功校对、中央民族学院王钟翰教授审订，于1987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名之为《雍乾两朝镶红旗档》。这个汉译本的出版，为研究清代八旗制度及雍正皇帝对八旗的整饬提供了宝贵的新史料。

八旗制度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创建的，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完善起来。在满族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按照八旗制度组建的八旗兵发挥了重大作用。八旗制度集军事、行政、生产三种职能于一体，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到衰落、瓦解的长期历史过程。在清史研究中，八旗制度及其发展演变和历史作用，是重要课题之一。

清王朝建立后，中国社会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终于出现了“康乾盛世”。雍正皇帝统治的13年，在“康乾盛世”这个历史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康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杰出的皇帝之一，他击退蒙古准噶尔部的进犯，平定“三藩”叛乱，收复台湾，中国今天的版图基本上是在他这个时期确定下来的。但他在晚年没有处理好诸皇子争夺储位问题，不仅搞得他自己心神不宁，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八旗组织内部弊端丛生。雍正帝在皇位之争中得手后，除了打击政敌、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外，还在财政、用人、旗务等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虽然雍正皇帝在位仅短短的13年，

但经过大力整饬，收效很明显，扭转了康熙朝后期社会停滞不前的局面，出现了乾隆朝社会的高度发展。

《雍乾两朝镶红旗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八旗组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活动和雍正皇帝对八旗的整饬，有助于我们对清代八旗制度和“康乾盛世”的再认识。

清代前期历朝皇帝对八旗官兵均十分重视，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支柱，用钱粮养活他们，给以种种优待和特权。康熙皇帝不惜动用上千万两库银厚赏八旗官兵，以示恩宠。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天下承平日久，八旗官兵养尊处优，无所事事，腐败之风渐渐滋长和漫延起来。雍正皇帝继位后不久即指出：“近来满洲等不善谋生，惟恃钱粮度日，不知节俭，妄事奢糜。”① 其实，问题比这还要严重得多。有些八旗官弁乃至重臣要员，贪污腐化，致使纲纪废弛，百弊丛生。雍正皇帝感到这是国家不详之兆，于是决心对八旗进行整饬。

首先，革退不能胜任旗务管理的王公。如康亲王崇安、顺承郡王锡保、信郡王德昭，下令不用他们管理旗下事务；公塞尔臣、伊尔登所掌八旗都统事务，悉予革除。同时，选派有能力的亲信王公掌管旗务，以

① 《清世宗实录》，卷 56。

利于整饬旗务工作的开展。如康熙皇帝第十七子允礼，雍正二年（1724年）受命为管理镶红旗满洲都统，仍兼管镶蓝旗汉军都统事务和镶蓝旗蒙古都统事务，六年被封为果亲王。允礼除掌管三旗事务之外，还奉命管理过理藩院、工部、户部、宗人府并承办西藏及苗疆事务，深受雍正皇帝的倚重。雍正皇帝称赞允礼“矢志忠诚，毫不顾及己私，执持正理，概不瞻徇，赞襄（xiāng，音香）朕躬，允称笃（dǔ，音堵）敬”①。在雍正朝《镶红旗档》中，允礼的奏折有19件之多，其中一部分奏折是参劾（hé，音合）官员的，如户部尚书孙渣齐亏空钱粮一案、参领拉西喜布等亏空抵交银两一案等，足见允礼是认真执行了雍正皇帝整饬旗务的决策的，因而受到重用。

其次，重视八旗下级官员的选放，严格官员选放和世职承袭制度。雍正朝《镶红旗档》中，涉及八旗官员选放的奏折有23件之多，从中可以看到，凡选放旗员必须由该旗都统等主要官员带领引见，经皇帝亲自验看以决定取舍。雍正皇帝讲求办事效率，要求自省城前来待引见之员一到都统衙门，该旗大臣即应奏闻，无需等待引见之员到齐时再奏。对被引见之员，雍正皇帝亲自验看，要求官员用满语讲述自己的履历以

① 《清世宗实录》，卷66。

了解其满语水平，同时注意其步射和骑射能力。他指出，近来武职大臣、侍卫、官员、兵丁，技力渐渐不如从前，不可不紧急加以整饬。档案中奏报引见官员折内都有官员步骑射能力的评语，以便皇帝考核。对世职的承袭，执行得尤为严格，除查阅原立官者所得敕书外，还必须呈报家谱系图，以防发生差错。雍正皇帝深知，世职是立有军功之人得到的，准其后人承袭的目的在于鼓励旗人勇敢作战，为国效力，故必须认真对待。

第三，严禁赌博，清除贪污侵渔积弊。雍正朝《镶红旗档》中参劾官员的奏折有14件，涉及亏空国帑（tǎng，音淌）、侵渔钱粮、挪移贪占、隐匿公产、盗卖官马、设局聚赌等积弊。曾任奉天将军的苏努，对任内之事漫不经心，内怀狡诈，饰貌沽名，将朝廷法纪、满族制度尽行废弃，侵蚀国帑，种种罪行，不可枚举，档案中有详细记载。雍正皇帝对这类人深恶痛绝，一律从严惩处。

第四，宽严相济，恩威并施，以固八旗之根本。在严厉惩罚犯罪的同时，雍正皇帝也大施恩赏。从档案记载看，主要有以下几项措施：1. 豁免官兵所欠公库银两。雍正元年豁免镶红旗所欠公库银两，都统四格为此曾具折谢恩。2. 赏赐官房。官房一般是籍没所得，赏给各旗出租收银以充公费之用。后来又下令将部分

官房赏给出征西北的官兵。3. 设立米局。八旗共设米局24所，由户部给银，用以平抑米价，保证八旗兵丁生活。4. 设生息银两。各旗用官拨生息银两作本金，招商生息，再用所得利息解决八旗官兵燃眉之急。这些具体措施，有些是雍正皇帝的创造发明，在安定八旗兵丁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总之，《镶红旗档》为研究清代八旗制度的发展变化，特别是雍正皇帝整饬旗务，提供了翔实的史料。过去人们普遍认为雍正皇帝严酷，杀戮成性，靠铁血手段维持其统治，贬责过多。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对吏治、财政、旗务等进行整饬，扭转了康熙朝后期社会发展的颓势，为乾隆朝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对他的严酷，应予客观的分析和评价，当社会中的腐败之风成了锢（gù，音故）疾的时候，非严酷不足以除之，则严酷就是必要的。

二十六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

清代的三姓，即现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所在地。“三姓”是满语的意译，音译则是“依兰哈拉”，“依兰”是三，“哈拉”是姓，“依兰哈拉”就是三姓。相传此地最早居住着三个姓的赫哲人，这三个姓是葛依克勒姓、卢业勒姓、胡什哈哩姓，故称之为“三姓”。今称“依兰”，是只取了“依兰哈拉”的“依兰”为该地地名。

三姓地处松花江和牡丹江的会合处，是水陆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对此地特别重视，顺治入关后即派兵在此驻守，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始设协领衙门，雍正十年 (1732 年) 升格为副都统衙门，受吉林将军衙门节制。吉林将军衙门下辖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三姓、吉林乌拉、珲春副都统衙门，各自分管一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三姓副都

统衙门辖区最大，包括松花江下游以东、乌苏里江两岸、黑龙江中下游两岸以及库页岛的广大地区。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起乾隆朝，迄光绪朝，是该衙门同吉林将军衙门及其他几个副都统衙门来往公文的抄存档册，共计有2万余件，半数以上是用满文书写的，现存辽宁省档案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沙俄军队进犯我国东北，把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副都统衙门的文书档案掠走，惟三姓副都统衙门的这部分档册未遭此厄运。1937年，伪满洲国国务院下令各地，将所保存的“旧记”（即历史档案）送到奉天的“旧记整理处”（在奉天图书馆院内）集中整理和保管，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遂由依兰县送至奉天旧记整理处。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当局忙于打内战，只是看管这些历史档案。1948年末，沈阳解放，解放区哈尔滨的东北图书馆迁到沈阳，接管了沈阳图书馆及其馆藏，其中就包括伪满时期集中起来的历史档案。1960年，东北档案馆成立，从辽宁省图书馆（1954年东北图书馆更名为辽宁省图书馆）接管这部分历史档案。1969年，东北档案馆撤销，其档案除分别移交给黑龙江、吉林两省档案馆各一部分外，其余部分移存辽宁省档案馆至今。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是该衙门历史活动的真实记录，反映清代乾隆朝至光绪朝170年间三姓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方面的状况，内容十分丰富，史料价值极高。

1984年，由辽沈书社（辽宁古籍出版社前身）出版了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民族事务专题史料30余万字，受到国内外清史学界的瞩目。日本清史专家神田信夫先生在《东洋学报》上发表评介文章，称："过去还没有如此具体记述从乾隆八年直至清朝灭亡前大约一个半世纪这一期间，居住在黑龙江下游直至库页岛一带的赫哲、费雅喀人部落及其进贡貂皮的实际情况的著作。该书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乃是极其重要的史料。"① 1996年，辽宁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中有关三姓地区设治沿革、官庄、流民垦荒、台站卡伦、沙俄侵略五个专题史料。我国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说，这次出版的五个专题史料，完全可以补充前已出版的民族事务专题史料的不足，必将有功于清史、民族史和中国边疆史地学参考利用。

由于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史料的编辑、翻译、出版，已被国内外的研究人员利用并发表了一批论文。这

① 神田信夫：《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评介，《东洋学报》，第67卷，第3、4号。

些论文就清政府对东北边疆的管辖和开发等问题，作了新的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把研究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贡貂赏乌林制度的确立和实施。所谓“贡貂”，是指少数民族按户定时定额向清政府进贡貂皮。所谓“赏乌林”，是指清政府向贡貂的少数民族按户赏赐财帛。“乌林”是满语音译，意译是财帛。赏赐的乌林包括缎布、袍褂、器物、针线等。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使鹿、使犬部少数民族，就有贡貂活动并得到相应赏赐。但作为制度确定下来并坚持实施，还是在乾隆朝。如关于贡貂少数民族的户数，从康熙、雍正朝以来是陆续增加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大学士傅恒奏准，确定赫哲费雅喀人贡貂户数为2 250户、库页费雅喀人贡貂户数为148户，以后不再增加。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目的在于使少数民族人知道，贡貂并得到赏赐并不是随意可行的，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贡貂赏乌林的政治意义。关于贡貂赏乌林的地点，居住较近者须亲自到宁古塔和三姓来，居住较远者由清政府派官兵前往约定的地方，诸如奇勒尔、普禄、德楞、喀达喀、乌扎拉、莫尔气、敦敦河口、呢喊、奇集等处。上述清政府同少数民族约定的贡貂赏乌林地

点，今都在俄罗斯境内，其中的奇集已近黑龙江江口。关于贡貂赏乌林时间，原规定一年一次；但有特殊情况当年未能贡貂时，准许下年补贡并照旧补赏；恰喀喇人居住在乌苏里江以东地方，路途遥远，山川阻隔，改为两年一次。根据上面有关贡貂赏乌林制度及其实施的简要介绍，可以肯定清政府对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实行了有效的管辖，体现清政府对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乃至库页岛的广大地区享有领土主权。只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才把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攫取到手。

清政府为巩固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同自己的关系，还实行联姻制度。清政府从八旗下级官员家中选出“萨尔罕锥”（即女儿），将其许配给愿意聘娶的赫哲费雅喀人或库页费雅喀人，称为“霍集珲”，即女婿。霍集珲必须预备好聘礼，乘船沿黑龙江、松花江溯游而上，先到达三姓副都统衙门，然后由官兵护送到京完婚。为了避免染上天花而发生不幸，需要计算行程日期，一定要赶在秋冬之际到达北京。完婚后，皇帝赏给许多生活用品，再由官兵护送回三姓副都统衙门，然后返回遥远的家乡。来往沿途住宿和食用，全由各地官员安排。这种联姻制度，为巩固民族团结，保持边疆安定，加强边疆与内地的交流，均有积极作用。三

姓副都统衙门承办此事，档案中有详细记载。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中还有关于官庄设立及生产状况、内地罪犯发遣至三姓作赏奴后的管理、禁止内地流民赴三姓等地垦荒、台站卡伦的设置、沙俄入侵和我国边民的抵抗等多方面史料，为一般文献所不载，均十分宝贵。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史料的发掘，是近年档案史料发掘中的一项重要收获。

二十七

锡伯族档案史料

锡伯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总人口 8 万多人，主要分布在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锡伯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居住在东北等地的锡伯族，如今已改用汉语汉文，民族风俗习惯也不明显了。但居住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锡伯族，至今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并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

建国前，对锡伯族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几乎是一个空白领域。建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锡伯族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有一批专著和论文发表。

但是，最令人高兴的是有关锡伯族的档案史料的出版。首先是 1987 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手抄清代

满文锡伯族档案史料的影印本，名为《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全书共40余万字，分上下两册。这部史料出版后，受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锡伯族群众的欢迎，因为这有助于他们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此后，上述史料编辑者又开始了有关锡伯族的满文档案史料的汉译工作，在辽宁省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1989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名为《锡伯族档案史料》，全书共60万字，分上下两册。先前出版的《选编》，是后者部分满文档案文件的选辑，故字数略少。《锡伯族档案史料》（汉译本）的出版，在国内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大大推动了锡伯族历史的研究。

《锡伯族档案史料》收录的档案文件，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部分省（区）档案馆保存的多个全宗的历史档案，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阁、军机处、宫中、国史院、总管内务府、黑龙江将军衙门及辽宁省档案馆的盛京内务府等全宗的档案，使有关锡伯族的档案史料收集得比较齐全。在我国已经出版的专题历史档案汇编中，像这样跨馆跨全宗的专题历史档案汇编还是不多见的。

从《锡伯族档案史料》收录的档案文件形成的时间看，最早的是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最晚的是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的，时间跨度长达300

余年。这些档案文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锡伯族归附努尔哈赤，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康熙年间从科尔沁蒙古抽出并编入满洲八旗，移驻伯都讷、齐齐哈尔、吉林乌拉等地，南迁盛京地区，西迁新疆，移驻京城，出征云南等历史活动，为研究锡伯族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第一手史料。

《锡伯族档案史料》收录的档案文件，共计742件（包括附件），其中满文文件647件，汉文文件95件，满文文件占绝大多数。从这一点出发，《锡伯族档案史料》也可以说是满文档案译编。将清代满文档案文件译成汉文，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首先是要准确把握满文词语本义，所译汉文正确无误、通顺易懂。其次是汉译文必须保持清代公文的历史特点和语言文字风格，绝对不能译成现代白话文。该史料译编者吴元丰、赵志强二人，均系新疆锡伯族，熟悉满语文，1975年至1978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接受三年的专业培训，之后留在该馆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和翻译，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其汉译文是可以信赖的。

《锡伯族档案史料》收录的档案文件，多系首次公布，所记述的内容在其他文献中极少能见到，因而在有关锡伯族历史的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利用价值。锡伯族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由于该史料的发掘和公布，均可以得到澄清。

关于锡伯族被清政府从科尔沁蒙古部抽出，编入满洲八旗并派驻齐齐哈尔、伯都纳、吉林乌拉这件事情，由于《锡伯族档案史料》的公布，就完全得到了澄清。后金天命和天聪年间，科尔沁等蒙古各部先后归附，其所属锡伯人也随之归附。清崇德和顺治时期，将科尔沁等蒙古部众编设十旗，同时也将其所属锡伯人编设佐领，分归各旗，使之成为科尔沁蒙古十旗的一部分。到了康熙三十年（1691 年），面对沙俄势力不断入侵的新形势，黑龙江将军萨布素请求在齐齐哈尔、嫩江口增派军队驻防。兵部在议奏萨布素的请求时提出，“锡伯等所居之地，接近松花江、嫩江，相应咨文科尔沁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不论其所属锡伯、卦尔察，如有情愿披甲派驻者，容详列其数报部后奏闻”。康熙皇帝批示说，“其王、贝勒、贝子、台吉等，若有将所属锡伯、卦尔察等情愿协拨披甲驻守者，则明白具文送来可也”①。此事经理藩院与科尔沁蒙古部协商，他们同意将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人丁 14 458 名全部献出，其中除年老之丁、年幼之童及家奴丁外，可披甲之丁共 11 812 名。后来又经过反复协调，将这些人丁披甲后分拨到伯都讷、齐齐哈尔、吉林乌拉驻守，归入满洲上三旗。锡伯族就是这样从

① 《锡伯族档案史料》，第 30 页，兵部咨萨布素文。

科尔沁蒙古部抽出，编入满洲八旗并分派到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驻防的。

锡伯族西迁，这是锡伯族历史上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部分锡伯族人西迁到新疆伊犁地区，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保卫祖国边防，在维护祖国统一、巩固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方面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但是过去有关锡伯族西迁的某些史实，或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甚或记载有误。由于《锡伯族档案史料》的出版，锡伯族西迁的时间、官兵和家属人口总数、行程和日期、到达伊犁地区时间及安置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得到准确的答案。例如，《清朝文献通考》说西迁的锡伯族官兵和家口共计4 295名，但据乾隆三十年（1765年）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所奏，西迁锡伯族“沿途陆续生男女幼童共三百五十余名”，另外还有起程时跟来的“男二百四十七名、女一百五十八名”[①]，共计405名。如果将新生的和随来的人口加上，那么实际西迁到新疆的锡伯族官兵和家属共有5 050名，远远超过了《清朝文献通考》所说的数目。再如，据《锡伯族档案史料》，锡伯族西迁是分两队先后出发的，第一队官兵和家属共计2 184名，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初十

① 《锡伯族档案史料》，第310页，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奏折。

日起程；第二队官兵和家属共计2 111名，于同年四月十九日起程。西迁队伍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八月末抵达边陲重镇乌里雅苏台并在此过冬，次年三月初起程南行，七月末到达伊犁地区，历时一年零三个月。锡伯族西迁是历史上的一次壮举，是锡伯族人民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的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锡伯族档案史料》的出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民族团结的极好教材，也是我们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的有力武器。

二十八

清代的满语语法著作

有清一代，满语和满文除被统治者尊称为“国语”、“国书”外，一般称之为“清语”、“清文”。

清代前期，满语、满文使用之处很多，是幼童入学后的必修课之一。清代后期，满语、满文虽然被汉语、汉文所取代，但仍有满族人在学习满语、满文。正是在上述的历史背景下，清代出现了一批满语语法著述，有的是清代前期完成的，有的是清代后期完成的；有的影响较大，经过多次刻版印刷。这些著述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给以正确的评价。

清代满语语法著述，主要有尚玉章著《清文虚字讲约》（雍正二年）、寿平等著《清文启蒙》（雍正八年）、厚田和万福著《清文虚字指南编》（光绪十年）等。

《清文虚字讲约》又名《凝华集》，作者是尚玉章，成书时间是雍正二年。

作者在解释写作此书的缘由时说，满文中的虚字，前人虽然有所议论，但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时难以说清。作者说他自己经过仔细研究，将满语文中的虚词用汉语文逐一加以解释，于是形成这部书。

笔者翻阅此书后知道，书中将满语文的虚字归纳成二十个“格”，即“两大语格”、“独运语格”、“并济语格”、“三大语格”、“暂读语格”、“直断语格”、“平叙语格”、“设言语格”、“表白语格”、“申论语格”、“助气语格”、“体字语格”、“疑拟语格”、“点省语格”、“令人语格”、“立意语格”、“收煞语格”（未然属）、“收煞语格”（将然属）、“收煞语格”（已然属）、“收煞语格”（不未属）。此书卷首还附有作者的“论法十则”，即“玩味字义”、“察识文情”、“区别段落”、“安排句调”、“静参虚语”、“恪守成言”、“毋（wú，音无）忘经常”、“须防蕴奥”、“深求至理”、“博采诸家”。

《清文虚字讲约》抓住满语文中难以理解和掌握的虚词加以讲释，这无疑是应当予以肯定的。作者的“论法十则”，实际上是作者关于如何学习和使用满语文虚词的经验之谈，颇有见地，足资借鉴。例如，对于一个虚词，必须弄清楚它的音义和语气，亦即作者所谓的“玩味字义”，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在对每个虚字加以讲解时，作者也的确遵循

了他的“论法”。对于格助词de，作者指出这个词“主静，自然语气”，作“于”字和“在”字讲；而对格助词be，作者指出这个词“主动，着力语气”，作“将”字和“把”字解。懂满文的人，对于这样的讲释是会点头称是的。

但是，笔者认为此书也有缺点和不足。首先，书中的所谓“虚字”，实际上包括了诸如格助词、连接词、后置词等纯粹的虚词和动词（时、态、式语法范畴）、副动词等实词。把虚词和实词混在一起统称之为“虚字”，在概念上是混乱的，讲释时自然也就很困难。其次，书中把所谓“虚字”归纳为二十个“格”，实际上就是把“虚字”划分成二十种类型。细细研究书中分出的“格”，可发现其分类标准不统一，分类时给人一种随心所欲的感觉。如所谓“两大语格”，只把满语文中的两个格助词de和be单独提出，仅仅因为这两个格助词经常被使用，而置另外一些格助词于不顾，显然是不合适的。其实应当把全部格助词放在一起，作为一类逐一讲释，这才合乎逻辑。第三，书中的“论法十则”和对“格”的阐述，语多虚玄，令人费解。不懂和初学满语文的人若看此书，肯定会越看越胡涂。可能也正因为这样，此书流传有限，所起作用不大。

《清文启蒙》，正如此书序言中所说，是为初学满语文的人所著，因而一方面凡初学者必须掌握的基本

语法知识都有了，另一方面行文浅显易懂。此书分为四卷：卷一，首先讲满文十二字头，此外还讲了“切韵清字”、“满洲外单字”、“清字切韵法”、“异施清字”、“清字运笔先后”等具体内容；卷二，“兼汉满套语”；卷三，专门介绍“清文助语虚词”；卷四，有“清字辨似”和“清字解似”。

《清文启蒙》是一部比较全面讲释满语语法的初级教课书，突出特点是内容全面而又讲述得通俗易懂。正因为这样，它刊行后受到普遍欢迎，刻本较多。西方一些满学家编写的满语语法著作也多受惠于此书。

满文十二字头，是满语文的基本知识，满文单语或双语辞书所收词条多按十二字头顺序排列，要查阅辞书必先学会十二字头。此书先介绍十二字头是完全正确的。所谓“切韵清字”，其实就是音节连读，书中作了归纳，一一列出。所谓“满洲外单字”，也是音节连读，主要用以拼写汉语借词。“清字切韵法”，讲的是音节连读的方法。“异施清字”，是讲解某些音节在词中的特殊读音。这些针对特殊性问题的讲释，对初学满语文者是很有帮助的。

“兼汉满套语”，是作者为了让初学满语的人具体了解满语的基本语法，而编写的满语短句和短文并附有汉语的对译。这些满语短句和短文通顺易懂，虚词和动词的时、态、式使用正确，附上汉语对译后便于

初学者掌握，颇有新意。

“清文助语虚字”部分，逐个地举例说明虚词、动词、副动词的使用规则，详细而具体。

总之，《清文启蒙》是雍正年间完成的一部满语语法著作，比较全面地讲释了基本语法知识，是较好的语法专著。

《清文虚字指南编》，光绪十年（1884 年）刊行。作者厚田、万福在自序中说：学习满文，最难的就是虚字。满文上下句的起承转合，没有虚字就无法表达句意和神韵，因而编成虚字歌，名之为指南。光绪二十年（1894 年），凤山加以充实，重新刊刻，改名为《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该书有上下两卷，将“虚字”分成若干组，每组“虚字”的用法以类似七言诗的顺口溜加以说明，以便初学者记忆。例如，此书开头就有：“i、ni、ci、sai 与 de、be，用处最广讲论多；里头、上头并时候，给与、在于皆是 de；把、将、以、使、令、教字，共是七样尽翻 be；下边必有 bu 字应，不然口气亦可托。”这段顺口溜就是讲格助词 de 和 be 的用法，de 是位格、方向格的助词，相当汉语的“里头、上头并时候”和“给与、在于”；be 是宾格的助词，相当于汉语的“把、将、以、使、令、教字”。顺口溜之后是满汉对照的实例，具体说明虚字用法。把虚字的用法编成顺口溜，有助于初学者记忆，不失为一种创新。书

中所举实例较精，看得出作者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但《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完成在清末，满语满文已被大多数满族人放弃，所以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有清一代，有一批满语语法专著问世，这是满族中一些满语文专家、学者为推行满语文而开展研究的成果，在提高满语文的使用水平并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语言文字方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在这些满语语法专著中，无一不把满语文同汉语文相提并论，甚至声明就是为了保证汉语文对译的准确，这表明满汉两种文化的交流已经互相渗透、互相交融到了无法分开的程度。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应当肯定的进步现象。

这些满语语法专著问世后，在推动国际满学研究的发展上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满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满语文的研究。《清文启蒙》等是外国满学学者学习满语文的入门向导。一些外国语言学家，依据现代语言学的科学理论，在清代满语语法专著的基础上，也发表了一些满语语法专著。

今天，满语文虽然已经不再通行，满族人已改用汉语文，但有清一代留下大量满文文献需要整理和翻译。为此，还有必要培养一批满语文专业人才。对这些人来说，清代的满语语法著作是必读的参考书。

应当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清代满语语法著作

没有现代语言学科学理论的指导，因而存在严重的缺点。比如实词和虚词，动词的时、态、式的语法范畴，名词的性、数、格的语法范畴等基本理论和概念，清代满语语法著作中都是不清楚的，因而把许多不同的问题放在一起讲，无法从根本上讲明白。

令人欣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培养起来的一批满语文专业工作者，在长期整理翻译清代满文文献的基础上，在现代语言学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出版了《满语语法》，这是我国满语文研究的重大收获。

二十九

从《御制清文鉴》到《御制五体清文鉴》

这里介绍的是清代经皇帝审定的六部满语和以满语为主的双语及多语分类辞书，它们是：《御制清文鉴》、《御制满蒙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之所以把这六部辞书放在一起介绍，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它们都是分类辞书，具有共同性；另一个方面它们之间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下面逐一加以介绍并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御制清文鉴》

康熙十二年（1673年），根据皇帝谕旨，由翰林院掌院学士傅达礼主持编修。傅达礼死后，又由大臣马齐和马尔汉等继续主持编修，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完成，历时35年。编修时间之所以如此长，是因为第一次编修，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而且康熙皇帝曾指示说不必太急，应详慎为之。

此书收入满语词条1.2万个，释义用的是满文。总的看，释义是简明、准确的，多义词的词义都有多项释义，还引用了一些典籍中的古文成语。

词的编排是按部——类——则三个层次进行的。有天、时令、地、君、谕旨、设官、政、礼、乐、文学、武功、人、僧道、奇异、医巫、技艺、居处、产业、火、布帛、衣饰、器皿、营造、船、车、食物、杂粮、杂果、草、树木、花、鸟雀、兽、牲畜、鳞甲、虫36部，部下分类，类下设则，则下便是一个个的词条。有的部包括的词条太多，便又将部分作一、二、三……。例如，人部就分为一至八。上述分类法，今天看来并不是很科学的，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书前有总纲，将部、类顺序排列，便于检索。

这是清代编修的第一部分类辞书，为以后几部分类辞书的编修奠定了基础。

（二）《御制满蒙文鉴》

此书是大臣拉锡受命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开始编修的，于五十六年（1717年）完成。

此书的编修是在《御制清文鉴》基础上进行的，在体例方面没有大的改动。收入词条数目未变。在原有

满语词条下添加了相应的蒙语词条。词条释义用满、蒙两种文字。删去了释文中引用的古文成语。

这部辞书是满蒙双语分类辞书。

(三)《御制增订清文鉴》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学士傅恒受命主持完成了此书的编写。顾名思义,《御制增订清文鉴》就是在康熙年间编修的《御制清文鉴》基础上增订而成。

此书增加的内容是:第一,在原来的正编之外增加了补编。此书所收词条,分列在正编和补编里。第二,增加新的词条和古代少见的词条6000余个,使全部收词达1.8万余个。这样,此书的收词就比《御制清文鉴》丰富多了。第三,在所收满语词条下增加了相应的汉语词条。由此,《御制增订清文鉴》成了满汉双语分类辞书。第四,对书中所收满语词条标以汉字切音,同时将其相应的汉语词条标以满文对音。这为只懂满文而不懂汉文或只懂汉文而不懂满文的人查阅此书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此书删去了释文中引用的古文成语,使之变得通俗易懂。

但此书词条的释文仍用满文,这显然保持了《御制清文鉴》的原貌。

此书词条的分类体系依旧。

(四)《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

此书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由大学士阿桂主持编修完成的，很可能是在《御制清文鉴》和《御制满蒙文鉴》基础上进行的。

此书主要特点是：第一，只有正编而无补编。在这一点上，它同《御制清文鉴》和《御制满蒙文鉴》相同，而和《御制增订清文鉴》不同。第二，此书收词比《御制增订清文鉴》少3000条左右，说明二者关系不大。除所收满语及相应的汉语词条外，又增添了相应的蒙语词。这样，此书便成了有满、蒙、汉三种文字的多语分类辞书。第四，此书删去了词条的满文释文。这是此书的最大变化。书中所收满、蒙、汉语的每个词条，轮回进行标音，也就是说每一个词条都有其他两种文字的标音。

总的看，这部辞书给人以简明之感。

（五）《御制四体清文鉴》

此书完成时间是在乾隆朝，但具体时间不明。此书收词条1.8万个左右，也是按部——类——则的分类体系编排的，亦有正编和补编，故可以说它是依据《御制增订清文鉴》编修的。但此书删去了全部标音和词条的释文，只保留满语词条和与之相应的藏、蒙、汉语词条。此书看起来更为简明。

（六）《御制五体清文鉴》

此书也是乾隆朝完成的，但具体时间不明，主持

编修的人也不清楚。

此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亦有正编和补编。第二，收词在每页上的排列顺序是，最上是满语，往下依次是藏、蒙、维、汉语词。第三，正编收词的分类体系未变；共36个部，其数目与《御制清文鉴》同；部下的类、则也基本上与《御制清文鉴》相同。第四，恢复标音，藏语词条下有满文切音和对音，维吾尔语词条下有满文对音。第五，全书共收词条1.8万余个，与《御制增订清文鉴》同。第六，无词条释文。

此书原本6函36册，设有总目，无前言和跋语，故成书情况不明。据说，此书只有抄本三部，两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一部在大英博物馆。按盛京内务府档案记载，盛京宫殿原存一部，今下落不明。

1957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将此书缩小影印出版，每部分装三册，共印行4.9万部。

综观《御制清文鉴》、《御制满蒙文鉴》、《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这六部分类辞书，有如下几点应予以指出：

第一，编修这些辞书的目的是由单一方面向多方面转化的，服务对象也由一部分人转变为多部分人，但主要还是为满族人服务的。《御制清文鉴》是单语辞书，全部用满文写成，显然是为满族人学习满语文而编修

的。康熙年间，清朝入关不久，满族人基本上用满语文进行交际，为此编写满语单语辞书是必要的。到乾隆时期，清代社会发展到顶峰，统一多民族国家业已确立，民族交往日深、编修以满语为主的双语乃至多语辞书成为新的必要。所以，集分类辞书之大成的《御制五体清文鉴》的完成是必然的。

第二，清代陆续编修成这么多部单语、双语和多语辞书，一方面说明清统治者对民族语文的重视，同时也说明清代民族语文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编修单语、双语或多语辞书，绝不是词的简单堆积、编排、释义，而必须对多种民族语文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康熙、乾隆皇帝精通满、汉、蒙语文，这是他们下令编纂并审订这些辞书的原因之一。同时，受命主持编修的大臣们，其语文修养都是比较高的。据说，为编修《御制五体清文鉴》，还聘请了西藏高僧。这就保证了这些辞书的质量，至少在当时是高水平的，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第三，这些辞书的编修，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清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诸方面发展的集中体现。清王朝是满族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在它的前期奠定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及其活动的地域。满族贵族实行的民族政策，有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一面，但也有共同联合、互相借鉴的一面。

这些辞书的编修，体现了中国在清代已经形成包括汉、满、蒙、维、藏等民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客观历史事实。从这一点出发，这些辞书除了具有文化、学术价值外，也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好教材。

三十

满族神话故事
《尼山萨满传》

尼山萨满的故事，很久以来一直在我国东北地区满族民间流传，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但主要情节则差不多。这里将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叙述如下：

古代明朝时，在一个罗洛村里住着一位名叫巴勒都巴颜的员外。这位员外家非常富有，奴仆和牲畜不计其数。员外中年曾得一子，15岁时在前往横朗山打猎的途中不幸病死。此后员外夫妇为无子而焦急，尽量行善作好事，终于得到上天同情，在员外50岁这一年又得一子，取名色尔古岱费扬古。色尔古岱费扬古聪明伶俐，好学上进，练就一身马步箭的功夫。

色尔古岱费扬古长到15岁时，提出要外出打猎。员外开始不大同意，说你哥哥就是15岁外出打猎时死的。但色尔古岱坚持要去，并说男子汉哪有永远守在

家里的道理。员外只好同意，但要他带上两个亲近的家奴，而且应当小心谨慎，尽快返回。色尔古岱费扬古让人作了准备后，辞别父母起程了。打猎的队伍很大，引得村里人都出来观看，大家交口称赞。

正当围猎颇有收获时，色尔古岱费扬古突然生了病，全身忽冷忽热，头昏眼花。众人赶紧收围，把色尔古岱费扬古放到临时用树枝做成的担架上往家抬。色尔古岱费扬古自觉不好，决定派一个奴仆先回家报信，并对众人说我的寿限已到，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了，请告诉他们不要过于悲伤，保重身体。说完这些话，色尔古岱费扬古就死了。

员外夫妇听到色尔古岱费扬古死的消息，有如五雷轰顶，一下子都昏了过去，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色尔古岱费扬古的尸体被抬到了家，员外夫妇和众人痛哭不止。哭过后，众人提醒员外准备后事。员外夫妇派人预备各色马匹驮上应用物品，杀了牛、羊、猪、鹅、鸭、鸡并求人帮助制作食品，准备了酒，在院子里摆上了桌子。一切都预备妥当后，员外先哭诉，接着员外夫人哭诉，直哭得死去活来。

突然门口出现一位驼背老翁，他唱道：各位父老兄弟们，请告诉屋里的主人，就说外面来了一个快死了的老头，想见一见主人，略表一下心意。看门人赶紧进屋告知员外，员外说快请进来，让他吃些点心、喝

点酒吧！老翁入室，既不吃也不喝，直奔阿哥的棺材哭诉起来，非常痛心。老翁对员外说：难道你就这样永远失去你的爱子吗？哪个地方有出众的萨满，应当请来救救阿哥！员外说：哪有好萨满呢？村里的萨满不但救不活人，连自己哪天死都不知道呢！请老翁指教。老翁说：离这不远的尼西海河边上住着一个叫塔旺的女萨满，很有本事，能把死人救活，为何不去请她呢？说完后便走出大门，乘彩云而去。

员外心想这一定是神仙下凡指教，便立即骑马带人去请。在村东头看见一年轻女人在晾衣服，就上前问尼山萨满家在何处。年轻女人笑着说：在最西头。员外又赶到村西头，见一人站着吸烟，便上前打听哪里是尼山萨满的家。那人说：你刚才在村东头见到的那个晾衣服的女人就是，你被她骗了。要请那个萨满，必须恭恭敬敬。员外谢过此人又回到村东头，下马入室，见南炕上坐着一位白发老太太，便下跪请求。老太太说：我不是萨满，站在门口的我儿媳才是。员外又对女人跪下说：您远近闻名，求您救救我儿子的命。萨满说：我刚学不久，别误了你的大事，你还是去求别的萨满吧！员外急了，接连叩头，再三请求，萨满这才答应下来。洗漱完毕，萨满开始作法，求神附体。员外始终跪在地上听着，发现萨满唱的全都符合实际。萨满又说：你家还有和你儿子同日生的狗和三年的公鸡

以及大酱吧？员外回答说是的。萨满又说：我要是救了你儿子，你也不要高兴；如果出了差错，你也别抱怨。员外满口答应，并愿用家产的一半作报答。

员外回到家里后，安排人和车马去接萨满。萨满抵达，迎接入室，安置好法器。萨满洗漱吃饭完毕，开始击鼓求神，但临时选的助手打鼓打得不齐，萨满很不满意。员外按照萨满的要求，派人接来她那个村的一个小阿哥。小阿哥准备妥当后，尼山萨满戴上头饰，拴上腰铃，手舞足蹈起来，一会高声呐喊，一会低声细语，向神祈求，最后疲倦地倒下了。小阿哥整理好萨满的穿戴，拴住鸡和狗，摆好酱和纸，陪萨满坐下，也求起神来。

尼山萨满牵着鸡、狗，背着纸、酱，众神跟随，去找阎罗王。来到一条河边，既无渡口又无船只，正着急时，见一人撑船而行，便喊他过来，说明要去阴间追魂，请他用船送过河去，答应给他酱、纸、财帛和白酒等。撑船人独眼、歪鼻、无耳、秃头、跛脚、鳖手，十分丑陋，对萨满说：久闻你的大名，早想认识你，若是旁人，我是绝不会送他过河的。过了河，萨满送给他三块酱和三束纸作为酬谢，又问他还送过什么人没有。撑船人说，只有阎罗王的亲戚蒙古尔岱带着巴勒都巴颜的儿子色尔古岱费扬古的魂过去了。萨满他们走了不久，又到了红河岸边，还是既无渡口又

无船只，人也见不着。萨满求过神后，把鼓扔到河里，站在鼓面上很快地过了河，留给河主三块酱和三束纸。随后来到头道关，刚要过去，有鬼吼道：什么人胆敢过关？我奉阎罗王之命把守此关，赶快说明缘由！萨满说：我是人间的尼山萨满，要去阴间找蒙古尔岱。说完，送给他礼物并留下姓名，便过了这道关。第二道关也像头道关一样地过了。

到了第三道关的蒙古尔岱家门口，萨满便又唱起来，责问他为何把未到寿限的色尔古岱费扬古的魂抓来，告诉他如果能送还必定奉送礼物，如果不送还就强行收回。刚唱完，蒙古尔岱出来笑着说：我把巴勒都巴颜的儿子色尔古岱费扬古的魂带来，于你何干？我是奉阎罗王之命带来的。他的箭法很好，又会摔跤，阎罗王把他收养了，不会送还给你的。萨满十分生气，决定去找阎罗王。到了城下，一看城门紧闭，萨满便又唱起来，请求诸神帮忙。唱完，诸神飞腾起来。这时，色尔古岱费扬古正和阎罗王的孩子们玩耍，突然一只大鸟下来抓住他后飞走了，别的孩子吓得跑进屋里告诉了阎罗王。阎罗王大怒，派小鬼把蒙古尔岱叫来，说：色尔古岱费扬古被一只大鸟抓走了，是你的主意吧？蒙古尔岱一想，肯定是尼山萨满干的，便劝阎罗王不要生气，说他到人间的尼山萨满那里去找找看。萨满正拉着色尔古岱沿原路返回，蒙古尔岱从后面追上来喊

道：好一个萨满！我费力得来的色尔古岱费扬古，你竟想白白地带走。阎罗王都生气了，你让我怎么说呢？你什么都不给，白白地带走，有点不公平吧？尼山萨满先给他三块酱和三束纸，后又增加一倍。蒙古尔岱提出把鸡和狗也都留下，萨满同意了，但要求给色尔古岱费扬古增加寿限到99岁，60年无病，膝下有九子，隔代有八子，直到老死。蒙古尔岱表示同意，萨满便把鸡、狗全都给了蒙古尔岱。

此后，萨满拉着色尔古岱费扬古继续往回走，忽然在路旁看到了自己的丈夫。她丈夫正在烧油锅，油已经烧开了。萨满的丈夫忿忿地说：你为何救别人不救自己的丈夫？你把我救活带回家不好吗？你救还是不救？若不救，这油锅就是你的去处！萨满告诉丈夫：你已经死了多年，骨肉都烂了，无法使你再度还阳。你要是同情我，就放我过去，我会给你多烧些纸钱、多供些饭食的，还要好好照顾你的老母。萨满的丈夫不依不饶，生气地说：我活着的时候，你嫌我穷，现在可随你的便了。对我的老母怎么样任由你。今天两仇一齐报，或者你自己进油锅，或者我把你推进油锅，你自己决定吧！萨满气得面红耳赤，唱起了咒语，不一会飞来一只大鹤，抓走她丈夫并扔到了鄂都城。萨满高兴了，拉着色尔古岱费扬古继续往回走，边走边唱边玩。

行走间，忽见一座漂亮的楼房出现在五彩祥云中。萨满走近一看，门前有两名守护神，经打听才知道这是子孙娘娘的住处。萨满送给门神酱和纸，连续过了三道门才进入楼里。看门的两个女人中有一个说好像认识萨满，自称是萨满同村纳拉费扬古的妻子，婚后第二天出天花死的，因为长得白净被子孙娘娘留在身边了。萨满十分惊喜，被带到子孙娘娘的房间里。只见一位老娘娘，周围十几个女人，都在忙着孩子的事。娘娘听了萨满的自我介绍，想起来了，说道：转生你的时候，你说什么也不干，是我哄着你，卷了神帽，拴了腰铃，拿了手鼓，像跳大神的一样。该着你出名啊！是我定的，让你来这里一趟，看看作恶的人应受的惩罚，以便转告大家都知道。说完便叫人带着萨满去看。

有一处树林长得非常好，萨满问是什么树，那人告诉说：世间有的人对娘娘不恭敬，折送的柳枝被牛马啃过，小孩出花就出得不好。要是折送好的柳枝，小孩出花才会出得好。又到一处，有个大轱辘在转动，里面有一群群的走兽和飞禽在跑着、飞出，这是生灵转世的地方。再往前是鬼门关，有鬼魂行走，里面是酆都城，黑雾弥漫，一片鬼魂的哭声。还有恶狗村，狗在撕咬人身上的肉。被送进地府的人，哭声四起。又在明镜山、暗镜山等处审定刑罚：打骂父母的，下油锅；偷骂师父的，拴在柱子上用箭射；妻子粗暴对待

丈夫的，用刀一点一点地割其肉；道士奸淫妇女和污秽经典的，用叉子叉；浪费米面的，用碾子压；诬告和破坏婚姻的，用烧红的铁条烫；官员受贿的，用鱼钩钩其肉；一女二嫁的，用锯锯开；骂丈夫的，割其舌；摔房门的，用钉子钉其手；偷听人语的，将其耳朵钉在窗户上；当盗贼的，用铁棍打；妇女不净而在江河洗浴的和初一、十五洗污物的，令其喝浊水；斜视老人的，用钩钩其眼；奸淫寡妇和姑娘的，用火柱烧烫；医生用药害死人的，剖其腹；有夫之妇与他人通奸的，用斧子砍其肉。又在一个大水池上架有金银渡，在此渡上行走的都是行善有福之人；在铜铁桥上行走的都是作恶受罚之人，小鬼用叉子把他们叉倒，使其遭受蟒蛇的袭击。渡口旁坐着一位菩萨，持经念给众人听：人要是作坏事，在阴间也要判刑受惩罚；要是作好事，不但不受惩罚，还要一等的当佛主，二等的生到宫中，三等的作驸马、太师、官员，四等的当将军、大臣，五等的为富贵之人，六等的为平民、乞丐，七等的转世为驴、骡、马、牛，八等的转世为鸟兽，九等的转世为鱼鳖，十等的转世为虫蚁等。萨满看后回见子孙娘娘，娘娘嘱咐她回到阳间转告世人。

萨满拉着色尔古岱费扬古沿原路返回到红河岸，给过河主礼物，把手鼓抛到河中，萨满和色尔古岱费

扬古站在鼓上渡到对岸。上岸走了不久，又来到一个渡口，那个丑陋的撑船人已经认识了萨满，就把萨满和色尔古岱费扬古送过河，萨满下船后又给了他礼物。下船后沿老路没走多久就回了员外家。

这时，萨满助手小阿哥往萨满的鼻子和脸上泼水，手持点着的香祈祷，呼唤萨满醒来。萨满开始颤抖，然后突然站立起来，叙述她抢救色尔古岱费扬古的经过，说完又仰面倒下。小阿哥用香熏她鼻子，萨满才又醒过来，把色尔古岱费扬古的魂放进他的尸身里。色尔古岱费扬古不一会就苏醒了，要了一碗水喝，说自己睡了一大觉，作了好久的梦，然后坐了起来。

色尔古岱费扬古救活了，员外夫妇非常高兴，向萨满敬酒致谢，设宴招待众人，把赏给萨满的东西送到她家里。

后来，萨满的婆婆听说她不但没有救自己的丈夫，还把他扔到了鄂都城，十分生气，便责问详情。萨满说了详情，婆婆认为她第二次杀了丈夫，便去京城告状。御史衙门拘传了萨满，录了口供，和她婆婆所告相同，便上奏皇上。皇上大怒，命刑部定其罪。刑部认为，萨满不隐讳传闻之事，实在是勇敢的人，奏请赦免其死罪。太宗皇上降旨，命将萨满所用法器装在箱子里，用铁索拴牢后沉入井中，不准拿出来。

此后，员外之子也效法他的父亲，扶危济贫，尽

行善事，子孙世代当官，十分富有[①]。

以上就是《尼山萨满传》的故事梗概。相信读者看了以后一定会觉得很神奇。西方的学者认为这是满族萨满教的“史诗”。

① 本故事依据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展先生《尼山萨满传》中满文部分翻译缩写而成。

三十一

《尼山萨满传》满文抄本及其他

据本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在我国黑龙江、松花江地区的实地调查，我国满族、赫哲族、达斡尔族中广泛地流传着尼山萨满的故事，情节和内容大同小异。早在30年代初，我国民俗学家凌纯声曾到赫哲族地区访问，收集到并公布了《一新萨满》的故事。五十年代也有人在达斡尔族地区听到过尼山萨满的故事。60年代初，内蒙古大学金启孮先生曾在齐齐哈尔市附近满族村屯作满族社会历史调查，也收集到《女丹萨满的故事》。“一新”也好，“女丹”也好，其实都是“尼山”的同音异译，故事情节基本相同，实际上是一个故事，不过因时因地有所差别而已。

尼山萨满的故事，显然最初是在说满语的满族群众中流传的。至于这个故事是何时产生的，则难以指

出一个明确的时间。按故事开头说的“古代明朝时”，可以说这个故事不会是在明朝前形成的。按故事中员外巴勒都巴颜家十分富有，奴仆和牲畜不计其数，似乎当时社会尚处于奴隶制阶段。考察历史，明末以前我国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正处于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时期，历史实际与故事中叙述的情况大体相当。因此，可以说尼山萨满的故事产生在明代后期。如果再问是哪个人编的这个故事，就更难回答了。民间故事往往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可以说尼山萨满的故事是满族群众集体创作的。

尼山萨满的故事，先是作为口头文学作品在民间广泛流传；用满文记录下来成为书面文学作品，那是在很久以后的事了。尼山萨满故事的满文抄本有多少个，都是什么人、什么时间形成的，这必须经过认真的考订。

据有关文章和资料记载，到目前为止至少已发现了四个尼山萨满故事的满文抄本，其中三个被俄国人格尔宾奇科夫得到，现存俄罗斯有关单位，一个被我国人收集到，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据原苏联学者沃尔科娃在文章中说，俄国人格尔宾奇科夫1908年在我国齐齐哈尔附近得到一本，记述的内容比较简单，从奴仆回家报告色尔古岱费扬古已死起到尼山萨满向蒙古尔岱争取色尔古岱费扬古寿限止；1909

年在瑷珲附近又得到一本，记述也比较简单，但有尼山萨满的画像；1913 在海参崴又得到一本，记述得详细，封面有满文题名“尼山萨满的书一册”，右下方有满文题款“教习格老爷的”。

格尔宾奇科夫等人曾打算翻译尼山萨满故事，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故未能如愿。1961 年，沃尔科娃将记述比较完整的《尼山萨满传》满文本、转写本和俄文译本合在一起出版，引起世界各国满学研究者的瞩目，陆续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据了解，至少有下列外文译本：朝鲜文译本，1974 年出版；德文译本，1975 年出版；意大利文译本，1977 年出版；英文译本，1977 年出版。台湾庄吉发先生的汉译本，1978 年出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赵展先生的汉译本，1987 年出版；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季永海、赵志忠合译的三部尼山萨满故事的汉译本，正在《满语研究》上连载。在各种文字译本出版的同时，研究工作也在进行，陆续发表了不少论文。

《尼山萨满传》作为民间书面文学作品，为我们研究满族的社会、历史、宗教、民俗乃至语言文字，都提供了难得的珍贵资料。

首先，巴勒都巴颜这位“员外”，拥有众多奴仆，牲畜不计其数，显然是一个典型的奴隶主，这说明明代女真人社会已经从氏族社会末期发展到奴隶制社

会。联系到明末努尔哈赤时期女真各部蜂起，互相残杀，争雄称长和到明朝境内掳掠汉人分给官兵为奴的史实，二者是一致的，证明女真和后来的满族社会是经历过奴隶制阶段的。

其次，在阶级社会里，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尼山萨满被人民群众塑造成一个敢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的英雄形象，家产万贯的奴隶主为救儿子生命也得跪倒在脚下，阴曹地府的主宰阎罗王眼看色尔古岱费扬古的魂被带走也毫无办法。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对压迫者的一种要求和愿望。

第三，在阶级社会里，剥削者是贪得无厌的，靠吮吸民脂民膏养肥自己。在那里，贪脏枉法，敲诈勒索，贿赂公行，是一个有钱能使鬼推磨的世界。每到一个关口，尼山萨满一把“礼物”送上去，便可顺利通过。故事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第四，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是很低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牲畜和弓箭。人民生活中纸张十分缺乏，大酱是必需的食品，所以行贿时必须有这些东西。这是当时女真社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真实反映。

第五，当人们无法改变阶级压迫的现实时，便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幻想上。故事中借巴勒都巴颜员外行善积德又生一子及阴曹地府中惩罚作恶者的种种刑罚，极力宣扬这种思想，这是

历史的局限所致。

第六，故事中称巴勒都巴颜为“员外”，以及小鬼、阎罗王和下油锅之说，很明显是汉族的思想文化观念，可见女真人和汉人思想文化的交流已经到了相当深的程度。

第七，从满文角度看，字体为新满文，书写比较规范、流畅、优美，语句通顺、易懂。如果说用满文记录尼山萨满故事的时间是在清代末年的话，那说明东北地区一些满族人的满文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三十二

清代满文的译著

满族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同汉族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满族共同体内就有为数众多的汉人。有相当一部分满族人，特别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玄烨、胤禛、弘历、颙琰等满族领袖人物以及额尔德尼、达海、刚林等满族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社会活动中学通了汉语文。随着后金、大清政权的建立，尤其是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并定鼎中原，满族贵族成为全国的统治者。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贵族，要统治以人口众多的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偌（ruò，音若）大多民族国家，困难是很多、很大的。但满族不愧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进取的民族，在坚持本民族特点的同时，大胆地、积极地吸收和借鉴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思想，制定和实行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较快

地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并使得清代社会有了新的发展。

清代统治者为了吸收和借鉴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思想，一向重视汉文典籍的满译。在清代前期历朝皇帝的重视和提倡下，大量的汉文典籍被翻译成满文并刻版刊行，还有些汉文典籍被译成满文后以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一部分满族人通过阅读翻译成满文的汉文典籍，熟悉并接受了汉族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制度，适应了清代社会的巨大发展。历史的发展表明，满族人，特别是满族上层人士，熟读经、史、子、集各类的满译汉文典籍，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汉文化，对满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满译汉文典籍，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就开始了。达海是一位满族的大知识分子，他“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令于国中，有当兼用汉文者，皆使承命传宣，悉称太祖旨”。正因为达海兼通满、蒙、汉文，才华出众，所以太祖“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清太宗皇太极时设立了文馆，又命达海等人专事“翻译汉字书籍”。达海年仅38岁时病逝，“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

《三国志》、《大乘经》，皆未竟”[①]。除达海外，翻译过汉文典籍的还有天聪时期的刚林，康熙时期的和素、富达礼，雍正时期的古巴岱，乾隆时期的鄂尔泰、富俊，嘉庆时期的九龄，道光时期的耆英、兴德、札克丹、通瑞，咸丰时期的孟保等。这些人的满汉文水平也都很高，具有翻译汉文典籍的能力和水平。

据查，有清一代翻译成满文的汉文典籍，种类繁多，数量很大。在文学方面，有《诗经》、《古文观止》、《封神演义》、《列国演义》、《三国志演义》、《西厢记》、《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在历史方面，有《春秋》、《左传》、《三国志》、《资治通鉴纲目》等；在军事方面，有《黄石公素书》、《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孙吴武经》等；在哲学方面，有《论语》、《孟子》、《四书》、《易经》、《大学衍义》、《大学中庸》等；在伦理学方面，有《二十四孝图说》、《弟子规》、《孝经》、《三字经》、《醒世要言》等；在宗教方面，有佛教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基督教的《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等，以及其他迷信术教的《太上感应篇》等；在语言文字方面，有《成语选要》、《经书成语》、《六部成语》等。

总观清代满译汉文典籍，以入关前及入关后的顺

① 《清史稿》，卷228，列传15。

治、康熙、雍正、乾隆朝为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满族人尚主要以满语文为交际的工具，需要有满文的典籍阅读；另一个是清统治者在用人行政和思想教育方面需要将汉文典籍译成满文，以便向满族人推行和宣传。清代后期，因满族人多已掌握了汉语文，直接阅读汉文典籍已无困难，再用满文翻译汉文典籍已无必要。但也并非绝对如此，事实上仍有人在满译汉文典籍。如道光朝兴德就翻译了《古文观止》、札克丹翻译了《聊斋志异》、通瑞翻译了《吏治辑要》等。

综观清代汉文典籍的满译，一般都译得很好，可以说达到了信、达、雅的水平。所谓“信”，就是准确；所谓“达”，就是通顺；所谓“雅”，就是文字优美。

这里举唐代刘禹锡《陋室铭》的满译文为例试加说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这是我国老少皆知、脍（kuài，音快）炙（zhì，音治）人口的名篇。把这篇名作译成满文，达到信、达、雅的水平，自然非有很好的满汉文功底不可。阅读满文译作，可以说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满文译作比照借鉴汉文的格律，在字数、结

构、对仗、韵律上审慎考究，体现了原文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段文字，译成满文为 alin den de akū，endurin bici gebungge ombi；muke šumin de akū，muduri bici ferguwecuke ombi。alin（山）与 muke（水）相对应，均系名词；den（高）与 šumin（深）相对应，均系形容词；下各接格助词 de 及无形态变化动词 akū 作谓语。endurin（仙）与 muduri（龙）相对应，均系名词；gebungge（名）与 ferguwecuke（灵）相对应，均系形容词；bici 是动词假定式，ombi 为动词现在和将来时，均作谓语。整个满文译文和汉文原文相比较，可以说是意尽言切，如同汉文原文一样对仗工整，念起来朗朗上口，回味无穷。

此外，汉文典籍的满文译文相对汉文原文而言，除了翻译上的信、达、雅而外，还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懂满文的人，在读汉文时遇到的难解之处，在满文中能轻而易举地看明白，这大概就是满汉两种语文的不同。兹举例说明之。《古文观止》中《郑伯克段于鄢(yān，音淹)》这一章，内有“庄公寤（wù，音误）生”一句。汉文“寤生”一词，一般人不懂，必须查《辞海》之类的辞书才能知道其意。但满文写作 juwang gung be banjire de manggalaha bihe，一看便知是生庄公的时候难产。

总之，用满文翻译汉文典籍而形成的满文译著，是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满汉文化交流中曾经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在今天，对于学习和研究满语文的人来说，满文译著又是很好的语言文字资料。

三十三

满文《玉牒》

和汉族人一样，满族人也注重编修家谱，尤其是名门望族的人。在清代，满族人均被编入八旗之中，一些人得任世管佐领或因军功得任世职，为证明其世代承袭的情形，都编修有类似家谱的承袭谱。有清一代，形成并保存下来大批满族人家谱和承袭谱，其中有一些是用满文书写的。在清代满族人家谱中最精彩的是皇帝的家谱，名曰玉牒。

清代掌管皇族事务的机关是宗人府。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本支子孙称作宗室，俗称黄带子；塔克世旁支子孙称作觉罗，俗称红带子。平时，凡宗室、觉罗有生子女、继嗣、婚嫁、封爵、授职、升补、降革、死亡等事情，由王公府上及各旗具报宗人府，宗人府登记在案，以为编修玉牒时使用。

顺治十二年（1655 年）题准，每隔十年编修一次

玉牒，届时开设玉牒馆，由皇帝钦定正副总裁，下设总校阅官等。

有清一代共编修玉牒26次，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首次，以后历次是：康熙九年（1670年）、十八年（1679年）、二十七年（1688年）、三十六年（1697年）、四十五年（1706年），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年（1733年），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年（1747年）、二十二年（1757年）、三十三年（1768年）、四十三年（1778年）、五十二年（1787年），嘉庆三年（1798年）、十二年（1807年）、二十三年（1818年），道光八年（1828年）、十八年（1838年）、二十八年（1848年），咸丰八年（1858年），同治七年（1868年），光绪三年（1877年）、十三年（1887年）、二十三年（1897年）、三十四（1908年）。按每十年编修一次，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似应有一次，但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均无这一年的玉牒，或许这一年没有编修玉牒。

玉牒每修三份，分别存于北京皇史宬、礼部、景山寿皇殿。乾隆八年（1743年）定，将北京礼部所存一份送盛京宫殿内存贮，最后确定永久存于敬典阁。编修玉牒形成的副本等保存在宗人府。

玉牒有满文和汉文两种文本，内容完全相同。编修玉牒的当时，已死者用墨笔书写，在世者用红笔书

写。宗室入于玉牒中的黄册，觉罗入于红册。

在黄册中用三种册子分别记载宗室繁衍情况，即帝系、列祖子孙、列祖女孙。帝系，起自肇祖原皇帝孟特穆，迄至德宗景皇帝载湉，在每个皇帝名下并列其诸子名字、行次、封爵，以嗣位皇子居中正对其父之名，从中可以看出皇位的继承关系。列祖子孙，是将皇帝诸子按行次顺序记载其名字、宗支、房次、封爵、生卒年月日及其母、妻之姓氏等，内容较为详细。列祖女孙，是将皇帝诸女按行次顺序记载其名字、宗支、房次、封爵、生卒年月日及其母、夫之姓氏。以上为竖格本，此外还有横格本，记载列祖子孙的名字、宗支、房次、辈分，内容较为简略。

在红册中用竖格和横格两种册子记载觉罗即兴祖、景祖子孙和女孙的繁衍情况。

玉牒，不管是黄册还是红册，开本各异，其高、宽、厚度不同，有的本子很大、很重，需几个人一起才能抬起来。

玉牒用的是泾（jīng，音经）县榜纸，画朱丝栏，精写而成。册衣用黄绫或红绫装裱。

送盛京宫殿内敬典阁尊藏的玉牒，由专差解送，行前在京城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到盛京时亦要举行隆重典礼。

玉牒既是皇帝的家谱，有清一代秘藏宫中，不用

说是普通臣民，就是重臣大吏也难得一见。作为皇帝的家谱，在装帧上不惜功本，故精美绝伦。有的册子厚达一米以上，数以万计的张页，竟然也能整齐地、牢固地装订在一起，可知当时装订技术水平之高。今天有幸能一睹其风采的人，无不为之惊叹不已。

玉牒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但更具有极珍贵的史料价值。

首先，它为研究清代皇族人口的变化提供了绝无仅有的系统资料。皇族，这是清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至尊无上的优越地位，在经济生活中穿绫罗皮裘、食山珍海味、居楼阁殿堂、乘车辇轿马，有成群的奴仆侍应，有太医院的名医为其治病调理，可谓生活在神仙般的环境之中。但他们也不免要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无法摆脱自然规律的作用，其人口变化情况经过认真地分析和研究，可以总结出一些重要的客观规律，对深入认识清代社会是很有帮助的。实际上已有专家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其次，皇族作为清代社会的统治集团，在对劳动人民进行统治方面是一致的，但他们之间也存在争权夺利乃至互相倾轧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玉牒中也有所反映，可能为解开清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斗争的某些重大疑案提供重要线索。例如，

关于雍正皇帝继统问题，自雍正上台后朝野就有传闻，说他是矫诏篡位，康熙遗诏本是“传位十四皇子胤祯”，被篡改为“传位于四皇子胤禛”。又说雍正为了掩盖矫诏篡位这个事实，继位后下令胤祯改名为允禵（雍正兄弟名字的前一个字本来都是“胤”字，雍正继位后为了避讳将“胤”字改作“允”字）。清亡后，史学家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有的人论证雍正确属篡位，有的人认为证据不足。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冯尔康先生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仔细查阅了玉牒，发现康熙三十六年十四皇子的名字是胤禵（tí，音题），而四十五年却有写作胤祯（zhēng，音征）之处。冯先生经过论证，认为十四皇子原名是胤禵，四十五年以前被康熙皇帝改为胤祯，到雍正继位后又恢复了原名允禵。按照冯先生的这个结论，雍正矫诏篡位之说似乎就不能成立了。但是香港的杨启樵先生对冯先生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仍坚持十四皇子原名胤祯后改名为允禵的看法。这里举出这个例子，不是要评论两位先生的看法哪个正确，而是要借此说明玉牒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康熙第十四皇子胤祯的名字在玉牒中的不同写法，被史学家用来研究雍正继统这一清史中的重大疑案，说明了玉牒在清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第三，玉牒记载着清代皇族（包括宗室和觉罗）子孙、女孙的名字、宗支、房次、封爵、夫（妻）、生卒

时间等情况，为一些皇族人了解其先人的情况提供了翔实资料。当然，玉牒原件作为珍贵档案文献，是不能供人随意查阅的。

第四，清代满文玉牒和汉文玉牒的内容虽然完全相同，但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文字，有时仍可对比使用，能澄清一些重要问题。如前文提到的康熙第十四皇子胤祯名字中的“祯”字，在汉文中是个多音字，既可读作 zhēn，又可读作 zhēng，究竟读作哪个呢？满文玉牒中解决了这个问题，读这个字的满文音是 zhēng，而不是 zhēn。

综上所述，清代满文玉牒和汉文玉牒一样，是重要的档案文献，既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更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满文玉牒同汉文玉牒对照使用，还有其独特的作用。

三十四

锡伯家庙满文碑

现在沈阳故宫博物院保存着锡伯家庙碑一块，是用满文刻的，因年代已久，且受到人为的破坏，已有些字迹无法辨识，但全部碑文还算清晰。据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说，这块碑1959年前后尚在沈阳实胜寺（一般称之为皇寺）附近的太平寺内。后来可能是因为太平寺被一工厂占用，为保护此碑才移送到沈阳故宫的。

此碑碑文是满文，现译成汉文如下：

总汇三世诸佛之通悟、阐发三教之教义、光耀释迦牟尼之佛法、青史世传之锡伯部，原本居住在海拉尔东南名为扎兰绰罗河流域。后于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讷等地被编成七十四牛录，历时四十余年。康熙三十六年，圣祖仁皇帝施以鸿恩，将锡伯人等编成三队，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令其移入盛京

后分驻各地效力。康熙四十六年，众锡伯共用银60两置房五间，建立太平寺，自京城延请甘珠尔经108卷，每年四季众喇嘛聚诵不已，其愿永偿矣。乾隆十七年，协领巴岱，佐领音德布、阿福西等众锡伯协力修建殿三间、两侧厢房各三间、正门三间，供奉三世佛。四十一年，协领罗布桑、拉锡、特古苏、卓第等众锡伯，重修寺院，立宗喀巴佛、五方佛、四天王佛，添请般若经，每年四季诵之不绝，永无穷尽。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梨树沟边门章京加一级记录二十一次花沙布敬立。

据说太平寺内原有两块碑，一刻汉文，一刻满文，内容完全相同。后来，汉文碑不知去向，只剩下这块满文碑了。正因为如此，这块满文碑就越发显得珍贵了。

从碑文中可以知道，沈阳太平寺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乾隆十七年加以扩建，乾隆四十一年重修，嘉庆八年立碑。

近些年来，已有一些专家、学者依据碑文所述和其他文献记载，对锡伯族的原居住地（这里指的是锡伯族被清政府编牛录前的居住地，并非锡伯族远古时的居住地）、编牛录及南迁至盛京等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

第一，关于锡伯族原居住地问题，碑文中说是海

拉尔东南的扎兰绰罗河流域。研究人员对此河的认定及其具体位置有不同看法，有的人认为扎兰绰罗河就是现在的绰尔河，有的人认为不是绰尔河而是洮儿河。争论可以继续下去，相信锡伯族原居住地问题一定会搞清楚。但必须指出，正是由于锡伯家庙碑文称其原居住地在扎兰绰罗河流域，从而否定了清代人杨宾、萨英额关于伯都讷是锡伯族原居住地的传统看法。对此，专家学者们取得了共识，而这正是锡伯家庙碑所揭示的。

第二，关于锡伯族被编入八旗及安置问题，碑文中说“后于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讷等地被编成七十四牛录，历时四十余年”，“于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令其移入盛京”。有研究者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事实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 年），锡伯族被编成七十四个牛录，归入满洲八旗，分驻齐齐哈尔等城。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不过六七年，何来四十余年？其实是立碑人搞错了。四十余年前，应当是指科尔沁蒙古编旗时，当时锡伯族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因而同时被编旗。如此说来，碑文记述也有不确之处。

第三，关于太平寺就是锡伯家庙问题。碑文记载，康熙四十六年（1707 年），由一部分锡伯族人捐资买房建立了太平寺。《沈阳县志》说这座太平寺就是锡伯族

家庙，但未讲明根据是什么。197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人员吴元丰、赵志强（均是锡伯族），因公出差到沈阳，前去太平寺参观，发现该寺早已被一工厂占用，全寺仅余一座殿房且已破败不堪，真可谓面目全非了。有一位姓王的工人告诉吴、赵二人说，他的机器底下垫着一块厚木板，上面还有字。经众人动手，从机器下取出了这块木板，原来它就是太平寺的匾额，上写“锡伯家庙”四个大字及其他一些小字。但令人遗憾的是，匾额被锯掉了一端，恰恰把“锡”字的一半锯掉了，只剩下“金”字旁。这个匾额的发现，有力地证明太平寺就是锡伯家庙。但愿有朝一日恢复锡伯家庙时再把这块匾重新悬挂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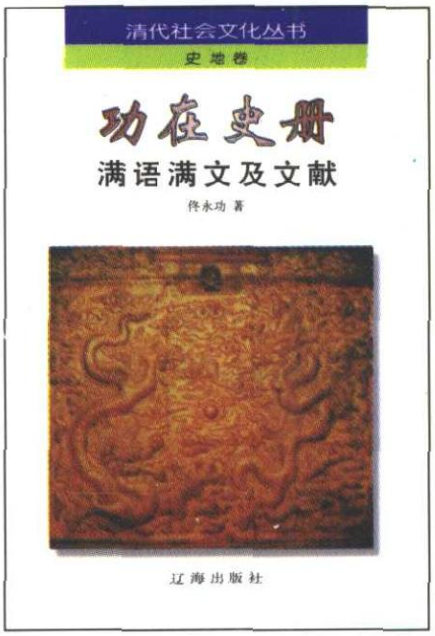
第四，锡伯族曾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受其影响，也信仰喇嘛教，所以太平寺这座锡伯家庙也供奉释迦牟尼，并请到甘珠尔经诵读。太平寺地处盛京最大喇嘛教寺庙——实胜寺近旁，而且在佛事活动中互相来往。这是锡伯族同蒙古族关系密切的体现，也表明清政府对蒙古族和锡伯族都很重视。但太平寺内还有关帝庙，内供关帝圣君，这又说明锡伯族不只信奉喇嘛教。其实，锡伯族信奉多种宗教，是多神崇拜。

第五，锡伯族在隶属科尔沁蒙古时，和蒙古族的联系密切，故一些人学会了蒙古语文。但自从脱离科尔沁蒙古管辖，被清政府编入满洲八旗，特别是南迁

到盛京地区以后，锡伯族逐渐地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改习了满语满文。盛京的北塔法轮寺被清帝改定为满洲喇嘛寺，本应招收满族人入寺当喇嘛诵读满文经，但满族人多不愿意，于是改招锡伯族人，因为锡伯族人的满语文水平较高。太平寺——锡伯家庙碑碑文也用了满文。这些事实说明锡伯族已经把满语文作为自己的语言文字了。

总之，锡伯家庙满文碑的发现，为清史和民族史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但应当指出，此碑系梨树沟边门章京花沙布等人所立，他们的职务不高，时间已是嘉庆年间，有关锡伯族在清初的历史，很可能是耳闻者多，不可能依据档案记载详加考察后再撰写碑文，故出现了不实之词，这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加以推敲和考察，与清代档案等文献进行对比分析，这样就会收到去伪存真之效。一块锡伯家庙满文碑就有这些历史问题值得人们探讨，可见满文碑的珍贵，我们应当注意搜集和保护。

清代社会文化丛书



（一）思想卷

1. 独树一帜 — 戴震与乾嘉学派
2. 一枝独秀 — 清代禅宗隆兴
3. 源同流分 — 民间宗教与结社
4. 救亡求存 — 清末维新潮
5. 弃旧图新 — 清末共和潮

（二）科教卷

1. 数算大师 — 梅文鼎与天文历算
2. 水畅河清 — 治河专家靳辅、陈潢
3. 浓缩天地 — 避暑山庄营造技艺
4. 杏坛春秋 — 书院兴衰
5. 跨出国门 — 清末出国潮

（三）文艺卷

1. 名著迭出 — 清代小说刍议
2. 翰墨奇人 — 书画名家评说
3. 文坛佳秀 — 妇女作家群
4. 独入佳境 — 满族宗室文学
5. 梨园春花 — 地方戏曲与京剧

（四）史地卷

1. 亘古盛举 — 《古今图书集成》与《四库全书》
2. 舆地图籍 — 《异域录》与《大清一统志》
3. 史林巨匠 — 章学诚与史著
4. 放眼世界 — 魏源与《海国图志》
5. 功在史册 — 满语满文及文献

（五）典制卷

1. 建储争斗 — 秘密建储与垂帘听政
2. 雄视四方 — 清帝巡狩活动
3. 御用工具 — 监察机构与监察活动
4. 落日晚钟 — 清代太监制度
5. 金榜题名 — 清代科举述要

（六）风俗卷

1. 满蒙联姻 — 清代宫廷婚俗
2. 四季飘香 — 清代节令与佳肴
3. 再添秀色 — 满族官民服饰
4. 市井风情 — 京城庙会与厂甸
5. 迈向近代 — 剪辫与放足

ISBN 7-80638-356-5

9 787806 383568 >

ISBN 7-80638-356-5/H・1
定价：13.50 元